

虞弘墓石槨　隋　山西太原



虞弘墓石槨　正面東側　隋　山西太原

臺灣大學 庫



虞弘墓石槨　內部北壁東側　隋　山西太原



虞弘墓石槨座　正面　隋　山西太原

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DOI: 10.6541/TJAH.202409_(57).0002

鸚鵡與白玉：隋代虞弘墓的地域網絡

林聖智*

【摘要】本文藉由地域網絡的視角考察山西太原隋代開皇十二年（592）虞弘墓，其中可見以晉陽為中心的北鎮武人墓葬文化網絡，以及以定州為中心的佛教白玉像製作網絡。虞弘曾仕於北齊，因出自楊堅的丞相府而被委與重任，持續保有山西中北部的武力。虞弘墓石槨出現嶄新的多層結構，石堂、石牀、石獅座墊被統合成新的綜合體。石獅頭座墊與鸚鵡母題均顯示出與晉陽北鎮武人文化的密切關係。北朝晚期至隋代密集出現白玉葬具、白玉俑的現象，與同時期佛教物質文化的新發展密切相關。白玉具有光潔、明亮的特質，可引發感應並顯現各種神通的樣態。石槨採白玉雕製既是身分地位的象徵，還具有感應與放光的宗教意涵，與其圖像與裝飾共同塑造出虞弘勇敢而高貴的武人形象。

關鍵詞：虞弘墓、粟特人、石槨、鸚鵡、白玉、地域網絡

1999年山西太原隋代開皇十二年（592）虞弘墓的出土，掀起中古時期粟特圖像研究的風潮，促使學界重新評估粟特文化的獨特地位，進而從根本上改變北朝至隋代墓葬圖像的論述架構。① 有鑑於這座墓葬的關鍵地位，本文嘗試由地域網絡的視角來考察虞弘墓，探求北朝晚期至隋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具體樣貌。

虞弘墓石槨（山西省博物院）內外雕飾精美而多樣的圖像，如何恰當解釋圖像的來源、組合與意義向來受到學界的高度關注。② 虞弘墓石槨與其他漢地粟特葬具相比較，可顯見源自西亞、中亞的各類圖像，在風格上也別具特色。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員

①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簡報〉，《文物》，2001年1期，頁27-5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② 關於虞弘墓石槨圖像的研究如下：張慶捷，〈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槨浮雕的初步考察〉，收入巫鴻主編，《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互動與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於虞弘的族屬，雖然目前對於其出身「魚國」的地理位置尚無定論，然而由虞弘的經歷以及考古材料來看，學界多視其為廣義的粟特人，因此可將虞弘墓

3-28。鄭岩，〈青州北齊畫像石與入華粟特人美術—虞弘墓等考古新發現的啟示〉，收入巫鴻主編，《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互動與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73-109。後以〈青州傅家北齊畫像石與入華粟特人美術〉為題，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增訂版）》（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頁212-255。姜伯勤，〈隋檢校薩寶虞弘墓石槨祆教畫像石圖像程序試探〉，收入巫鴻主編，《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互動與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29-50。姜伯勤，〈隋檢校薩寶虞弘墓祆教畫像石圖像的再探討〉，《藝術史研究》，4輯（2002），頁183-198。兩文收入氏著，《中國祆教藝術史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頁121-154。張慶捷，〈虞弘墓石槨圖像中的波斯文化因素〉，收入葉奕良編，《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第三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頁237-255。Boris I. Marshak, “The Sarcophagus of Sabao Yu Hong, a Head of the Foreign Merchants (592-98),” *Orientations*, vol. 35, no. 7 (2004), pp. 57-65. James C. Y. Watt,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4), pp. 276-281. Judith A. Lerner, “Aspects of Assimilation: The Funerary Practices and Furnishings of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Sino-Platonic Papers*, no. 168 (2005), pp. 1-73. 曾布川寬，〈中國出土のソグド石刻畫像試論〉，收入氏編，《中國美術の圖像學》（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06），頁97-182。本文增補版改題為〈中國出土ソグド石刻畫像の圖像學〉，收入曾布川寬、吉田豐編，《ソグド人の美術と言語》（京都：臨川書店，2011），頁215-317。齊東方，〈虞弘墓人獸搏鬥圖像及其文化屬性〉，《文物》，2006年8期，頁78-84。畢波，〈虞弘墓所謂“夫婦宴飲圖”辨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1期，頁66-83。Annette L. Juliano, “Converging Traditions in the Imagery of Yu Hong’s Sarcophagus: Possible Buddhist Sources,”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no. I (2006), pp. 29-49. 張慶捷，《胡商、胡騰舞與入華中亞人—解讀虞弘墓》（太原：山西出版集團・北岳文藝出版社，2010），修訂版見《解讀虞弘墓—北朝定居中國的粟特人》（太原：山西出版傳媒集團・三晉出版社，2020）。沈睿文，〈論墓制與墓主國家和民族認同的關係—以康業、安伽、史君、虞弘諸墓為例〉，《西域文史》，第6輯（2011），頁205-232，收入氏著，《中古中國祆教信仰與喪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17-58。孫武軍，《入華粟特人墓葬圖像的喪葬與宗教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頁84-93。Patrick Wertmann, *Sogdians in China: Archaeological and Art Historical Analyses of Tombs and Texts from the 3rd to the 10th Century AD* (German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Eurasia Department, Beijing Branch Office; Darmstadt: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2015), pp. 87-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放在北朝至隋代粟特人文化的脈絡下來檢視。③ 近年粟特人墓葬研究稍顯沉寂，然而隨著新材料的出土，現在正是反思並開拓可能性的恰當時機。④

如何探索粟特圖像與中原地域文化之間的各式連結，是當今考察漢地粟特人墓葬圖像的重要研究取徑。經歷粟特研究熱潮之後，學界逐漸認識到「漢化」、「華化」解釋模式的限制，轉向探究粟特人如何利用墓葬圖像進行自我敘事，以新的眼光來重新審視這批粟特人葬具。學者不約而同地指出漢地粟特人墓葬圖像中混融多元、多層次的文化因素。曾布川寬提出漢地粟特圖像具有調和、折衷、複合性的特質。朱安耐（Annette L. Juliano）認為其中融合了中亞文化與中國傳統，創造出富於象徵意涵的重層視覺圖像。⑤ 筆者嘗試以地域網絡的概念來解析虞弘墓中多層次的政治宗教文化內涵。地域網絡的研究視角除了關注個別網絡內部的連結與重建，還須兼顧不同網絡之間的多重疊合以及各種動態因素的交互作用，藉此重構文化互動的樣態。

粟特人葬具的形制與部分圖像布局可追溯至北魏，並表現出對於北魏拓跋鮮卑的特殊歷史記憶。⑥ 然而在魏分東西之後，隨著歷史變遷，隋代粟特人墓

③ 相關研究可舉出榮新江，〈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國學研究》，6期（1999），頁27-86，收入氏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修訂版）》（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頁34-105。榮新江，〈粟特祆教美術東傳過程中的轉化——從粟特到中國〉，收入巫鴻主編，《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互動與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51-72。後收入氏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修訂版）》，頁269-292。張慶捷，〈入鄉隨俗與難忘故土——入華粟特人石葬具概觀〉，收入榮新江、張志清主編，《從撒馬爾干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迹》（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9-16。榮新江著，森部豐譯・解說，〈新出石刻史料から見たソグド人研究の動向〉，《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44號（2011），頁121-151。榮新江、羅豐主編，《粟特人在中國：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上下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張金龍，〈隋代虞弘族屬及其祆教信仰管窺〉，《文史哲》，2期（2016），頁91-113。馮培紅，〈廿年虞弘夫婦合葬墓研究回顧與展望—以虞弘族屬與魚國地望為中心〉，《西域研究》，2020年2期，頁153-165。

④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夫妻合葬墓的發掘〉，《考古學報》，2023年3期，頁393-433。

⑤ 曾布川寬、吉田豐編，《ソグド人の美術と言語》，頁322。Annette L. Juliano, “Converging Traditions in the Imagery of Yu Hong’s Sarcophagus: Possible Buddhist Sources,” p. 30.

⑥ 林聖智，《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9），頁314-3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葬圖像出現嶄新的因素，無法只藉由回溯北魏墓葬文化得到充分解釋。筆者希望透過回歸地域文化的視角，關注北朝晚期北鎮墓葬文化的特點，藉此來提出更貼近地域且具有脈絡化的圖像解釋。就虞弘墓地域網絡的考察而言，其中所牽涉的議題包括：墓葬文化的變遷、地域傳統的分流或整合、佛教造像與信仰的發展、中原政權的角力與更迭，以及北朝晚期至隋代粟特人活動性質的變化。

虞弘墓石槨有一重要特點是採用漢白玉做為石材，且出現成套的白玉人俑，顯示出與北朝晚期至隋代白玉像造像風潮的關係。⑦ 過去學界對於漢地粟特人葬具的研究偏重於圖像問題，比較忽略物質文化的層面。關於虞弘墓石槨中諸如圖像、裝飾與佛教造像、白玉像之間的關係等佛教因素，學者曾加以考察，⑧ 但迄今尚無結合地域網絡與物質文化的研究。本文嘗試梳理北魏、北齊至隋代佛教造像材質位階的轉變，以及不同群體對於白玉的宗教心態與感應觀，將虞弘墓石槨放在北朝至隋代佛教物質文化變遷的脈絡下來加以理解。

本文首先簡介虞弘墓的概況與虞弘的生平，其次考察以下問題：第一、虞弘墓石槨的新結構；第二、虞弘墓與北鎮武人的墓葬文化的相關性；第三、白玉葬具與白玉像的關係。本文嘗試透過考察圖像與裝飾特點，來追溯虞弘墓所依據的墓葬傳統及其佛教物質文化的基礎，梳理多重地域網絡之間的錯綜關係，重新認識中古前期從中亞至北亞的跨地域文化傳播與交流。

一、虞弘墓概觀

（一）石槨與隨葬品

虞弘墓為單室墓，由墓道、甬道、墓門、墓室所組成，墓門偏向西南（圖1）。墓室四壁為磚砌，地面無地磚。墓室寬約3.55、深約3.66公尺，高度1.73公尺以上的部分已經全毀（圖2）。墓室中央偏北處安放一座漢白玉石槨（圖3、

⑦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158。

⑧ Annette L. Juliano, “Converging Traditions in the Imagery of Yu Hong’s Sarcophagus: Possible Buddhist Sources,” pp. 29-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虞弘墓在發掘之初已遭受嚴重破壞，隨葬品多已碎裂成數段，散布在石堂四周。南側距離南壁118公分，北側距離北壁42公分，可知僅在石槨前方留有略較大的空間，推測原來隨葬品主要集中於這個範圍。石槨的年代可以虞弘下葬的開皇十二年（592）為基準，部分隨葬品的年代可能略晚，下限為虞弘夫人埋葬的開皇十八年（598）。

石槨的外觀模仿單檐歇山頂殿堂式木構建築，通高236、正面長247、側面寬136公分，為目前所知北朝至隋代尺寸最大的石質屋型葬具。石槨分為頂部、槨身、槨座三個部分。頂部包含三件石塊，槨身由槨門與九塊石板組成，槨身正面長243、側面寬135、高96公分。槨座長247、寬136、高54.5公分。在槨座下方的四個轉角各安放兩件獅頭座，共有8件，前後、左右相互對應，也是由漢白玉製成（圖5、圖6a、6b）。每個獅頭座墊長31-47公分，前半為獅頭，後半為長方形平台。後半部直接乘載石槨座，高度約10.5-11公分。當石槨座乘載於獅頭座墊之上時，高度約65公分。

在墓室中出土五根漢白玉八棱柱，其中四根淺浮雕半忍冬紋，一根以彩繪的方式描繪。另有五個用來安放八棱柱的覆蓮柱礎。根據報告書的復原，四根柱礎位在前方，另一根位在後方。⑨

石槨內外雕刻並彩繪有豐富的粟特祆教圖像，出土後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焦點。報告書中將正面東側石編為1號，採逆時針方向解說。本文關注正面圖像的重要性，依槨座、正面東西兩石、內側東壁、北壁、西壁的順序來說明。

槨座分為上下兩層，上層是由雙柱所形成的拱形龕，正面中央有一火壇，左右為人首鳥身的祆教祭司，兩側為壺門（圖7）。槨座中除了北側採用彩繪之外均以淺浮雕製作。正面上層有六組由束蓮柱與龕楣形拱所構成的單元，每個單元都有兩位神人，做吹奏樂器狀。壺門內有兩位對飲的天神。最外側是持長矛的武士，呈左右對稱。槨座西側上層同樣由束蓮柱與龕楣形拱組成區隔的單元，分成三組，由外而內分別是騎馬獵鹿、騎馬獵獅、有翼天馬，均朝向內側奔馳（圖8）。槨座東側由外而內分別是三幅騎馬狩獵，第一幅朝內，第二、三幅朝外，與西側並未對稱（圖9）。槨座北側的騎馬狩獵圖位在下層，比例較大，分成兩組且朝向中央（圖10）。

⑨ 若根據北魏屋型葬具的結構來看後方並無石柱，此復原有待進一步研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石槨槨身由九塊石板組成，每塊石板分成上下兩個區塊，上方區塊的圖像為主體，下方欄位為輔。槨身入口兩側的淺浮雕位居重要地位，正面東側以一匹無人騎乘的鞍馬為主體，馬首內收，姿態沉穩。馬鞍上敷有鞍袱，鞍袱重疊而下垂，下方以一圓環束緊，刻畫細緻（圖11）。駿馬身軀呈白色，在鬃毛與馬鞍等處飾有朱彩。駿馬前方有一寶樹，下方有一人著胡服，手握韁繩，後方另有三人，其中一人雙手舉起，另外二人在左腋下夾持方形物。駿馬下方有二犬。馬頸上方生出一朵蓮花，上方有頸部繫帶的瑞鳥，其後方可見一鸚鵡口銜葡萄。下方區塊刻畫有翼馬，尾部呈魚尾狀。

正面西側以一有頭光的騎馬神人為主體（圖12）。神人頭戴冠飾，上身的比例較大，左手持物，其上方有傘蓋，馬的四足綁帶。神人後方有一附頭光的侍者，手持傘蓋。前方有一寶樹，樹下有一人，左手端小盤，盤內物的形狀與神人的持物相同。畫面左上角有一瑞鳥，已殘損。下方欄位內為獅牛相鬥圖，獅子以朱色暈染，牛身塗以白粉。由於虞弘墓的石槨圖像中僅在此處出現傘蓋與繫帶駿馬，且這塊石板位在石槨正面、火壇祭司的上方，如同學者所指出，這位騎馬神人在石槨中的位階最高。

石槨內側東壁由兩塊石板組成，靠外側（南側）的畫面以一高臺為主體，前方有二人，一人頭戴圓光，雙手捧壺（圖13）。高臺內有三位赤裸上身的人物手臂相接，做輕快舞蹈狀。高臺上方伸展出葡萄藤蔓，中央有一繫帶的鸚鵡。下方呈現有翼天馬與獅子搏鬥的景象。內側（北側）畫面為一騎乘單峰駱駝轉身射獅的人物，有頭光，應是天神，駱駝扭轉軀體並口咬獅子，十分具有動態感（圖14）。下方欄位內有一天人坐於圓毯上，右手執角形器。

北壁分成三塊石板，依照由東至西的順序，東側為突厥騎士騎駱駝獵獅圖，以中央威猛的騎士為主題，此武士呈側面像，頭披長髮，表現出突厥人的特徵（圖15）。類似的突厥人形象屢見於安伽墓圍屏，可以相互印證。駱駝向前奔馳，前後各有一獅，前方獅子口咬駱駝，駱駝張口鳴叫，下方有一犬。此圖以較大的比例凸顯突厥騎士與駱駝的頭部，表現出人獸搏鬥之際的緊張態勢，無論是人物、駱駝、獅子或是犬，均呈現出強烈的動態感。上方有口銜葡萄的鸚鵡及口銜花朵狀物的瑞鳥。下方欄位內有一奔馳的羚羊，朝向中央，朝向與駱駝相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北壁中央石板的尺寸較大，中央高座內有二人對飲，為虞弘墓主夫婦圖（圖16）。高座兩側有八字形帷障狀的結構，上方有葡萄藤蔓與鸚鵡。以高座為中心，兩側人物分上下兩層，上層左右各有兩位附頭光的人物，下層中央有一人正在跳胡旋舞，左右各有兩位奏樂人物，坐於矩形毯上，其排列方式與上方八字形結構相對應。下方欄位內為兩組武士鬬獅子圖，相互對稱。獅子咬住武士的頭部，武士將利劍插入獅身，另有二犬在一旁參與搏鬥。

北壁西側有一附頭光的貴人騎象擊獅（圖17）。白象昂首舉鼻，做奔馳狀，象鼻前端、身後、前足下方各有一獅。貴人右手高舉長劍轉身擊獅，表現出搏鬥之際的臨場感，頗為生動。下方有一繫帶的瑞鳥，朝向中央，口銜雲狀物，所朝方向與北壁第一石下方的羚羊相對應。

西側由兩塊石板構成。內側（北側）為一天神騎於馬上，有頭光，頭戴寶冠，飛帶的比例較大，右手舉碗，前方有一人端盤奉獻食物（圖18）。天神上方有一頸繫飄帶的瑞鳥，下方刻畫白犬。下欄內有山羊。

西壁內部外側（南側）刻畫一天神坐於束腰高座，前方有一樹，可視為樹下人物的構圖（圖19）。天神附有頭光，寶冠兩側飛帶飄起，上方有一頸繫飄帶的瑞鳥。天神前方有一人胡跪於圓毯，奉獻食物，後方另有一人彈琵琶。下欄內刻畫白色大角鹿。

在石槨外壁另有壁畫。東側由前而後分別是呈跪姿並手捧香爐的男性人物，其次為立姿男性，接著是北壁東側的女性立像、北壁中央呈坐姿的神人、北壁西側的立姿男性。西壁外側由外而內依序是女性立像、跪姿人物。

墓室中一共出土16件石俑，包括白玉文吏俑、白玉石伎樂俑、砂石奉侍俑。白玉文吏俑2件，一件殘高54.5公分，下半身殘損。頭戴黑色平巾幘，穿著圓領袍，外加交領衫，邊緣飾有朱彩（圖20）。雙手按劍，劍身塗黑並添加朱色隔線。另一件殘高56公分，頭部已失，底部有圓形榫頭，可與蓮花座相接合。

白玉伎樂俑包括伎樂男俑和伎樂女俑。經復原後伎樂男俑共有7件，分別是拱手男俑（高57公分）、抱豎箜篌男俑（高51公分）、抱琵琶男俑（高55公分）、持銅鈸男俑（殘高40公分）、持笙男俑（殘高42.5公分）、持笛男俑（高57公分、圖21）、男伎樂俑頭（殘高12公分）。另出土6件覆蓮俑座，同樣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白玉製成，可推測白玉文吏俑與白玉伎樂俑原來均立於蓮花座上。根據報告書的復原，持笛男俑與持排簫女俑可與特定的覆蓮座相接合。持笛男俑通高57公分，可知此俑與覆蓮座相組合後通高約為65公分，略高於榔座的高度。

砂石奉侍俑計有4件，男女各2件。持壺男侍俑高68公分，立於方形石座，做胡人容貌，身著圓領窄袖袍，雙手持壺，腰上繫有佩物7件。持瓶男侍俑殘高52公分，缺頭部，同樣立於方形座上。報告書中認為此男俑手握鼓腹細頸瓶。不過其開口較大，且底部似無圈足，有可能是囊袋。其中一件砂石女侍俑高63.3公分，附有方形石座。身著窄袖長裙、圓領衫，有帔帛，持物已失。另一件持巾女侍俑高65.5公分，雙手拱於胸前，掛有長巾。另外出土數件陶俑殘片，包括陶馬、羊、鎮墓武士等。

（二）虞弘墓誌與其生平

學界已針對《虞弘墓誌》（圖22）進行深入的研究，成果豐碩，以下綜合前人研究成果來介紹虞弘的生平。⑩ 虞弘字莫潘，魚國尉紇驎城人。祖上曾擔任魚國的「領民酋長」，父親君陀曾在茹茹擔任高級官職「莫賀去汾」。

---

⑩ 張慶捷，〈《虞弘墓誌》中的幾個問題〉，《文物》，2001年1期，頁102-108。張慶捷，〈隋虞弘墓誌考釋〉，《唐研究》，7卷（2001），頁145-176。收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209-234。榮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薩保府與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4期，頁84-89。收入氏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修訂版）》，頁160-170。林梅村，〈稽胡史跡考—太原新出隋代虞弘墓誌的幾個問題〉，《中國史研究》，2002年1期，頁71-84。周偉洲，〈隋虞弘墓誌釋證〉，收入榮新江、李孝聰主編，《中外關係史：新史料與新問題》（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247-257。羅新，〈虞弘墓誌所見的柔然官職〉，《北大史學》，12輯（2007），頁50-73。收入氏著，《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108-132。羅豐，〈一件關於柔然民族的重要史料—隋《虞弘墓誌》考〉，《文物》，2002年6期，頁78-83、93。收入氏著，《胡漢之間—“絲綢之路”與西北歷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405-422。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6），頁391-393。石見清裕，〈ソグド人漢文墓誌訳注（8）太原出土「虞弘墓誌」（隋・開皇十二年）〉，《史滴》，33號（2011），頁205-237，收入氏編，《ソグド人墓誌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6），頁114-1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公諱弘，字莫潘，魚國尉紇驎城人也。高陽馭運，遷陸海□□□，□□膺籙，徙赤縣於蒲坂。奕葉繁昌、派枝西域。倜儻人物，漂注□□。□□奴栖，魚國領民酋長。父君陁，茹茹國莫賀去汾達官，使魏□□□□栟州刺史。

關於虞弘出身的「魚國尉紇驎城」未見於史書。「□□奴栖」推測為「曾祖奴栖」或「□祖奴栖」，任魚國領民酋長。父為「君陁」，茹茹國即蠕蠕、柔然的別稱。關於「莫賀去汾達官」，「莫賀」為柔然的官職名，「去汾」則有不同的解釋。⑪ 虞弘祖上奴栖曾任魚國領民酋長，其父君陁擔任茹茹國的莫賀去汾達官，擔任外交使節，出使東魏，任朔州刺史。⑫

虞弘十三歲時擔任柔然的官職「莫賀弗」，出使波斯、吐谷渾，後來轉任「莫緣」，出使北齊，⑬推測出使期間約在天保元年至五年（550-554）之間。

年十三，任莫賀弗，銜命波斯、吐谷渾，轉莫緣，仍使齊國。文宣□□，煥爛披雲，拘縶內參，弗令返國。太上控覽，砂磧煙塵，授直突都督。□使折旋，歙諧邊款，加輕車將軍、直齊、直盪都督。尋遷使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射聲校尉。貫達專持嚴毅，未足稱優；郭汲垂信童兒，詎應擬媿。蘭陪閶闔，奮吒驚道。功振卷舒，理署僚府。除假儀同三司、遊擊將軍。貂璫容良之形，佩山玄玉之勢。

其中「文宣」指文宣帝高洋（在位550-559），可知出使北齊的年齡約二十歲前後。關於北齊「弗令返國」並授予官職一事，與北亞的國際情勢密切相關，在此稍加說明。552年柔然可汗阿那瓌敗於突厥而自殺，其族人亡命北齊。阿那瓌之子菴羅辰雖得到北齊的奧援，但仍在554年亡於突厥。由於柔然驟然滅國，出使北齊的虞弘遂歸化北齊。⑭「直突都督」（從六品）為北齊左右尉府的實

⑪ 羅豐，《胡漢之間—“絲綢之路”與西北歷史考古—》，頁412。羅新，《中古北族名號研究》，頁108-132。

⑫ 此朔州應指寄治於并州的僑置朔州，寄治於并州壽陽（山西省壽陽縣），位在太原東側。周偉洲，〈隋虞弘墓誌釋證〉，頁253。

⑬ 莫賀弗與莫緣均為茹茹官職。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215-218。

⑭ 關於虞弘生涯與北亞政治局勢的相關性，參見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國》（東京：講談社，2007），頁113-126。石見清裕編，《ソグド人墓誌研究》，頁143-1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職武官。虞弘同時擔任外交使節，任涼州刺使。「輕車將軍」為無職事的將軍號，品階從四品。關於「都督涼州諸軍事」與「涼州刺史」，由於涼州（今甘肅省武威市）並非北齊疆域，因此同樣是虛銜。「直齊」、「直盪都督」為北齊左右尉府的實職武官，品階從四品至從五品。「射聲校尉」為北齊左右尉府的實職武官，品階從四品。⑮

虞弘墓誌中記載北周滅北齊之後，虞弘在北周大象年間（579-580）擔任儀同大將軍，統領并、代、介三州鄉團並檢校薩保府，⑯ 可知北周統一北方之後，虞弘的政治軍事地位依然持續上升。

> 武平既鹿喪綱頹，建德遂蚕食關左。收珠棄蟒，更悛琴瑟。乃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廣興縣開國伯，邑六百戶。體飾金章、銜轡簪笏。詔充可比大使，兼領鄉團。大象末，左丞相府，遷領并、代、介三州鄉團，檢校薩保府。開皇轉儀同三司，勅領左帳內，鎮押并部。

推測北周滅北齊之後，虞弘領導晉陽一帶的粟特人投靠北周，因而在北齊滅亡之後受封開國伯，⑰ 任儀同大將軍，擔任大使，北周末年進而兼領三州鄉團，可知他的身分不僅是粟特人聚落的領袖，還具備實質掌握山西中北部的軍事實力，具有地方武人的性格。⑱

誌文中「大象末，左丞相府」的記載尤其值得注意。據《隋書》卷一〈高祖紀〉，北周大象二年（580）五月楊堅任左丞相，以正陽宮為丞相府。⑲ 此處

---

⑮（唐）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27，〈百官志・中〉，頁758、767-768。

⑯ 虞弘的職權高於薩保。羅豐，《胡漢之間—“絲綢之路”與西北歷史考古—》，頁422。

⑰ 關於「廣興縣開國伯」，張慶捷推測是指安州廣陽郡廣興縣（河北省承德市隆化縣）。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221。

⑱ 西魏宇文泰為了對抗東魏，召集關中、隴右（甘肅省東部一帶）地區的豪強，集結「鄉團」、「鄉兵」組成由中央政府所控管的「二十四軍」。唐長孺，〈魏周府兵制度辨疑〉，收入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5），頁250-288。谷川道雄，〈西魏二十四軍の成立と豪族社会〉，收入氏著，《增補 隋唐帝国形成史論》（東京：筑摩書房，1998），頁430-450。

⑲（唐）魏徵等撰，《隋書》，卷1，〈高祖紀〉:「大象二年五月，以高祖為揚州總管，……庚戌，周帝拜高祖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己而聽焉。以正陽宮為丞相府。」（頁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左丞相府」即為楊堅所開設的丞相府。換言之，隋代建國之前虞弘曾屬楊堅麾下。虞弘因出身楊堅的丞相府而被委與重任，「遷領并、代、介三州鄉團，檢校薩保府」，擴大其在并州（治所山西太原市）、代州（治所山西代縣）、介州（治所山西汾陽市）三地的影響力，成為粟特聚落的領袖。⑳ 曾仕於北齊的虞弘在北周至隋的更迭之際能洞察時局變遷，展現粟特人獨到的外交手腕以及對於國際政治情勢的準確判斷。

虞弘檢校的薩保府位在并州晉陽，也就是其墓葬的出土地山西太原。自東魏起以晉陽為中心的山西中北部為鮮卑北鎮人的根據地。據《魏書》卷七十五〈爾朱兆傳〉，高歡討伐紇豆陵步蕃之際，自爾朱兆接收該地區以鮮卑人為主體的北鎮遺民。533年高歡擊敗爾朱兆，成就霸業，主要就是得力於這批鮮卑鎮人，他們也成為日後得以與西魏宇文泰相抗衡的精銳武力。㉑ 這批鎮人在文化上高度鮮卑化且具有共通的集體意識，康樂稱之為「鎮人集團」，王怡辰則以「北鎮武裝流民的結合」，來界定這批主要由懷朔鎮軍民所組成的北鎮集團。㉒ 北周末楊堅以丞相府為權力中樞收編北鎮勢力及其後裔，㉓ 虞弘不但參與其中並藉機鞏固粟特人的軍事實力。

北周大象二年（580）五月北周宣帝宇文贇病逝，外戚左丞相楊堅輔佐靜帝宇文闡，掌握實權。六月相州總管尉遲迥（561-580）舉兵，並計畫與北方突厥聯合，這是楊堅代周所面臨的最大挑戰。開皇二年（581）突厥沙鉢略可汗（攝

⑳（唐）魏徵等撰，《隋書》，卷25，〈地理中〉：「雁門郡後周置肆州。開皇五年改為代州，置總管府。」、「西河郡後魏置汾州，後齊置南朔州，後周改曰介州。」（頁852）

㉑ 浜口重国，〈東魏の兵制〉，《東洋学報》，24卷1號（1936），頁35-69。收入氏著，《秦漢隋唐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66），頁136-168。中譯見濱口重國著，林靜薇譯，〈東魏的兵制〉，《早期中國史研究》，9卷1期（2017），頁127-168。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臺北：文津出版社，2006），頁41-59。

㉒ 康樂，〈代人與鎮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本4分（1991），頁895-916。康樂，《從西郊到南郊—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臺北：稻鄉出版社，1995），頁88-98。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頁59。

㉓ 呂春盛，《關隴集團的權力結構演變—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頁311-3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命四十萬騎兵南下，展開全面攻勢。㉔ 開皇三年（583）隋文帝以虞慶則等人為元帥討伐突厥，隔年雙方締結和平協議。山下將司指出楊堅為了對抗相州總管尉遲迥，讓虞弘統領并州鄉團以鞏固此軍事要地，並推測虞弘所統領的鄉團並非漢人鄉兵，而是以粟特人為首的西胡鄉團。㉕ 實際上除了東方的尉遲迥之外，北方突厥也是一大威脅。晉陽自東魏、北齊以來為主力騎兵部隊出擊柔然叛軍與突厥的根據地，在隋代初年仍是對抗突厥南下的軍事重鎮。

虞慶則與虞弘的關係同樣值得注意，虞慶則本姓魚，應該與虞弘出身的魚國有關。㉖ 據《隋書》卷四十〈虞慶則傳〉，祖上追隨夏國赫連氏而居於靈武（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縣），「代為北邊豪傑」。虞慶則身長八尺，「有膽氣，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㉗ 鞬為裝弓之袋，可知虞慶則以左右手皆能射箭而聞名。㉘ 宣政元年（578）北周武帝親征突厥之際「授儀同大將軍，除并州總管長史」，宣政至大象年間擔任石州總管。㉙ 石州（治所離石，山西省呂梁市）為北周所置，位在并州西側，與介州相鄰。㉚ 如前述，大象二年（580）虞弘「遷領并、代、介三州鄉團」，可

㉔ 隋初與突厥的關係參見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87-105。劉健明，《隋代政治與對外政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頁197-230。平田陽一郎，〈周隋革命と突厥情勢——北周千金公主の降嫁を中心に——〉，《唐代史研究》，12期（2009），頁27-56，收入氏著，《隋唐帝国形成期における軍事と外交》（東京：汲古書院，2021），頁52-96。

㉕ 山下将司，〈新出土史料より見た北朝末・唐初間ソグド人の存在形態—固原出土史氏墓誌を中心に〉，《唐代史研究》，7期（2004），頁60-77，特別是頁66。山下将司，〈北朝時代後期における長安政權とソグド人—西安出土「北周・康業墓誌」の考察—〉，收入森安孝夫，《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シルクロード東部の民族と文化の交流—》（東京：汲古書院，2011），頁113-140。山下将司，〈漢文墓誌より描く六世紀華北分裂期のソグド人〉，《日本女子大学紀要・文学部》，69號（2020），頁41-54。

㉖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209。石見清裕編，《ソグド人墓誌研究》，頁141。

㉗（唐）魏徵等撰，《隋書》，卷40，〈虞慶則傳〉，頁1174。

㉘（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72，〈董卓傳〉：「為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李賢注引《方言》：「所以藏箭謂之服，藏弓謂之鞬。」（頁2310）

㉙（唐）魏徵等撰，《隋書》，卷40，〈虞慶則傳〉，頁1174。

㉚ 王仲犖，《北周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1980），下，頁8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知虞慶則擔任并州職官的時間略早於虞弘並有所重疊。兩人先後擔任并州武職並活躍於山西中部，均與北方邊境的軍事動向有關。此外，虞慶則還曾出使突厥，擔任雙方合議的要角，有功於突厥稱臣，㉛ 亦令人聯想起虞弘與其父君陀擔任外交使節的長才。

前引《虞弘墓誌》誌文的最後記有「開皇轉儀同三司，勅領左帳內，鎮押并部」。可知由於虞弘護主有功，開皇元年（581）二月隋代建國之後，奉隋文帝敕命擔任「左帳內」並「鎮押并部」，持續維持在晉陽一帶的政治軍事地位。㉜ 約在此同時，虞慶則進位大將軍，遷內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正三品），開皇二年任元帥討伐突厥，後遷尚書右僕射（從二品），近於宰相。㉝ 相較於維持地方武力的虞弘，虞慶則晉升中央參預朝政，官品極高，遠非虞弘所能比擬。

周隋禪讓革命以及突厥的軍事威脅，再加上出自楊堅的丞相府，均有利於虞弘在粟特人聚落內保有較高的自治權並進而提升軍事實力。㉞ 先認識這段期間北亞地緣政治的變化，以及虞弘在北周、隋初持續統領鄉團的現象，將對於考察虞弘墓帶來重要的啟示。

二、虞弘墓石槨的新結構

（一）屋形石槨的新發展

虞弘墓石槨的形制可溯及北魏平城時期的屋型葬具，這一點學界已有所討論。近年隨著對於平城時期葬具研究的進展，可知部分屋型葬具兼具祭奠功

㉛ 突厥沙鉢略可汗曾言：「得做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唐）魏徵等撰，《隋書》，卷84，〈北狄・突厥傳〉，頁1869。

㉜ （唐）魏徵等撰，《隋書》，卷28，〈百官志下〉：「王公已下，三品已上，又並有親信、帳內，各隨品高卑而制員。」（頁782）

㉝ （唐）魏徵等撰，《隋書》，卷40，〈虞慶則傳〉，頁1174。（唐）魏徵等撰，《隋書》，卷27，〈百官志・中〉，頁785。唐長孺，〈讀隋書札記〉，收入氏著，《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293-309。

㉞ 石見清裕編，《ソグド人墓誌研究》，頁1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能，被稱為「石堂」、「神祠」，具有地下祠堂的性質。平城時期石堂除了用來安置死者的身體並模擬死者生前的居住空間之外，還賦予祭奠神魂的儀式功能，成為葬祭合一的新型葬具。㉟ 虞弘墓石槨台座下側中央刻有祆教火壇與人身鳥足的祭司，具有祭祀功能，可歸屬於這種葬具的發展脈絡。除此之外，虞弘墓石槨的結構還出現三項新發展：第一、屋型石槨與石牀相結合；第二、藉由多重分層來增加高度；第三、增加石獅頭座墊。

報告書中曾指出虞弘墓石槨的特點之一為底部有箱型基座。㊱ 據報告書的描述：「此葬具具有基座，基座四周有壺門，上面還鋪蓋平整漢白玉石板，起著棺牀的作用，死者有可能是直接放在此石板上的。基座既為棺牀，整體似稱石槨為妥」，㊲ 報告書中注意到底座具有類似棺牀的特點，認為漢地粟特人的屋形葬具可分兩類：其一為史君墓石堂，石堂內另有石牀；其二為虞弘墓石槨，「有專門帶雙壺門的槨座，起著石榻的作用」。㊳

為了瞭解虞弘墓石槨的特點，可與陝西西安北周大象二年（580）史君墓石堂相比較（圖23）。㊴ 石堂位在墓室中部偏北側，東西長2.46、南北寬1.55、高

㉟ 齊香鈞，〈北朝至隋墓葬出土石堂再研究〉，《安陽師範學院學報》，2014年6期，頁68-73。Shing Müller, “Funerary Beds and Hous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n Shing Müller, Thomas O. Höllmann, Sonja Filip eds., *Early Medieval North China: Archaeological and Textual Evidence* (從考古與文獻看中古早期的中國北方)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9), pp. 383-474. 李梅田，《葬之以禮：魏晉南北朝喪葬禮俗與文化變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頁154-155。林聖智，〈墓葬與佛教：重探北魏平城時期的屋形葬具〉，《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53期（2022），頁45-148。

㊱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159。報告書中曾指出虞弘墓石槨的幾項特點：第一、石槨底部有箱型基座；第二、設有五根八角形廊柱；第三、石槨壁板之間以鐵扒釘連結；第四、圖像製作的方式多樣，主要為彩繪浮雕，另有僅用彩繪或墨繪。第五、以漢白玉製作，材質考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159。

㊲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47，注64。

㊳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163。

㊴ 楊軍凱，〈北周史君墓石槨東壁浮雕圖像初探〉，《藝術史研究》，5輯（2003），頁189-198。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市北周史君石槨墓〉，《考古》，2004年7期，頁38-49。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北周涼州薩保史君墓發掘簡報〉，《文物》，2005年3期，頁4-33。楊軍凱，〈入華粟特聚落首領墓葬的新發現—北周涼州薩保史君墓石槨圖像初釋〉，收入榮新江、張志清主編，《從撒馬爾干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58公尺，內部安置一件高約10公分的石榻。㊵ 史君墓石堂的形制繼承北魏平城時期以來的屋型葬具。㊶ 自北魏平城時期以來屋型葬具內部多設有石牀，直到北周史君墓均是如此。㊷ 北魏的石牀可以獨立使用，也能安置於石堂內部，用來界定內部空間。相較之下，虞弘墓則大為不同。虞弘墓石堂內部平鋪六塊白玉石板，並未區隔出可安放石牀的空間，而是將石牀做為石堂的底座，以石牀乘載石堂，成為牀上架屋的新型雙重結構。

報告書中將虞弘石槨分為頂部、槨身、槨座三個部分。不過如果就圖像、裝飾與結構之間的關係來看，可以進一步加以細分。虞弘墓石槨具有多重結構，由下而上大致可分為五層：第一、石獅頭座墊；第二、槨座下層的武士、人身鳥足祭司、奏樂天神；第三、槨座上層位在弧形龕內的天神；第四、獅牛相鬥、有翼馬等；第五、槨身正面與內側的天神及墓主圖像。以上這五層當中，第一、二、三層屬於槨座，第四、五層為槨身。槨身外側的奉侍者壁畫雖然在空間上位在同一層，但是就位階而言具有內外、主從的關係，地位應該低於上述所有的圖像。

虞弘墓石槨不僅在結構上較為複雜，高度也最高。虞弘墓高236公分，相較於史君墓石堂高158公分，差距78公分。藉由多重分層來增加葬具的高度，可視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頁17-26。後以〈西安北周史君墓石槨圖像初探〉為題，收入《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法國漢學 第10輯：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3-15。Frantz Grenet, Pénélope Riboud et Yang Junkai, “Zoroastrian Scenes on A Newly Discovered Sogdian Tomb in Xi’an, Northern China,” *Studia Iranica*, no. 33 (2004), pp. 273-284.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編著，楊軍凱著，《北周史君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㊵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編著，楊軍凱著，《北周史君墓》，頁62。

㊶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北朝粟特石堂缺底座，無法得知完整結構。葛承雍，〈北朝粟特人大會中祆教色彩的新圖像—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北朝石堂解析〉，《文物》，2016年1期，頁71-84。

㊷ 北魏平城時期屋型葬具的研究參見張慶捷，〈北魏石堂棺牀與附屬壁畫文字——以新發現解興石堂為例探討葬俗文化的變遷〉，收入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兩個世界的徘徊：中古時期喪葬觀念風俗與禮儀制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頁233-249。Shing Müller, “Funerary Beds and Hous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pp. 383-474. 林聖智，〈墓葬與佛教：重探北魏平城時期的屋形葬具〉，頁45-1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虞弘墓石槨的重要特點。推測其目的在於凸顯石槨的地位並彰顯墓主身分。此外，相較於同時期的北朝墓葬，漢地粟特人偏好使用分層的方式來表現人物、天神的位階，可能有其粟特文化與視覺傳統的淵源。

另外，藉由增加分層來凸顯主尊的地位，以及在臺座上疊加臺座的做法，最早可見於佛教造像。北魏太和元年（477）金銅佛坐像（國立故宮博物院）中，以具有四足的方形座為下層，其上疊加束腰形須彌座，成為雙層寶座。雙獅位在方形座與須彌座之間，以此為分界，須彌座的尊貴性高於方形座（圖24）。至北魏洛陽時期則進一步分為三層，大都會博物館藏北魏正光五年（524）金銅佛造像高76.9公分，由下而上分別疊合兩個方形座，最上層為蓮花座（圖25）。[43] 在北齊至隋代的佛教造像中可見提高臺座並分為數層的新結構，例如河北曲陽出土北齊〈劉氏家族造思惟菩薩白石像〉（北京故宮博物院，圖26）的臺座分為三層，最底層刻有雙獅，可與虞弘墓石槨相對照。[44]

關於槨座值得進一步討論。報告書中的描述不一，稱為「底座」、「槨座」、「基座」。本文根據其形制與圖像，認為稱「石牀」較為貼切。此石牀結構獨立，長247、寬136、高54.5公分。報告書中將這種形制的葬具稱為「石槨」，學界也多延續此一稱呼。石槨的英文譯為sarcophagus，槨座則譯為sarcophagus base。「石槨」做為一個學界可共用、溝通的名稱，具有其泛用性。然而此名稱本身卻隱含一個陷阱，也就是會讓人以一般的石槨概念來理解，卻忽略了其中的新結構。[45] 虞弘墓石槨其實具備完整的石牀結構，應該視為石堂與石牀的新型綜合體。其獨特之處在於工匠採用上下疊加的方式來整合北魏平城時期以來石堂與石牀這兩種葬具形制，並鋪設石獅頭座墊為基底。關於虞弘墓石槨的喪葬功能，除了表象天界並做為神魂所憑之處，兼具葬祭合一的功能之外，還藉由增加高度來彰顯墓主的尊榮與威勢。這種新型結構出自對於北朝葬具傳統的融合與再造，代表隋代葬具的新創製。

---

[43] 席克曼（Laurence Sickman）稱這類結構為祭臺。Laurence Sickman and Alexander Soper,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06.

[44] 馮賀軍，《曲陽白石造像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101-106。

[45] 宋馨已指出稱為之石槨不妥，並認為應以石牀為主體。Shing Müller, "Funerary Beds and Hous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p. 4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類似的雙層石牀結構也可見於北周至隋代甘肅天水粟特人圍屏石牀（圖27），通高1.23、寬1.15、高2.18公尺，由砂岩製成。㊻ 正面牀座高0.31公尺，由兩塊石板砌成，右小左大，右側長0.6、左長1.2公尺。此牀座的特殊之處在於上下分為兩層，上層有六個壺門，其中各有一伎樂天人，下層同樣分成六格，內有畏獸，均呈正面，或舉臂支撐牀座，或做飛馳狀。一般牀座的基本結構是在下層雕飾壺門，但在此卻是分為上下兩層，形成重疊的效果。詳觀最下層的結構，畏獸之間以柱狀物區隔，向上與壺門之間的垂足相接連，底部則以反轉的捲紋收尾。這兩層壺門在圖像、結構上均相互呼應。此外，由石板裁切的方式，也可知工匠將上下壺門視為一體。這種雙層一體的壺門結構可提高牀座的高度。此外，這種雙層壺門結構猶如將兩件石牀套疊而形成牀上加牀的視覺效果，可視為唐代「重牀」的先聲。㊼

在陝西西安隋大業四年（608）李靜訓墓中同樣可見到加高葬具底座的現象（圖28）。㊽ 李靜訓墓中出土長方形石槨，長2.8、高1.61、寬1.1公尺，由底

㊻ 天水市博物館，〈天水市發現隋唐屏風石棺牀墓〉，《考古》，1992年1期，頁46-54。馬琳燕，〈甘肅天水隋唐彩繪圍屏石榻的保護與修復〉，《文物》，2013年7期，頁83-89。李寧民，〈天水出土屏風石棺牀再探討〉，《中原文物》，2013年3期，頁85-105。李寧民，〈天水出土屏風式石棺牀的修復及研究〉，收入榮新江、羅豐主編，《粟特人在中國：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上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6），頁191-206。

㊼ 「重牀」一詞首見於唐代。（唐）姚汝能撰，《安祿山事迹》，卷上：「潛于諸道商胡興販，每歲輸異方珍貨百萬數。每商至，則祿山胡服坐重牀，燒香列珍寶，令百胡侍左右，羣胡羅拜於下，邀福於天。」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傳記類》，550冊（清宣統三年葉氏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頁7。張廣達認為北朝粟特人墓葬如安伽墓中出土的石牀即是「重牀」，沈睿文承此說。然而考古實物的年代遠早於文獻，或許不妨反過來設想。亦即北朝晚期至隋代天水圍屏石牀中所見的雙層壺門結構，以及北朝佛教造像的多層臺座，均表現出「重牀」一詞出現之前的實物發展。張廣達，〈再讀晚唐蘇諒妻馬氏雙語墓誌〉，收入氏著，《文本、圖像與文化流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250-273，特別是頁269。沈睿文，〈論墓制與墓主國家和民族認同的關係—以康業、安伽、史君、虞弘諸墓為例〉，頁17-58。

㊽ 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靜訓墓發掘簡報〉，《考古》，1959年9期，頁471-47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唐長安城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3-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部、四壁、槨蓋所組成。槨底由三塊長1.5公尺的方形石板拼成，推測底座高度約為18公分。槨內有一具屋形石棺，均由青灰色石灰岩製成，長1.92、寬0.89、高1.22公尺，其形制模擬面闊三間的木構殿堂。屋形石棺由一塊完整的石板所組成，長218、寬104公分。報告書中未計算其高度，就比例尺來看，推測高約25公分，約為虞弘墓石牀高度的一半。若將這件石棺底座的高度與石槨底座一併計算，則高度近於43公分。虞弘墓石槨座在由獅頭座墊乘載的狀況下，其高度約65公分。由此可知加高牀座、葬具的高度應是隋代的新發展。

（二）石獅頭座墊的來源

在虞弘墓石槨的結構中出現的獅頭座墊為新式構件，未見於過去的屋型葬具，值得關注。報告書中稱為「石獅頭座墊」，材質與石座、石槨相同，採用漢白玉雕刻，可視為整體石槨結構的一部分。追溯其源流，推測是自北朝石牀發展而來。波士頓美術館藏有一件北魏洛陽時期的石牀，兩側牀足各有一淺浮雕的獅子。北齊至隋粟特白玉石牀（Shelby White 與 Leon Levy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兩側壺門中有雙獅，其位置偏下，可知地位低於武士與祭司（圖29）。陝西西安北周天和六年（571）康業墓圍屏石牀左右兩側牀足同樣可見獅子，採用高浮雕的方式製作，成為以獅子支撐牀座的態勢（圖30）。[49] 北周大象二年（580）史君墓石堂門檻形成六級台階，左右兩側各有雙獅與四名童子的雕刻，報告書稱為童子戲獅浮雕。

值得注意的是虞弘墓石獅頭座墊與太原墓葬石門構件的相關性。山西太原北齊武平元年（570）東安王婁叡墓、山西太原北齊武平二年（571）徐顯秀墓中均可見石門，石門由半圓形門額、石門、邊框與底部門檻、獅首門砧所組成。[50] 發掘當初婁叡墓的石門還保留鮮明的色彩，兩側門框以黑色為底，搭配朱色為主調的半忍冬紋飾帶。門楣中央有正面獸首，左右為朱雀，橫梁淺浮

[49]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北周康業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6期，頁14-35。相關研究的彙整參見林聖智，《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頁271-272。

[5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齊東安王婁叡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北齊徐顯秀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10期，頁4-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雕五枚正面蓮花門簪，可見局部貼金的痕跡，其雕工均整細緻，呈現出華麗而隆重的視覺效果（圖31）。徐顯秀墓石門華麗的程度未及婁叡墓，不過布局結構大致相同，橫梁同樣刻有五枚蓮花門簪，且石門底部均鋪設獅首門砧（圖32）。獅首門砧不僅具有守護墓門的象徵性，還可用來傳達武將的威勢，是表現晉陽高階武人政治軍事身分的重要指標。

婁叡墓中還出土八件石獅，口中銜銅環，有底座，以青石製成（圖33）。由於出土位置靠近石帳座，這八件石獅應該是分屬兩套帳座的配件。據報告書銅環中應穿有繩索與帳相接，可知以其重量來固定帳座。[51] 這八件石獅採青石製作，雕工精巧，表情姿態各不相同。其造型與獅首門砧相近，應由同一批作坊所製作，表現出晉陽官方作坊在石雕工藝上的高度水平。

由婁叡墓可知在北齊晉陽已可見大量運用石獅來做為帳座的配件。值得注意的是每件帳座有四個石獅，具有鎮守四方或四角的用意。虞弘墓石槨中出現八件石獅頭座墊，每個方位各有兩件，朝向四方，與婁叡墓的帳座石獅的布局具有類似性。婁叡墓石門獅首門砧的形制尤其與虞弘墓石獅座墊相似。可推測工匠製作虞弘墓石槨時曾參考晉陽的地域墓葬傳統，轉用獅首門砧以及帳座石獅來做為石牀座墊。虞弘墓創造性地運用既有墓葬中的石門配件來改造石槨形制，此現象對於如何看待虞弘墓石槨製作的工藝來源與特點，頗富啟發性。

北齊晉陽墓葬傳統延續至隋代，學者多有指出。山西太原南郊出土隋開皇十七年（597）斛律徹墓為磚築單室墓，由墓道、天井、甬道、墓室所組成。[52] 天井與甬道之間設有石門，由上方的半圓形石門額，以及石門楣、石門、門檻等配件所組成。門檻兩端各置一石墩，前半雕出高浮雕的獸首與前爪，呈伏臥狀，後半部為門砧，以砂岩製成（圖34a、b）。此獸首的造型與虞弘墓石獅頭座墊相類，應該也是表現石獅。斛律徹為北齊名將斛律光（515-572）之孫，出身武人勳貴，在隋初仍受朝廷禮遇。斛律徹墓的石門與獅首門

[5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齊東安王婁叡墓》，頁150-156。

[5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太原隋斛律徹墓清理簡報〉，《文物》，1992年10期，頁1-1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沙溝隋代斛律徹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砧的造型與虞弘墓的石獅座尤其類似，無疑是沿襲自北齊晉陽高階武將的墓葬傳統。[53] 實際上斛律徹墓與虞弘墓、婁叡墓均位在太原西南郊，斛律徹墓與虞弘墓相距約18公里，虞弘墓與婁叡墓更僅相距600公尺（圖35）。可以想見這類伏獅石墩是由這一地區的墓葬石匠作坊所製作。此外，在北齊末年皇族墓葬中已使用白玉石獅，虞弘墓並非首例。較婁叡墓略晚的河北磁縣北齊武平七年（576）高潤墓曾出土三件帳座石獅，鼻有鐵圈，高30公分，以白玉製作（圖36）。[54] 高潤為高歡第十四子，可知白玉石獅為北齊皇族的高級隨葬品。

概括虞弘墓的石獅頭座墊的淵源，在圖像布局上發展自石牀座兩側做為守護的獅子，在形制與工藝技術上直接採自石門的伏獅石墩，並轉用帳座石獅的布局，且增加石獅數量，形成朝向四方的布局，進一步強化石獅守護牀座的功能。[55] 由此特點來看，虞弘墓的石牀可稱為「獅子牀」、「獅子座」，[56] 不但具有守護墓主的功能，也繼承晉陽北鎮武人的墓葬傳統。

（三）晉陽北鎮武人墓葬中的平城傳統

過去學者對於晉陽北鎮武人墓葬的研究，無論是針對壁畫或是隨葬陶俑，主要都集中在與鄴城的比較。相對於此，本文則關注晉陽與平城之間的相關性。如果說鄴城墓葬代表最新型的北齊墓葬文化，晉陽墓葬則保留較多代北的因素。

隨著東魏、北齊北鎮武人集團的崛起，其墓葬文化在既有的北魏、鮮卑墓葬文化的基礎上呈現新的發展。晉陽（山西太原）為北齊霸府所在，也是東

---

[5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沙溝隋代斛律徹墓》，頁94。另外在西安地區隋代墓葬中也可見到石獅門墩，其姿態不同於太原地區，例如西安郭家灘隋姬威墓。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郭家灘隋姬威墓清理簡報〉，《文物》，1959年8期，頁4-7。

[54]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北齊高潤墓〉，《考古》，1979年3期，頁235-243、234。

[55] 由於虞弘墓的墓道遭受嚴重破壞，報告書中並未明言是否曾設有石門。不過若參考其他粟特人或晉陽地區高級將領的墓葬，似乎不能排除配有石門的可能性。

[56] （南朝宋）劉義慶，《幽明錄》，〈趙泰〉：「此三人即入門，見大殿珍寶耀日，堂前有二獅子並伏，負一金玉床，云名『獅子之座』。」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頁7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魏、北齊以懷朔鎮鮮卑人為主體的北鎮武裝集團的根據地。[57] 下葬於這一地區的北鎮武人形成有別於洛陽、鄴都的墓葬文化。其中可見不少保留了代北平城的因素，同時又被重新改造的墓葬文化。[58] 這批北鎮武人集團形成尚武的武人品味，保留於北齊晉陽一帶的墓葬之中，直到隋初依然可見。北鎮武人的墓葬中雖未使用石質葬具，但其壁畫、陶俑可提供有益的線索。

晉陽高階武人墓葬中配有石門，五枚正面蓮花門簪的裝飾布局以及石獅墩構件均延續自北魏平城時期。[59] 山西大同太和元年（477）宋紹祖墓石槨是目前所知平城時期等級最高、結構最為複雜的屋形葬具。此葬具石門的門楣刻有五枚正面蓮花門簪，下方有兩件「虎頭門枕」（圖37）。[60] 太和五年（481）孝文帝為文明皇太后在平城北側的方山建造永固陵，完成於太和八年（484）。永固陵在甬道前後各有一大型石卷門，其底部計有四個「虎頭門墩」，全長85公分，以灰白色細砂石雕造（圖38）。[61] 永固陵墓道中部出土一件石雕武士立

---

[57] 王怡辰，《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頁41-133。

[58] 渠傳福，〈徐顯秀墓與北齊晉陽〉，《文物》，2003年10期，頁50-52、65。小林仁，〈中国北齊時代の俑にみる二大様式の成立とその意義〉，《佛教藝術》，297號（2008），頁48-70。收入氏著，《中国南北朝隋唐陶俑の研究》（京都：思文閣出版，2015），頁161-195。劉瑋琦，〈試論東魏北齊時期官方樣式——鄴城與晉陽隨葬俑的特徵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1卷1期（2013），頁1-62。

[59] 朱安耐已指出這個現象。Annette L. Juliano, *Unearthed: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form Northern China* (Massachusetts: Sterling and Francine Clark Art Institute, 2012), p. 46.

[6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紹祖墓發掘簡報〉，《文物》，2001年7期，頁19-39。張志忠，〈北魏宋紹祖墓相關問題的研究〉，《文物世界》，2007年4期，頁13-15。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劉俊喜主編，《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頁71。簡報指出五枚蓮花門簪的布局與雲岡石窟第九、十窟拱門門楣布局之間的關係。Annette L. Juliano, *Unearthed: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form Northern China*, p. 51.

[61] 宿白，〈盛樂、平城一帶的拓跋鮮卑——北魏遺迹——鮮卑遺迹輯錄之二〉，《文物》，1977年11期，頁38-46。大同市博物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7期，頁29-35。村元健一，〈北魏永固陵の造營〉，《古代文化》，52卷2號（2000），頁18-28。收入氏著，《漢魏晉南北朝時代の都城と陵墓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6），頁339-366。岡村秀典、向井佑介，〈北魏方山永固陵の研究：東亞考古學會一九三九年收集品を中心として〉，《東方學報》，80冊（2007），頁69-150；大同市博物館，〈大同北魏方山思遠佛寺遺址發掘報告〉，《文物》，2007年4期，頁4-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俑，材質為灰白色細砂石，殘高57公分（圖39）。石造俑可能是北魏平城時期皇族墓葬的傳統，虞弘墓石俑的淵源可追溯至此。另外，大同市博物館藏有一套2013年大同東信廣場出土的石門構件，門楣刻有五朵正面蓮花，門框下方有兩個獸首門墩（圖40）。

這類石門裝飾與構件未見於北魏洛陽時期高等級墓葬。延昌四年（515）宣武帝景陵設有石門，由青石製成，均平滑無飾。[62] 北魏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薛懷吉出身河東薛氏，下葬於孝昌二年（526），其墓中雖然設有石墓門，也未見獸首一類的構件。[63] 由此可知晉陽高階武人墓葬的石門配置重新採用平城時期的墓葬傳統，以獅代虎，並進一步加以細緻化、繁複化。

三、虞弘墓與北鎮武人的墓葬文化

（一）蓮花變形紋

虞弘墓石槨中可見到數種造型奇特的花形紋，報告書中稱為花朵，本文則稱為蓮花變形紋。第一、漂浮於空中的蓮花變形紋。以正面東側板為例，駿馬頸部上方有一株花朵，有四瓣，兩側各有一個圓圈，表現花朵浮游於空中（圖41）。同樣的花紋可見於石槨內部中央下欄人獅搏鬥圖的東側。第二、生長自地面的蓮花變形紋。正面東側板下欄有翼馬的後方，可見從表示地面的弧狀石塊輪廓生出一花朵，同樣有四瓣，並在頂部伸出三根頂部為圓形的飾物（圖42）。這種生長自地面的蓮花變形紋也可見於石槨內部西壁北側下欄的畫面中，位在羊的前後。第三、位在地面的蓮花紋母題。這類母題未附莖葉，蓮房高起，可見於東壁前側石板、北壁東側石板的地面。第四、圓圈狀。獨立出現或是與蓮花相組合，散見於各畫面。

---

[6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洛陽古墓博物館，〈北魏宣武帝景陵發掘報告〉，《考古》，1994年9期，頁801-814。

[6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運城市文物保護中心、萬榮縣文化和旅遊局，〈山西萬榮西思雅北魏薛懷吉墓發掘簡報〉，《文物》，2023年1期，頁4-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於這類蓮花變形紋的來源，朱安耐以二世紀印度阿姜塔（Ajanta）石窟第十窟壁畫為例，認為具有印度文化因素。[64] 就華北的考古材料而言，類似的蓮花母題可見於北魏平城時期的壁畫墓。山西大同北魏雲波里路壁畫墓具有鮮明的佛教因素，南壁下方殘存力士像，尚可見披帛與雙足（圖43）。[65] 足下有一朵蓮花，以半忍冬紋為葉片，右側為朱色，左側為淡青色，有所區別。蓮花中央以細朱線勾勒圓圈。蓮花的上側並長出三個葉片狀飾物，以中央為主體，描繪成朱色。

最近報導的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壁畫墓中出現大量的蓮花紋。[66] 以甬道東壁為例，中央為呈胡跪姿態的武士，右手舉刀，左手執盾，下方為比例較小的人面獸身像（圖44）。在周圍背景可見六朵蓮花紋，各自獨立，其形狀類似蓮苞，由二至三層的蓮瓣組成。頂部另長出一朵花瓣狀或燭火狀物，左右另以細線描繪垂墜飾物（圖45）。蓮莖底部則呈倒捲狀。北壁繪有墓主圖像，墓主坐於黑色的牀榻上，在牀榻的下方中央有一朵描寫較為均整細緻的蓮花，應該具有特殊的地位（圖46）。此蓮花自地面生長，左右配以對稱的半忍冬紋，右側為淡青色，左側為淡朱色。中央蓮瓣分為三層，頂部同樣有一朵花瓣狀或燭火狀物。此蓮花位在墓主圖像的正下方，應該具有標誌墓主身分的作用。

這兩座壁畫墓中的蓮花紋的類似點是蓮花自成獨立單元，在頂部添加三個飾物，並以中央的花瓣狀或燭火狀物為主體。差異之處在於雲波里路壁畫墓蓮花紋的花瓣呈環狀並列，與畫面下緣相接，而七里村北魏壁畫墓的蓮花紋則是上下堆疊，且多浮游於虛空之中。

上述墓壁畫中的蓮花紋應該是模仿自同時期佛教藝術的裝飾傳統。例如雲岡石窟第十八窟南壁中層西側雕有《阿輸迦施土因緣》（圖47）。[67] 佛像右手

---

[64] Annette L. Juliano, “Converging Traditions in the Imagery of Yu Hong’s Sarcophagus: Possible Buddhist Sources,” p. 32.

[65]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雲波里路北魏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11年12期，頁13-25。

[66]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M29發掘簡報〉，《文物》，2023年1期，頁33-57。

[67] 水野清一，〈雲岡石窟における二三の因緣像〉，收入羽田博士還曆記念會編，《東洋史論叢　羽田博士頌壽紀念》（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0），頁867-873。另收入氏著，《中國の佛教美術》（東京：平凡社，1968），頁272-2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側自地面長出一株花莖彎曲的蓮花，葉片為半忍冬紋，頂部有兩朵蓮花，內有化生童子。敦煌莫高窟第125窟與第126窟之間出土北魏太和十一年（487）《刺繡供養圖》（敦煌文物研究院），推測為廣陽王元嘉所供養（圖48）。其中第二、三位女性供養人附有榜題，分別是「廣陽王母」、「妻普賢」，兩人均手持蓮花，頂部呈圓形，長出三蕊。[68] 其造型與位在正面東側板下欄有翼馬後方的第二類蓮花變形紋最為類似，可視為後者的原型。

類似的母題流傳至河南洛陽龍門石窟。路洞始鑿北魏晚期並延續至北齊，其正壁右側供養比丘像的前方有一株蓮花，頂部有化生童子（圖49）。這類母題可視為虞弘墓石槨中第一、二類蓮花變形紋的原型。此外，在龍門石窟中亦可見第三、四種蓮花變形紋，例如路洞北壁上層東側屋形龕的下方（圖50）、古陽洞北壁第三層第一龕的龕楣等處（圖51）。[69]

駿馬與蓮花變形紋的組合同樣可見於雲岡石窟。雲岡石窟第六窟南壁下層佛傳圖浮雕《出家踰城》中，四位天神展現神通力托舉悉達太子乘愛馬犍陟的四足，飛越城門騰空而去（圖52）。[70] 馬頸上方有一株蓮花，頂部為圓形，左右各有一葉片。其他四門出遊的佛傳圖中雖有悉達太子騎馬的形象，然而均未見頸上附有蓮花，可知蓮花用來暗示天界，並象徵諸天所展現的神通。將《出家踰城》與虞弘墓石槨正面東側板的駿馬相比較，可知其間具有明確的承繼關係。

上述這幾種蓮花變形紋的特點為獨立出現，用來暗示畫面場景或背景，並未形成一組連續性的紋飾帶。這幾種蓮花變形紋未見於北朝晚期至隋代的壁畫墓，在其他粟特人葬具中也並不常見。在傳河南安陽出土北齊粟特圍屏中，正面左側圍屏的中央為墓主騎馬出行圖，中央墓主下方有一石塊，並長出一株類似蓮花的摩尼寶珠（圖53）。[71] 此母題可視為蓮花變形紋的一種，推測是用來

---

[68] 敦煌文物研究所，〈新發現的北魏刺繡〉，《文物》，1972年2期，頁54-60。

[69] 龍門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編，《中國石窟 龍門石窟》，一（東京：平凡社，1987），圖版158、209、220。

[70]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暦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查報告》，第三卷 第六洞本文（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5），頁55。

[71] Gustina Scaglia, “Central Asians on a Northern Ch’I Gate Shrine,” *Artibus Asiae*, vol. 21, no. 1 (1958), pp. 9-28. 姜伯勤，〈安陽北齊石棺牀畫像石的圖像考察與入華粟特人的祆教美術〉，《藝術史研究》，1輯（1999），頁151-186。後以〈安陽北齊石棺牀畫像石與入華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標誌墓主獨特的地位，在安陽粟特圍屏中僅出現一次，但是在虞弘墓石槨中則被重複運用，不只數量增加，位置也更為顯著。

經由以上考察可知虞弘墓石槨中所見各類蓮花變形紋具有北魏淵源。虞弘曾活躍於北齊，然而其石槨的蓮花變形紋卻不同於河北邯鄲北齊響堂山石窟，反而是以北魏平城佛教藝術的裝飾傳統為原型。關於虞弘墓石槨中採用平城時期裝飾母題的原因，可由漢地粟特人對於北魏歷史記憶的觀點來探索，安陽北齊粟特圍屏中的石塊造型具有平城淵源，其中的蓮花變形紋也可做如是觀。[72] 除此之外，可由虞弘所統轄的勢力範圍與地緣關係來加以理解。如《虞弘墓誌》所見，父君陁曾擔任東魏朔州刺史，僑置於并州一帶。北周末年虞弘「遷領并、代、介三州鄉團，檢校薩保府」，涵蓋今山西中北部，可知其家族在這一地域已經營兩代之久，以其地利之便，有機會接觸平城的裝飾傳統。這類裝飾母題在隋代已具有「古樣」的性質，卻被刻意運用至粟特、中亞圖像之中，既是復古的表現，也是對於代北傳統的再確認。

（二）鸚鵡的意涵

在虞弘墓石槨中多處刻畫鸚鵡母題，這種母題未見於其他粟特人葬具，十分特殊。[73] 出現鸚鵡母題的部分包括：石槨正面東側石板右上方有一鸚鵡，口銜葡萄（圖54）；[74] 石槨內側東壁外側石板的上方，有一鸚鵡，頸部繫帶；石

特人的祆教美術—兼論北齊畫風的巨變與粟特畫派的關聯〉為題，收入氏著，《中國祆教藝術史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頁33-62，特別是頁53-54。

[72] 林聖智，〈北朝晚期漢地粟特人葬具與北魏墓葬文化——以北齊安陽石棺床為主的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本3分（2010），頁513-596。後以〈展現自我敘事：北齊安陽粟特人葬具與北魏遺風〉為題，收入氏著，《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9），頁221-270。

[73] 虞弘墓石槨中另有頸部繫帶的瑞鳥，屢見於其他漢地粟特葬具，具有薩珊王朝藝術的淵源。相關討論參見姜伯勤，〈安陽北齊石棺床畫像石的圖像考察與入華粟特人的祆教美術〉，頁166-167。鄭岩，《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增訂版）》，頁231-233。Judith A. Lerner, “Aspects of Assimilation: The Funerary Practices and Furnishings of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p. 25.

[74] 報告書中的描述是：「孔雀左側是一隻綠色小鳥，短嘴長尾，像是鸚鵡，正在銜一條葡萄的枝蔓。」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1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槨內側北壁東側石板左上方，有一鸚鵡口銜葡萄；北壁中央上方右側有兩隻、左側有一隻鸚鵡。整體看來，鸚鵡母題由正壁東側石板延伸至北壁墓主夫婦圖像的位置，集中在石槨的東側。另外，牀座四面均有由蓮花柱所構成的壁龕圖像，柱頂形成寶珠狀，附有反轉的鳥首（圖55）。報告書中描述為「向內回首的紅色鳳鳥」。[75] 然而鳥首的頭部渾圓，口喙尖而短，明顯不同於石槨門楣上的雙鳳鳥，而與石板上的鸚鵡母題相近，可推測為鸚鵡，以下將這些壁龕稱為「鸚鵡龕」。

鸚鵡圖像最早可見於魏晉時期河西壁畫墓。[76] 北魏平城時期雲岡石窟與墓葬石牀的紋飾中開始出現鸚鵡與葡萄的組合，形成新型紋飾。關於鸚鵡的圖像意義，在佛教的脈絡中鸚鵡被塑造成能聽聞佛法並獲得善報的靈鳥，此外與白鶴、孔雀、迦陵頻伽等並列為西方淨土中的瑞鳥。[77] 鄴城北吳莊出土北魏《譚副造釋迦像》背面線刻彌勒菩薩像，上方有雙鸚鵡立於佛教建築的屋簷。[78] 河北磁縣東魏武定八年（550）茹茹公主墓出土兩件長10公分的金飾，鑲嵌珍珠、琥珀、寶石，原來可能是服飾的配件（圖56）。[79] 其主體為一朵飄動的蓮蕾，上方有兩顆珍珠，左右分別是飛天與鸚鵡，自蓮蕾分出多根蓮莖，在頂部形成摩尼寶珠。寶珠左下方有一盤腿而坐的化生童子，朝向正面，右手握一較小的蓮蕾。寶珠右下另有一較大的鸚鵡。在這件飾物中鸚鵡與蓮花、童子化生相互組合，具有再生與祈福的象徵意義。[80]

---

[7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121。

[76] 王煜、陳珠伊，〈敦煌佛爺廟灣魏晉壁畫墓鸚鵡圖像初探〉，《敦煌研究》，2022年3期，頁31-38。林聖智，〈北魏平城時期石牀的系譜：裝飾的觀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4本1分（2023），頁59-154。

[77] 林聖智，〈北魏平城時期石牀的系譜：裝飾的觀點〉，頁81-84。

[7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著，《鄴城北吳莊出土佛教造像》（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頁2-4。

[79]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4期，頁1-15，特別是頁7。James C. Y. Watt,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p. 240.

[80] 另外北齊婁叡墓出土一件類似的金飾，殘長15公分，組成正面與側面蓮花、半忍冬紋等圖案，鑲嵌珍珠、瑪瑙、藍寶石等。其中可見一隻鸚鵡。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齊東安王婁叡墓》，頁16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北魏洛陽時期鸚鵡除了做為佛教的靈鳥、瑞鳥之外，還新增守衛、鎮護的意義。[81] 北魏正光五年（524）元謐孝子傳石棺（明尼亞波里美術館）前檔中央刻畫門形，頂部模仿佛龕的龕楣，內部排列半忍冬紋，兩側反轉捲起，形成朝內的鸚鵡首，相互對稱（圖57）。[82] 此處以鸚鵡取代龍首，可視為虞弘墓石槨座鸚鵡龕的來源。此外，在這件石棺兩側中央各有鋪首銜環，上方均配置一對鸚鵡，立於蓮花座上。元謐孝子石棺的上層表現出畏獸與各類瑞獸，均朝向棺首。這兩對鸚鵡則是位居中央，與鋪首相組合，就布局而言應該與其他的瑞獸分別看待。

左右棺板鸚鵡的姿態並不完全相同。左側板中左側鸚鵡回首，右側板中的鸚鵡口銜一串葡萄，朝向中央（圖58、59）。北魏平城時期的各式葬具多以鋪首做為配件，鋪首上方搭配天人、力士、護法神，且多與雙龍組合，用來增進鋪首的威嚇功能。相關實例可見於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漆棺墓的透雕銅鋪首，以及太和元年宋紹祖墓石槨外壁。在元謐孝子傳石棺中則是將雙鸚鵡與鋪首結合，成為新型的鋪首圖像，可知鸚鵡在北魏洛陽時期被賦予勇武的性格與守護的功能。

山西太原龍堡村北齊武平三年（572）北肆州六州都督、儀同三司□愔墓出土半圓形石門楣，高71公分。[83] 中央刻畫獸面，左右為對稱的高浮雕雙鸚鵡，位置醒目。鸚鵡頭頂似有羽飾，鳥喙較大，面露凶光，頸部較粗，身形健碩（圖60）。□愔墓石門楣的圖像布局大致與婁叡墓、徐顯秀墓相同，中央為獸面，不過以雙鸚鵡替代雙朱雀，同樣發揮鎮墓的功能。

陝西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中出土一件精美石棺，通長2.9、通高1.42、最寬處寬1.36公尺。棺蓋全長2.88公尺，滿刻以龜甲紋為單元的祥瑞母題。[84] 此墓葬

---

[81] 謝明良指出河北定州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靜志寺塔基出土的褐釉鸚鵡形注壺具有護衛寺院的功能，參見謝明良，〈鸚鵡杯及其他〉，《故宮文物月刊》，358期（2013），頁64-77，收入氏著，《陶瓷手記3 陶瓷史的地平與想像》（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頁7-21。

[82] 奥村伊九良，〈鍍金孝子傳石棺の刻畫に就て〉，《瓜茄》，1卷5冊（1939），頁359-382。黃明蘭，《洛陽北魏世俗石刻線畫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

[83] 渠傳福，〈徐顯秀墓與北齊晉陽〉，頁51。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晉陽古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等級極高，學者推測其墓主為隋代廢太子楊勇（？-604），這件石棺應是由官方作坊所製。[85] 此棺蓋祥瑞的種類繁多，共計有72個單元刻畫出祥瑞母題，包含龍、鳳、天馬、摩尼寶珠等，以中軸為中心，左右對稱，布局井然有序。中軸線自上而下計有六個祥瑞母題，分別是：寶瓶、摩尼寶珠、摩尼寶珠、鸚鵡、寶瓶、摩尼寶珠。其中雙鸚鵡反首相對，立於類似石榴狀的紋飾狀臺座之上，背後似有葡萄紋（圖61）。[86] 在這72個單元中鸚鵡僅出現一次，並且配置在中軸線的近中央處，相當於這套祥瑞的中軸核心，地位最為崇高。此處的雙鸚鵡除了當作瑞鳥之外，考慮到其他各類表現威嚇的神獸，可推測兼具守護的意義。

關於鸚鵡的守護功能與勇武性格，可參考玄奘《大唐西域記》卷第一〈迦畢試國〉的記載：

> 伽藍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坎地藏寶，質子之所藏也。故其銘曰：「伽藍朽壞，取以修治。」近有邊王，貪婪凶暴，聞此伽藍多藏珍寶，驅逐僧徒。方事發掘，神王冠中鸚鵡鳥像乃奮羽驚鳴，地為震動，王及軍人辟易僵仆，久而得起，謝咎以歸。[87]

迦畢試國（梵名Kapiśa，阿富汗喀布爾東北谷地）邊地的國王貪求寺院珍寶，發掘之際神王頭冠上的鸚鵡高聲鳴叫，大地為之震動，惡人最後謝罪而歸。鸚鵡僅僅高聲鳴叫即可卻敵，具有如同神王的護法威力。這段記載的年代雖已晚至初唐，但即使只由墓葬材料來看，北朝鸚鵡母題已具備守護功能，推測應另有佛教典據，但仍有待進一步考察。

---

[84]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5期，頁4-31。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編著，《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頁120-124。

[85]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編著，《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頁136。

[86]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編著，《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頁122。

[87] （唐）玄奘著，水谷真成譯，《大唐西域記》（東京：平凡社，1971），頁47-50。（唐）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第一，〈迦畢試國〉，頁1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至東魏、北齊鸚鵡被賦予另一層政治意涵。北魏永熙三年（534）高歡（496-547）擁立元善見（524-552）為孝靜帝後隨即遷都鄴城，北魏正式分為東西魏，據《北齊書》卷二〈帝紀・神武高歡〉：

> 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子，鸚鵡謂神武也。」[88]

青雀指清河王，青雀子指孝靜帝；鸚鵡指高歡，鸚鵡子指高歡第二子高洋（526-559，在位550-559）。在這一則具有讖緯性質的童謠中，藉由青雀子羽翮已成並化為鸚鵡子，來比喻高歡掌權以及北魏、東魏至北齊的一連串政權更迭。高歡之子高洋建立北齊後，追尊高歡為獻武帝，廟號太祖；天統元年（565）北齊後主高緯（556-577，在位565-577）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89] 此處以鸚鵡、神武來代表高歡，預示高歡將成就霸業。可以想見，這一則童謠當是出自高歡陣營的手筆，北齊建國之後解讀此童謠的好事者仍繼續營造有利於朝廷的政治輿論。

以鸚鵡代表高歡一事值得玩味。鸚鵡自北魏平城時期以來被視為能得善報的高貴靈鳥，為具有代人淵源的瑞鳥。[90] 高歡曾被視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再加上高氏政權深崇佛教，均促使鸚鵡成為象徵帝王的符號。[91] 此外，鸚鵡自北

---

[88]（唐）李百藥，《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18。又見（唐）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224。

[89]（唐）李百藥，《北齊書》，卷2，〈帝紀・神武高歡〉，頁24。

[90] 林聖智，〈北魏平城時期石牀的系譜：裝飾的觀點〉，頁81-84。

[91] 支持高歡的僧人利用河北地區的觀音信仰編撰《高王觀世音經》，視高歡為觀世音的化身，「高王」即為高歡。牧田諦亮，〈高王観世音経の成立—北朝仏教の一断面〉，《仏教史学》，12卷3號（1966），頁1-15。李玉珉，〈南北朝觀世音造像考〉，收入邢義田主編，《中世紀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與藝術》（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頁235-331。倉本尚德，〈『高王観世音経』の成立と観音像〉，收入氏著，《北朝仏教造像銘研究》（京都：法藏館，2016），頁416-456。高歡的崇佛參見諏訪義純，《中国中世仏教史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1988），頁203-2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魏洛陽時期以來具有守護的功能，其勇武的性格也適合用來比喻武功顯赫的高歡。進一步而言，以鸚鵡來代表高歡，可能蘊含著另一層高歡出身自代北懷朔鎮的寓意。

經由以上討論可知北朝鸚鵡母題具有三重意涵：北魏平城時期做為佛教靈鳥、瑞鳥；洛陽時期開始出現守護的功能；東魏、北齊進一步做為勇武的象徵，成為代表高歡的政治符號。由此可知鸚鵡在東魏、北齊皇室以及北鎮武人墓葬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有助於釐清虞弘墓石槨鸚鵡母題的意義。正面東側石板畫面上方的口銜葡萄的鸚鵡可視為瑞鳥，表現天國淨土。槨座的鸚鵡龕內配置天人奏樂、狩獵等圖，其意義須分別考慮。槨座正面上層有六個鸚鵡龕，龕內有兩位天人奏樂，可知是表象天界。槨座東西側面上層分成三龕，龕內為騎馬狩獵圖（五龕）、天馬鬥惡人圖（一龕），可知具有暗示墓主勇武的性格以及守護的意義。槨座背面上層同樣分成六龕，內容涵蓋人獅相鬥（一龕）、供奉神人（三龕）、飲酒圖（一龕），以天界表象為主，鬥獸圖為輔。整體看來，虞弘墓石槨的鸚鵡母題具有表象天界與守護墓主的意涵，也表現出與北鎮武人文化的密切關係。

（三）白玉俑與晉陽陶俑

關於虞弘墓出土的白玉伎樂俑，學者由白玉材質以及立於蓮花座上這兩項特徵，來說明與佛教造像的相關性。[92] 這兩點確實與佛教造像有關，不過如果細觀白玉伎樂俑的風格，其造型為世俗人物，與佛教造像理想化的表現明顯不同。

關於白玉伎樂男俑的服飾，在此舉出抱琵琶男俑（99TSY:60,89）來說明（圖62a、b）。頭裹黑幞頭，臉部飽滿，呈褐色，身穿圓領窄袖袍，領、袖、

[92] James C. Y. Watt,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p. 240. Annette L. Juliano, "Converging Traditions in the Imagery of Yu Hong's Sarcophagus: Possible Buddhist Sources," p. 30. 黎毓馨，〈隋代初建、晚唐改造、北宋沿用的定州靜志寺塔地宮〉，收入浙江省博物館、定州市博物館編，《心放俗外—定州靜志、淨眾佛塔地宮文物》（北京：中國書店，2014），頁8-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襟曾施彩，腰繫黑革帶，著靴。身軀健碩，最寬處在腹部與腰部，腹部略向外突起，並呈現下垂感。手臂較細，與健碩的身軀形成對比。琵琶外側隱約可見朱彩殘跡。男性伎樂立俑在北朝至隋代十分罕見。北齊河清元年（562）庫狄迴洛墓可見女伎樂立俑，隋代麴慶墓也曾出土手持腰鼓的女立俑。以男伎樂俑為主體的伎樂組合可說是虞弘墓的特色。

伎樂女俑有3件，分別是持排簫女俑（高50公分）、抱琵琶女俑（高58.5公分）、抱豎箜篌女俑（高25公分）。以抱琵琶女俑（99TSY: 21,71,77）為例，頭梳雙髻，臉部呈紅褐色，身穿圓領窄袖裙，飾紅彩，另有黑色帔帛、紅色垂帶，著靴（圖63）。琵琶置於胸前，右手撥弦，左手已殘損，彈奏姿態與抱琵琶男俑相同。伎樂女俑頭部造型與男俑相近，身軀比例不若男俑健碩，腰部略內收，最寬處在下方裙擺處。

日本Miho博物館藏粟特人白玉圍屏推測出土自山西太原一帶，其雙闕前方淺浮雕的侍者也具有同樣的鼓腹、窄袖的造型特點（圖64）。[93] 除了飽滿的頭部之外，身軀壯碩，腹部飽滿微凸，革帶下緣為略呈垂墜的圓弧狀。相較於壯碩的身軀，手臂顯得較為細瘦。這些特徵都與北齊至隋代晉陽地區的陶俑風格十分類似。

北齊晚期晉陽隨葬俑的造型益加強調渾圓與壯碩的身軀，例如婁叡墓與徐顯秀墓中的陶俑均顯示此地域風格的特點（圖65a、b）。徐顯秀墓中也可見到類似造型的人物壁畫，例如墓門兩側的守衛、儀仗人物等。此風格一直延續至

---

[93] 關於這套圍屏的討論，參見Miho Museum，《Miho Museum南館圖錄》（滋賀：Miho Museum，1997），頁247-257。A. L. Juliano and J. A. Lerner, “Cultural Crossroads: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Entertainers on the Miho Funerary Couch,” *Orientations*, vol. 28, no. 9 (1997), pp. 72-78. A. L. Juliano and J. A. Lerner, “The Miho Couch Revisited in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 *Orientations*, vol. 32, no. 8 (2001), pp. 54-61. 榮新江，〈Miho美術館粟特石棺屏風的圖像及其組合〉，《藝術史研究》，4輯（2003），頁199-221。收入氏著，《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頁333-356。Boris I. Marshak, “The Miho Couch and the Other Sino-Sogdian Works of Art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6th Century,”《Miho Museum研究紀要》，4號（2004），pp. 16-31. ボリス I. マルシャク；稲垣肇譯，〈MIHO MUSEUMの棺床屏風と6世紀後半の中国・ソグド芸術〉，《Miho Museum研究紀要》，4號（2004），頁32-42。稲垣肇，〈MIHO MUSEUM所蔵中国北朝石榻圍屏門闕の様式淵源と復元試論〉，《國華》，1363號（2009），頁19-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隋代，代表性的實例可舉出山西太原南郊出土隋開皇十七年（597）斛律徹墓陶俑（圖66）。[94] 楊泓認為北朝晚期的晉陽陶俑「體型顯得臃腫，腹胯圓鼓，下肢短而過細，使全俑的外輪廓近於梭形，比例不調，因而體態不夠美觀。」[95] 上述觀察明確指出該地區陶俑造型上的特點。不過與其評價為「不夠美觀」，或許不妨由北鎮武人品味的角度來加以理解。

由鮮卑北鎮武人的角度來看，這類造型可能具有特殊的政治、軍事文化的意涵。據（唐）蘇敬撰《新修本草》卷十七〈果部・蒲陶〉：「魏國使人多賫賫來，狀如五味子而甘美。……此國人多肥健耐寒，蓋食斯乎？」，顯示北朝鮮卑人「肥健耐寒」。[96] 對於北鎮武人而言，耐寒無疑是有利於作戰的優點。北朝、隋史中屢見發動於冬季的惡戰，這是因為河流結冰有利於騎兵主力長驅直入。冬季碎冰，也就成為阻止騎兵入侵的有效防衛措施。[97] 由此可知，這批晉陽陶俑的造型符合肥健的特點，代表善於冬戰的北鎮精兵的完美體態。虞弘墓白玉俑所見的壯碩身形承繼自晉陽陶俑，同樣可視為武人品味的展現。

---

[9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沙溝隋代斛律徹墓》，頁12-79。小林仁，〈隋俑考〉，收入清水真澄編，《美術史論叢・造形と文化》（東京：雄山閣，2000），頁345-364。後以〈隋俑考－北斉俑の遺風と新たな展開―〉為題，收入氏著，《中国南北朝隋唐陶俑の研究》（京都：思文閣出版，2015），頁221-253。虞弘墓的陶俑殘片同樣可見承繼北齊晉陽風格，參見林郡儀，〈區域互動下陶俑樣式的轉變：以北周到隋的長安地區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51期（2021），頁1-100。

[95] 楊泓，〈北朝陶俑的源流、演變及其影響〉，收入中國考古學研究編委會編，《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記念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268-276。收入氏著，《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126-139。北齊晉陽陶俑的考察參見劉瑋琦，〈試論東魏北齊時期官方樣式——鄴城與晉陽隨葬俑的特徵研究〉，頁1-62。

[96] （唐）蘇敬撰，《新修本草》，卷17，〈菓部・蒲陶〉，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醫家類》，989冊（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頁675。

[97] 例如開皇二年（581）冬突厥全面進攻，隋軍「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唐）魏徵等撰，《隋書》，卷40，〈虞慶則傳〉，頁1174。北周與北齊冬季黃河碎冰的攻防可見（唐）李延壽，《北史》，卷54，〈斛律光傳〉：「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守河椎冰。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椎冰，懼周兵之逼。」（頁196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四）虞弘石槨圖像中所見的武人品味

首先簡介過去學界對於虞弘墓石槨圖像的研究。馬爾沙克（Boris I. Marshak）與朱安奈均注意到位在入口兩側的正面左右石板的重要性。關於東側鞍馬圖的解釋，馬爾沙克提出兩種解釋的可能性：其一、繼承北朝墓葬鞍馬圖傳統，代表墓主靈魂的乘具；其二、依據粟特納骨甕的圖像，做為祆神密斯拉（Mithra）的祭品。同時指出兩塊石板的圖像相互對稱，在解釋圖像時應該一併考慮。[98] 張慶捷採前說，姜伯勤承繼後者並進一步發揮。[99] 樂仲迪（Judith A. Lerner）嘗試調和兩種解釋，認為兼具北朝鞍馬與粟特宗教文化的意涵。[100] 曾布川寬認為代表靈魂的乘具，比對為出行圖，並與史君墓東壁圖像相整合而解釋為代表墓主靈魂即將通往欽瓦特橋。[101] 影川悅子認為一般北朝墓葬常見鞍馬與牛車的組合，但此圖僅見鞍馬，對於是否可視為靈魂坐騎持保留態度。[102]

關於此圖的解釋，在欠缺文獻佐證之下，回歸圖像本身的分析較為可行。由六世紀片治肯特（Panjikent）壁畫中可見無人騎乘的鞍馬，前方有祭司引導，做為密斯拉的祭品（圖67）。[103] 其構圖與虞弘墓石槨東側的鞍馬圖最為接近。此駿馬除了無人騎乘、未搭配傘蓋之外，在馬頸上方出現特殊的蓮花變形紋。如前述，《出家踰城》中以蓮花暗示天界，並象徵諸天所展現的神通。由此看來，此鞍馬不同於北朝墓葬的鞍馬圖模式，被賦予與天神相感應的意涵，由祆教的脈絡來理解可能較為恰當。

---

[98] Boris I. Marshak, “The Sarcophagus of Sabao Yu Hong, a Head of the Foreign Merchants (592-98),” pp. 63-64. James C. Y. Watt,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p. 280.

[99] 張慶捷，《解讀虞弘墓—北朝定居中國的粟特人》，頁138-140。姜伯勤，《中國祆教藝術史研究》，頁128-129、149。

[100] Judith A. Lerner, “Aspects of Assimilation: The Funerary Practices and Furnishings of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pp. 17-18.

[101] 曾布川寬、吉田豐編，《ソグド人の美術と言語》，頁269-280。

[102] 影山悅子，〈ソグド人の墓と葬具—中国とソグディアナ〉，收入森部豊，《ソグド人と東ユーラシアの文化交渉》（東京：勉誠出版社，2014），頁61-86。

[103] Boris I. Marshak, “The Miho Couch and the Other Sino-Sogdian Works of Art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6th Century,” pp. 20-21. ボリス I. マルシャク；稲垣肇譯，〈MIHO MUSEUMの棺床屏風と6世紀後半の中国・ソグド芸術〉，頁35-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於石槨內部中心的墓主夫婦圖像，學者多同意是表現死後升天後居於天國的情景。至於其他石槨內部的六幅圖像，馬爾沙克依據八世紀早期片治肯特壁畫推測代表粟特人所認識的不同國度：東壁騎單峰駱駝獵獅的圖像代表中東阿拉伯地區；[104] 北壁東側圖像中有披長髮的騎士，代表北方草原的突厥（Turks）；北壁西側為騎象狩獵圖，代表印度；西壁兩幅則代表伊朗或粟特地區（Sogdiana）。至於東壁南側正在準備葡萄酒的場景，應代表繼承晚期羅馬藝術的拜占庭（Byzantium）。[105] 不過這些圖像的方位並未與其代表的國度的地理位置相對應。

虞弘應未親身逐一遊歷過這些國家，主要是藉由這六幅圖像來做為其國際性生涯的視覺表象。虞弘墓誌銘中記有「翱翔數國，勤誠十主」，讚譽其外交長才，可與槨內圖像相呼應。[106] 如同馬爾沙克的提示，石槨的設計者藉由模式化的異國圖像，將多樣而繁雜的世界統合成一個整體，傳達出粟特美術獨特的國際性與恢弘的世界觀。這些圖像雖已經工匠改易，但顯然有所依據，可見粟特人因專擅的遠距離貿易而有能力取得並運用各類北朝華北地區工匠所不知的異國圖像資源。

本文關注的是墓主夫婦圖像與其左右兩側圖像之間的關係。將北壁三塊石板的圖像相比較，中央表出墓主夫婦宴飲、歡慶的情景，類似的表現可見於其他北朝至隋代的粟特人葬具。比較奇特的是人獅相鬥圖配置在墓主圖像的下方。[107] 此血腥廝殺的場面與墓主宴飲並不相稱。而且，在墓主圖像的左右兩側配置有突厥武士騎駱駝、印度國王騎白象的鬪獅圖。這兩個畫面不僅是要表現

---

[104] 齊東方特別強調這類圖像與波斯文化的關係。齊東方，〈虞弘墓人獸搏鬥圖像及其文化屬性〉，頁78-84。又見張慶捷，〈虞弘墓石槨圖像中的波斯文化因素〉，頁237-255。

[105] Boris I. Marshak, “The Sarcophagus of Sabao Yu Hong, a Head of the Foreign Merchants (592-98),” pp. 59-62. 曾布川寬則認為石槨內部圖像均為天國的表現。曾布川寬、吉田豊編，《ソグド人の美術と言語》，頁268-280。

[106] 《虞弘墓誌銘》:「潤光安息，輝臨月支。簪纓組綬，冠蓋羽儀。桂辛非地，蘭馨異土。翱翔數國，勤誠十主。」

[107] 馬爾沙克推測代表這是現世與來世的對比。Boris I. Marshak, “The Sarcophagus of Sabao Yu Hong, a Head of the Foreign Merchants (592-98),” p. 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突厥與印度這兩個國度，還藉此展現出人獸博鬥的動態場景以及國王的權威、勇武氣概，與中央靜態的墓主夫婦圖像形成鮮明的對比。

馬爾沙克對於虞弘墓石槨與粟特本土、中亞藝術之間在風格上的差異，曾做出以下總結：

> 在這件石槨中傳入自中亞的主題，尤其是在狩獵與動物搏鬥場景的描繪上，表現出具一種近乎誇張的動態活力。這種活力或可歸因於中國工匠運用其自身的感受來詮釋這些見於粉本的場景與圖像。[108]

這段描述很簡潔的指出誇大的動態表現是虞弘墓石槨在風格上的特點。這些圖像雖然有其粟特、薩珊王朝的淵源，但在此墓中已被重新加以詮釋。在馬爾沙克的眼中，這種被誇大的動態感出自在地工匠的主觀詮釋，未見於原來的中亞圖像或粉本。例如山西大同北魏正始元年（504）封和突墓出土一件口徑18公分的薩珊狩獵銀盤（圖68，大同市博物館）。[109] 中央貴人頭繫飄帶，呈立姿回首，持矛與野豬搏鬥，左右野豬僅現半身，朝向中央，人物與動物均顯得較為靜態。其他北朝晚期至隋代的粟特人葬具的狩獵圖像，雖然可見較具有動態的表現，但仍有所不同。例如陝西西安出土北周大象元年（579）安伽墓石牀正面右側圍屏（圖69，陝西博物院），其中躍起的獅子與狩獵者相對，然而口部與人物保有距離，未見如虞弘墓中獅子貼近人物的驚險之狀，由此可見虞弘墓石槨風格的特點。[110]

---

[108] "On the sarcophagus, there is an almost exaggerated dynamism in the rendering of themes introduced from Central Asia, particularly in the depiction of the hunt and animal combat scenes. This vitality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Chinese artist's having brought his own sensibility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scenes, images that he would have seen in a pattern book." James C. Y. Watt,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p. 281.

[109] 大同市博物館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臺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1983年8期，頁1-4。夏鼐，〈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薩珊銀盤考〉，《文物》，1983年8期，頁5-7。馬雍，〈北魏封和突墓及其出土的波斯銀盤〉，《文物》，1983年8期，頁8-12、39。Prudence O. Harper, "An Iranian Silver Vessel from the Tomb of Feng Hetu,"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o. 4 (1990), pp. 51-59.

[110]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編著，《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27-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若由虞弘統領并、代、介三州鄉團以及晉陽北鎮武人墓葬傳統的角度來分析，此處所謂誇大的動態感以及對於狩獵與動物搏鬥圖像的喜好，可以得到另一層的認識。結合虞弘的生平來考慮，這種表現不僅僅是出自工匠本身的詮釋，而是傳達出虞弘的武人面向及武人品味。

在虞弘墓石槨中這些狩獵、動物搏鬥的圖像多貼近墓主圖像，值得探究。獅子與武士做殊死鬥的畫面位在墓主圖像的正下方，並且表現成一組，左右對稱，有意與上方的墓主圖像相對應。相較之下，石槨正面兩側的駿馬、天神圖中沒有任何表現搏鬥場面，只有在天神圖的下欄可見牛獅相鬥。根據伊朗的圖像傳統，牛獅相鬥可能是新年的象徵，[111] 因此此圖應該與其他動物搏鬥圖分別看待。整體看來，有關狩獵、動物搏鬥的圖像主要安排在石槨內部，並且是以墓主圖像為中心，環繞其左右。此外，槨座中的騎馬狩獵圖分別位在東西兩側上層與北側下層，與飲酒天神有所區隔，呈現出環繞東、西、北三面的態勢。尤其是北側下層的狩獵圖呈左右對稱，朝向中央，與槨內墓主圖像的布局似有相應之處。

按照北朝以來墓葬圖像的慣例，包夾墓主夫婦圖的兩側圖像可歸類出兩種類型：第一、表現侍奉墓主的侍者，性別與墓主夫婦相應，例如男性墓主配以鞍馬、男性奏樂人物等。這類圖像為葬具與墓壁畫所共有。第二、搭配孝子傳圖或其他歷史故事，表現出喪家對於亡者的孝心，或是做為墓主德行的表徵。這類圖像組合主要出現在圍屏、屏風上，具有彰顯墓主德行或是志向的表述功能，隋代的實例可舉出隋開皇十年（590）麴慶夫婦合葬墓，其圍屏石牀前方陳設石屏，正面刻畫晉獻公太子的鑑戒故事，藉以投射墓主的道德理想（圖70）。[112]

[111] James C. Y. Watt,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p. 280. 姜伯勤認為牛靈代表善，紅獅代表惡，牛勝獅，代表善的力量得勝。姜伯勤，《中國祆教藝術史研究》，頁129、149。

[112]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夫妻合葬墓的發掘〉，頁398-4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過去學者對於虞弘夫婦圖像的解釋集中在此圖的畫面之內，若能將其左右兩側的狩獵圖像一起納入考量，則能為虞弘墓主圖像的表現方式帶來新的理解（圖71）。換言之，貴人狩獵圖或是動物搏鬥圖不僅做為代表世界的異國圖像，其強調武勇、動態表現的風格也可用來表彰虞弘做為武將的尊貴與榮耀。在這裡，源自突厥、印度的圖像被視為高貴而勇武的表徵，工匠透過轉用這類圖像表現出虞弘做為武人的特質與品味。

四、石槨與石俑的材質

（一）白玉葬具與白玉俑的出現

就現有的材料所見，北魏平城時期至洛陽時期的石堂、圍屏石牀均採用青石（石灰岩）製作。東魏、北齊、北周的石質葬具基本上仍延續此傳統，粟特人葬具也多採青石製作。然而在北齊至隋代之間，以山西太原與河南安陽為中心曾密集地出現一批採用白玉材質的葬具。[113]相關實例條列如下：

1、北齊至隋粟特白玉石牀（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2、北朝至隋粟特白玉石牀（Shelby White與Leon Levy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3、北朝至隋粟特白玉圍屏（Miho Museum）
4、傳隋開皇九年（589）安備墓白玉圍屏石牀（大唐西市博物館）、圍屏（私人藏）
5、隋開皇十年（590）麴慶夫婦合葬墓白玉圍屏石牀（安陽考古研究所）
6、隋代開皇十二年（592）虞弘墓白玉石槨

[113] 史料中可見有關玉牀的記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鄴中記》，後趙（319-351）與本文所舉出的白玉葬具之間的地緣關係。（晉）陸翽，《鄴中記》：「石虎御牀，辟方三丈。其餘牀皆局腳，高下六寸。後宮別院中有小形玉牀。」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叢書集成新編》，第113冊，史地類（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頁5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以上實例可看出北齊至隋代粟特人葬具在材質上由青石改為白玉，出現巨大的轉變。⑭ 這些改用白玉的葬具除了麴慶墓之外，都是出土自粟特人墓葬。麴慶出自高昌麴氏，可知白玉葬具並非粟特人專用的材質。⑮

虞弘墓以及其他隋代墓葬中出現白玉俑，也同樣反映出這種材質轉變的現象。河南安陽隋開皇十年麴慶夫婦合葬墓由墓道、甬道、墓室所組成，墓門朝南。甬道東西壁各有一龕，龕內安放白玉石俑，著幞頭、長袍，立於方形底座，表面施白、黃、朱彩。東壁為持劍武士俑，通高96公分，西壁為持刀武士俑，通高93公分（圖72a、b）。⑯

山東濟南隋代開皇十二年（592）呂道貴夫婦墓出土白玉武士俑2尊，雙手持劍，立於方形座上，高90公分（圖73a、b）。⑰ 呂道貴為陽堅生母呂苦桃的堂兄，《呂道貴及妻張氏墓誌》中稱其為「上古神農之苗裔，大隋今帝一從舅也」，因為身為皇親的緣故，任濟南太守，拜儀同三司，品階為第二品。⑱ 歿後葬儀得到隋文帝的殊禮，誌文記有「贈以太牢、儀仗歌車，以旌厥禮。」由此看來，大型白玉武士俑應為隋代初年高等級墓葬的表徵。⑲

關於北齊至隋代出現白玉葬具與白玉俑的原因，除了墓葬文化本身的變化之外，還必須由同時期佛教物質文化的變遷，尤其是白玉佛像的出現來加以考

⑭ 學者推測其中Shelby White與Leon Levy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的一件石牀與Miho Museum藏粟特白玉圍屏同屬一套葬具。A. L. Juliano and J. A. Lerner, “The Miho Couch Revisited in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 pp. 54-61. 最近榮新江有所保留。榮新江，〈海外回歸的兩件粟特彩繪浮雕石牀前檔圖像〉，《故宮博物院院刊》，2024年1期，頁21-29。

⑮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夫妻合葬墓的發掘〉，頁393-433。

⑯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夫妻合葬墓的發掘〉，頁421-422。

⑰ 濟南市考古研究所，〈濟南隋代呂道貴兄弟墓〉，《文物》，2005年1期，頁29-32。

⑱ （唐）魏徵等撰，《隋書》，卷27，〈百官志・中〉，頁751。

⑲ 山東嘉祥隋開皇四年（584）徐之范墓中也曾出土兩件大型石雕門吏俑。嘉祥縣文物管理所，〈山東嘉祥英山二號隋墓清理簡報〉，《文物》，1987年11期，頁57-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量。⑳ 北魏晚期已出現白玉像，流行於東魏至隋代，以東魏至北齊為高峰期。就分布範圍而言以河北定州曲陽為中心，向東擴及青州，向南到達鄴城，向西擴及山西太原，在北齊鄴城並形成另一個白玉像的製作中心（圖74）。㉑

山西太原屬於白玉像的分布範圍，除了晉祠華塔村出土的小型白玉像之外，晉陽宮殿、寺院遺址曾出土中型白玉像。晉陽故城遺址所出土的背屏式高浮雕單體佛立像通高達134公分，殘高83公分，寬81公分，材質為白玉，推測時代為北齊（圖75）。㉒ 由造像出土位置、以及一併出土了建築構件的現象來看，簡報推測原屬供奉於晉陽城內寺院的造像。這件白玉像的尺寸屬於中型造像，因尺寸較大，不利運送，應該是由當地工匠製作。由此可知太原當地已經培養出熟悉白玉的製作工藝並能雕造白玉像的工匠作坊。

關於白玉與白瓷的相關性，矢島律子推測北齊白釉陶蓬勃發展的時代背景係出自當時崇尚白色材質的「白玉信仰」所衍生出來的審美觀，此說頗富於啟

---

⑳ 關於佛教造像的材質問題，參見金申，〈古代佛造像的石料產地問題〉，收入西安碑林博物館編，《紀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頁583-588。收入氏著，《佛教美術考古叢考續編》（北京：華齡出版社，2010），頁140-148。林偉正、徐胭胭，〈材質與工藝—中國中古佛像材質的思考〉，《美術研究》，2022年4期，頁66-79。

㉑ 相關研究可舉出楊伯達，〈曲陽修德寺出土紀年造像的藝術風格與特徵〉，《故宮博物院院刊》，1960年1期，頁43-60。楊伯達著，松原三郎譯，《埋もれた中国石仏の研究：河北省曲陽出土の白玉像と編年銘文》（東京：東京美術，1985）。松原三郎，〈北齊の定縣樣式白玉像——特に半跏思惟像について〉，收入氏著，《增訂中國佛教彫刻史研究：特に金銅仏及び石窟造像以外の石仏に就いての論考》（東京：吉川弘文館，1966），頁129-148。長廣敏雄，〈曲陽発見の石仏に就いて〉，收入氏著，《中國美術論集》（東京：講談社，1984），頁231-241。松原三郎，〈東魏・北齊の河北派白玉像——特に半跏思惟像について〉，收入氏著，《中國佛教彫刻史論　本文編》（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頁107-123。馮賀軍，《曲陽白石造像研究》。徐男英，〈河北出土北朝期白玉像考〉，收入濱田瑞美編，《アジア仏教美術論集：東アジアI：後漢、三国、南北朝》（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17），頁377-378。李靜杰、田軍編著，《定州白石佛像》（臺北：財團法人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201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著，《鄴城北吳莊出土佛教造像》。

㉒ 李愛國，〈太原市晉陽古城遺址出土北朝漢白玉石造像〉，《文物》，2001年5期，頁90-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發性。[123] 北齊白釉陶以及隋代白瓷、白瓷俑出現很可能也與白玉的宗教心態有關。河南安陽開皇十五年（595）張盛墓夫婦出土2件白釉黑彩侍吏俑，高72公分，雙手按刀，底部有蓮座（圖76a、b）。[124] 另有兩件武士陶俑，一件高73、另一件高64公分，同樣立於蓮座上。可以推測白玉俑與白瓷俑之間具有可替代、互換的關係。由此看來，北齊至隋代墓葬中無論是葬具或隨葬品，均可見「尚白」的新趨勢，並可追溯至同時期佛教物質文化的變遷。

（二）石材位階的變化

北魏平城時期多見石造建築，主要以青石（石灰岩）製作。河北北部雖然盛產漢白玉石，然而在平城時期該地區的石造佛像均為青石，尚未見白玉像。北魏興安二年（453）河北定州靜志寺舍利石函、太和五年（481）河北定州舍利石函，均由定州工匠製作，同樣採用青石。[125] 興安元年（452）文成帝恢復佛法，敕令建造石像。據《魏書》〈釋老志〉：「是年，詔有司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顏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體上下黑子。論者以為純誠所感。」可知以佛像中的黑石做為感應的表徵。[126]

---

[123] 矢島律子並未進一步界定白玉信仰。本文避免使用白玉信仰一詞，而是由感應觀的角度考察投射於白玉的宗教心態，並關注白玉觸發感應之際的各種內外條件與宗教情境。矢島律子，〈北朝の白いやきもの〉，收入常盤山文庫中国陶磁研究会編集，《常盤山文庫中国陶磁研究会　会報3　北斉の陶磁》（東京：財団法人常盤山文庫，2010），頁27-40，特別是頁39。關於隋代白瓷的發展，參見龜井明德，〈北朝・隋における白釉，白瓷碗・杯の追跡〉，收入氏著，《中国陶瓷史の研究》（東京：六一書房，2014），頁90-116。謝明良，〈中國早期鉛釉陶器〉，收入顏娟英主編，《中國史新論 美術考古分冊》（臺北：中研院、聯經，2010），頁55-142，特別是頁104。謝明良，《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從戰國到唐代》（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77-78。小林仁，〈白瓷の誕生—北朝の瓷器生産の諸問題と安陽隋張盛墓出土白瓷俑—〉，收入氏著，《中国南北朝隋唐陶俑の研究》（京都：思文閣出版，2015），頁254-271。

[124]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安陽隋張盛墓發掘記〉，《考古》，1959年10期，頁541-545。

[125]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定縣出土北魏石函〉，《考古》，1966年5期，頁252-259。

[126]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114，〈釋老志〉，頁3036。（北齊）魏收著，塚本善隆譯註，《魏書釈老志》（東京：平凡社，1990），頁2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馮太后寢廟永固堂與永固陵中都採用了青石、黑石。永固堂始建於太和五年（481），完成於太和八年（484），建築構件皆採石材雕製。據《水經注》卷十三〈灤水〉：

> 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階、欄、檻，及扉、戶、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採洛陽之八風谷黑石為之，雕鏤隱起，以金銀間雲矩，有若錦焉。堂之內外，四側結兩石趺，張青石屏風，以文石為緣，竝隱起忠孝之容，題刻貞順之名。[127]

永固堂的仿木建築構件主要以「文石」修築，前方的四柱採「洛陽八風谷黑石」製作，屏風則為青石所製。文石推測為紋理顯著的石材。

不過這種以黑石、青石為尊的情況在洛陽時期出現變化。據《洛陽伽藍記》卷一〈城內・永寧寺條〉：

> 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太極殿。中長丈八金像一軀、金像十軀、繡珠像三軀、金織成像五軀、玉像二軀，作功奇巧，冠於當世。[128]

永寧寺塔完成於熙平元年（516），北側設有佛殿，其形制如太極殿。[129] 殿中供奉當時製作工藝最為精巧且材質貴重的佛像。行文描述的順序為金像、繡珠像、金織成像、玉像。首先是尺寸最大的丈八金像（一軀），其次為金像（十軀），接下來的兩組繡珠像（三軀）、金織成像（五軀）採用織、繡的技法而非金屬鑄造，最後是玉像（二軀），以雕刻技法製作而成。這段文字的排序是按照製作技法來分類，同時也體現出材質的高低位階。引文中的描述關注造像

---

[127]（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312。

[128] 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頁2-3。相關記載見《續高僧傳》，卷1，〈譯經篇初・元魏臺洛下永寧寺北天竺沙門菩提流支傳四〉：「北有正殿，形擬太極。中諸像設，金玉繡作，工巧綺麗，冠絕當世。」（唐）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14。

[12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陽永寧寺 1979～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頁12-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材質而非尊格，可見《洛陽伽藍記》的作者楊衒之對於造像材質的高度意識。此處玉像雖然列在金織成像之後，但是相較於以青石、黑石為尊的平城時期，其地位有所提升。由此可推測北魏洛陽時期佛像造像材質出現新的位階關係。[130]

北魏永平三年（510）世宗宣武帝（483-515，499-515在位）曾於報德寺供奉「珉玉丈六像」。[131] 報德寺是孝文帝（467-499）為祈求馮太后（442-490）冥福所建的菩提寺。宣武帝以丈六玉像來供養孝文帝、馮太后，可知玉石在北魏洛陽時期皇室的佛教供養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前引《洛陽伽藍記》永寧寺佛殿中所見的「玉像二軀」，同樣可由皇室信仰的脈絡來加以認識。這尊洛陽報德寺玉像頗富盛名，在東魏武定三年（545）《報德玉像七佛頌碑》中載有「宣武皇帝，剖玉荊山」，可知至六世紀中葉洛陽報德寺玉像仍持續受到供養。[132] 宣武帝對於玉石的重視是否與孝文帝以來的漢化運動有關，仍有待進一步研究。[133]

北齊皇族趙郡王高叡（534-569）於天保七年（556）於定州定國寺供養三尊白玉佛坐像，為北齊皇室白玉像的代表作。這三尊像原來位在今河北省靈壽縣幽居寺塔內，目前收藏於河北博物院。[134] 依照題記，尊格為「白石釋迦像」

---

[130] 楊伯達曾概觀南北朝佛教造像石材的變化，勾勒出由砂岩、黑石等至白玉的變遷，強調曲陽的重要性。楊伯達著，松原三郎譯，《埋もれた中国石仏の研究：河北省曲陽出土の白玉像と編年銘文》，頁112-124。

[131] （北齊）魏收，《魏書》，卷114，〈釋老志〉:「先是，於恒農荊山造珉玉丈六像一。三年冬，迎置於洛濱之報德寺，世宗躬觀致敬。」（頁3041）（北齊）魏收著，塚本善隆譯註，《魏書釈老志》，頁252。

[132] 東魏武定三年（545）〈報德玉像七佛頌碑〉:「大魏龍飛恒代，創基帝業，王有九土。至　高祖孝文，定鼎崧洛，莊飾□宙，津梁四海。……廣興塔廟，紹隆三寶，始造報德寺。……宣武皇帝，剖玉荊山，貫重連城，彫鏤瑩飾。模一佛兩菩薩，石基磚宮，樹於寺庭。法鼓於是始聞世間，中止之輪再轉於大千。」顏娟英主編，《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頁120-121。

[133] 肥田路美指出就齊梁之際僧祐（435-518）〈雜圖像〉所見，南朝白玉像的出現早於北朝。肥田路美，〈道宣撰『集神州三宝感通録』霊像垂降録の仏像観—僧祐撰「雑図像」と比較して〉，收入曽布川寛、宇佐美文理編，《中国美術史の眺望—中国美術研究会論集》（東京：汲古書院，2023），頁21-40。

[134] 劉建華，〈北齊趙郡王高睿造像及相關文物遺存〉，《文物》，1992年8期，頁66-77。陳悅新，〈北齊趙郡王高睿造像的佛衣類型〉，《華夏考古》，2018年1期，頁77-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77）、「白石無量壽像」（圖78）、「白石阿閦像」（圖79），供養對象分別是其亡伯（獻武皇帝高歡）與亡兄（文襄皇帝高澄）、亡父母（南趙郡開國公高琛、南陽郡長公主），以及高叡本人與妃。釋迦像原高145公分，其餘兩尊高130公分。另外在釋迦像前有天保八年（557）《趙郡王高叡修寺頌記碑》，為漢白玉臥式碑，高76、寬155公分。塔內北、東、西壁鑲嵌18尊白玉龕像，塔外西側另有一件白玉立佛像。在此塔的東南處有天保八年（557）刊立的《趙郡王高叡定國寺碑》，同樣以白玉製成（圖80）。碑首雕成六龍，高48、寬110、厚28公分，碑身高168、寬100、厚20公分，此外尚有半埋於地下的龜趺座，規模宏大，為北齊造像碑的巨製。[135]

這一組定國寺龕像、造像、造像石碑均採白玉製作，可知北魏洛陽時期皇室的白玉像製作不但為北齊皇室所繼承，且出現新的發展。定國寺塔門有半圓形卷拱，高61、底寬117公分，刻有雙龍、聯珠紋等紋飾，以青石製成。門框則以白砂岩雕鑿打磨而成，飾有聯珠紋與卷雲紋（圖81）。[136] 石門與做為主體的白玉造像、造像碑相較，地位居次，因此採用青石、白砂岩製作。就石門本身而言，門額的地位高於門框，可推測青石的地位又高於白砂岩。由此看來，定國寺中石材的位階關係為：白玉—青石—白砂岩。

白玉地位高於青石的現象，也出現在虞弘墓與麴慶墓。如上述，虞弘墓中出土16件石俑，包括白玉文吏俑（2件）、白玉石伎樂俑（10件）、砂石奉侍俑（4件）。由於白玉文吏俑與白玉石伎樂俑立於蓮花座，可知地位較高。相較之下，砂石奉侍俑的臺座低平，與人俑採同一石塊雕製而成。

隋代麴慶夫婦合葬墓的石墓門由青石製成，門額正面刻畫墓主夫婦宴飲圖。墓室中央偏北側安放一套圍屏石牀，長219、寬117、高46公分（圖82）。[137] 牀座正面及兩側檔石採用白玉，牀座背面以青石製作。牀座正面的圖像布局與粟特人葬具類似，以中央類似火壇的母題為中心，殘存彩繪貼金的痕跡。上層刻畫天人奏樂，下層壺門內透雕瑞獸，兩端牀足為手持三叉戟的四臂

[135] 顏娟英主編，《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頁152-154。

[136] 劉建華，〈北齊趙郡王高睿造像及相關文物遺存〉，頁67。

[137]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夫妻合葬墓的發掘〉，頁393-4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武神，足踏小鬼。相對於牀座正面的圖像採用淺浮雕、透雕，背面則是採用北魏洛陽時期以來的線刻畫技法，圖像配置上以摩尼寶珠與蓮花的複合體紋為中心，上層為對稱的有翼獸、仙鶴，兩側牀足為瑞獸。無論是由雕飾的技法、或是由所選擇的圖像與裝飾母題來看，都顯示這件石牀的正面與背面具有明確的對比關係，也可佐證採用白玉所製作的正面，其重要性高於採用青石所製的背面。虞弘墓與麴慶墓中將白玉與青石加以區別與差異化的使用方式，符合當時佛教造像的物質觀。

以下附帶說明北朝至隋代白玉在冕服、朝服上的運用。[138] 白玉在傳統皇帝冕服中具有特殊的象徵性。漢代和闐以產玉著稱，其中以被稱為羊脂玉的白玉最受珍視。[139] 在東漢皇帝冠冕中「係白玉珠為十二旒」，以白玉珠製作十二旒，可知白玉可用來象徵天子的威權與恩澤。[140] 北魏、北齊的冕服繼承漢晉傳統，隋代禮制多參酌北齊，同樣以白玉為尊。[141] 據《隋書》卷十二〈禮儀志〉：「於是定令，採用東齊之法。乘輿衮冕，垂白珠十有二旒。」[142] 對照《後漢書》卷三十〈輿服志下〉的記載，可知引文中的「白珠」即為「白玉珠」。《隋書》卷十二〈禮儀志〉另載：

> 佩。案《禮》，天子佩白玉。董巴、司馬彪云：「君臣佩玉，尊卑有序，所以章德也。」今參用杜夔之法，天子白玉，太子瑜玉，王山玄玉。自公已下，皆水蒼玉。[143]

---

[138] 林巳奈夫，〈中国古代の祭玉・瑞玉〉，《東方學報》，40冊（1969），頁161-323。收入氏著，《中國古玉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91），頁1-197。吉開将人，〈秦漢の玉器—礼玉のゆくえ〉，收入曽布川寛、谷豊信編集，《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第二巻秦・漢（東京：小学館，1998），頁245-249。矢島律子，〈北朝の白いやきもの〉，頁38-39。

[139] 夏鼐，〈漢代的玉器—漢代玉器中傳統的延續和變化〉，《考古學報》，1983年2期，頁125-145。

[140]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30，〈輿服志下〉：「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為十二旒，以其綬采色為組纓。」（頁3663）

[141] 關於北朝的朝服葬以及佩玉的出土概況，參見韋正，〈東漢、六朝的朝服葬〉，《文物》，2002年3期，頁72-78。

[142] （唐）魏徵等撰，《隋書》，卷12，〈禮儀志〉，頁254。

[143] （唐）魏徵等撰，《隋書》，卷12，〈禮儀志〉，頁2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其中「天子佩白玉」出自《禮記》。[144] 隋代官員綜合禮書的記載與曹魏杜夔所建立的法式，來建立朝服佩玉的新規制，天子佩白玉，王侯佩山玄玉。[145] 在《隋書》中對於山玄玉的佩法另有詳細的規定：「一品及五等諸侯，並佩山玄玉。五品已上，佩水蒼玉。」[146]《虞弘墓誌》中記有「貂璫容良之形，佩山玄玉之勢」。[147] 貂璫為漢代中常侍所戴的冠，容良為君子的儀容。[148] 誌文中關於佩戴山玄玉的描述，可視為對於虞弘在北齊任官的讚譽之詞。

（三）白玉與感應

白玉本身即可做為祥瑞，《魏書》〈靈徵志〉中可見到相關記載。[149] 除此之外，在北朝晚期佛教信仰的脈絡中，白玉、白玉像被賦予另一層宗教靈力，既是觸發感應的媒介，也可做為感應自身的明證。這一現象的出現應該與同時期佛教信仰中對於白玉像的認識的轉變相關。北魏洛陽時期河北地區開始製作

---

[144]《禮記》，卷29，〈玉藻第十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清）阮元校刊，《十三經注疏5 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564。

[145]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曾奉曹操之命創制雅樂。（西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魏書〉，頁806。

[146]（唐）魏徵等撰，《隋書》，卷12，〈禮儀志〉：「鞶囊，二品已上金縷，三品金銀縷，四品及開國男銀縷，五品綵縷。官無綬者，則不合劍佩。一品及五等諸侯，並佩山玄玉。五品已上，佩水蒼玉。」（頁259）。唐代有所繼承，據《舊唐書》，卷45，〈輿服志〉：「諸珮，一品珮山玄玉，二品以下、五品以上，佩水蒼玉。」（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1945。

[147] 張慶捷，〈隋虞弘墓誌考釋〉，頁219-220。

[148]《荀子》〈非十二子篇第六〉：「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李滌生，《荀子集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1），頁107。石見清裕編，《ソグド人墓誌研究》，頁129。

[149]（北齊）魏收，《魏書》，卷112，〈靈徵志〉：「長安鎮獻玉印一，上有龜紐，下有文字，色甚鮮白，有殊常玉。」、「孝靜興和四年七月，鄴縣民獻白玉一璞。」僧人獻玉的記載有：「肅宗正光三年六月，并州靜林寺僧在陽邑城西橡谷掘藥，得玉璧五，珪十，印一，玉柱一，玉蓋一，並以獻。」（頁29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白玉像，北齊至隋代蓬勃發展。關於白玉像流行的原因除了就地取材之便或是地域性的好尚之外，還可以由宗教心態的視點來加以分析。隨著信眾重新認識白玉感應，這一時期佛教造像材質的位階關係出現轉變，白玉像被視為較青石造像更為珍貴、更容易觸發感應，且適合用來承載祥瑞的特殊材質。[150] 北齊至隋代墓葬中頻繁出現白玉葬具、白玉俑的現象，必須與同時期佛教物質文化的新發展一併考量。

前引《趙郡王高叡定國寺碑》，可做為考察北齊白玉感應的重要參考。此碑採白玉製作，碑文後半載有：

> 兼於此伽藍，更興靈塔。光光流曜，比秋月之華；蓬蓬茂出，如白雲之舉。銅槃上竦，遠承仙露；金鐸相鳴，遙驚山鬼。又復運藍田之玉，採荊山之珍。鏤殫變化，圖窮相好。繢渥不汙，用□無染之身；夜光遍體，因現神通之色。於是竹間精舍，樹下講堂，光飾侔青鳥之蓮，珍華奪白牛之駕。[151]

起首「光光流曜，比秋月之華」既是對於佛塔的描述，也令人聯想起舍利放光的祥瑞。其次以「白雲之舉」形容佛塔「蓬蓬茂出」，顯示出重疊壯麗之狀。「藍田之玉，荊山之珍」意指造像、石碑採用良石美玉來製作。最關鍵的語句是「繢渥不汙，用□無染之身；夜光遍體，因現神通之色。」[152]「繢渥不汙」

---

[150] 關於北朝佛教的感應思想與信仰，參見菅野博史，〈竺道生における機と感応について〉，《印度学仏教学研究》，32卷1號（1983），頁261-264。船山徹，〈六朝時代における菩薩戒の受容過程—劉宋・南斉期を中心に—〉，《東方学報》，67號（1995），頁1-135。倉本尚德，〈北朝邑義造像銘の概要と感応思想〉，收入氏著，《北朝仏教造像銘研究》，頁31-93。

[151] 顏娟英主編，《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頁153。

[152] 拓片中「身」字上半部殘損，《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依據著錄增補，釋為「身」，可從。又參見（清）陸增祥編，《八瓊室金石補正》，卷20，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第6冊，頁4310。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編，《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第一函第六冊，頁9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彩繪佛像的敬稱，[153]「夜光遍體」指佛像全身宛若綻放月光，對應於「圖窮相好」。「夜光」可泛指星光，也可專指月光。通讀全文，由於起首以「比秋月之華」來形容佛塔，此處應同樣是以月光來形容佛像。這段引文以「無染之身」與「神通之色」，來總結定國寺佛像的特徵；最後「光飾侔青鳥之蓮，珍華奪白牛之駕」則是稱頌寺院講堂、精舍的華美之狀。其中「白牛」也與秋月、白雲遙相呼應。[154]這段碑文可以說貫穿著對於白、白光的宗教意識。

由於高叡供奉的定國寺造像為白玉像，以上對於白、白光的描述均可視為對於白玉像特質的描述，「夜光遍體，因現神通之色」一句尤其能說明白玉與神通、感應的關聯。總結這段碑文可得以下初步的結論：白玉像因其質地透白，彷彿明月瑩徹無瑕並綻放白光，可顯現各種神通的樣態。由此可見北朝佛教徒對於白玉感應的宗教心態。

隋代仁壽舍利塔的感應事蹟中，屢見與白色、玉、白玉相關的感應敘事。[155]釋曇遷俗姓王氏，為博陵（河北定州一帶）饒陽人，是隋文帝振興佛教的重要

---

[153]「繢」同「繪」，「渥」為霑潤、豐渥之意。此處「繢渥」相當於「繪飾」。「不汙」與「無染」相通，意指潔淨。（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樹下誕生品第六〉：「如來得成於佛道已，在於世間，住於世間，世所有法，世間穢濁，不污不染，此是如來往先瑞相。」收入高楠順次郎編，《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第3卷，頁687a。

[154]「侔」通牟，為等同或獲取，採獲取之意可與下句的「奪」相應。「白牛之駕」出自（後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卷2，〈譬喻品第三〉：「舍利弗！爾時長者各賜諸子等一大車，其車高廣，眾寶莊校，……駕以白牛，膚色充潔，形體姝好，有大筋力，行步平正，其疾如風。」收入高楠順次郎編，《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第9卷，頁12。

[155] 隋仁壽舍利塔的研究參見：山崎宏，〈隋の高祖文帝の佛教治國策〉，《支那中世佛教の展開》（東京：清水書店，1942），頁274-354。小杉一雄，《中国仏教美術史の研究》（東京：新樹社，1980）。游自勇，〈隋文帝仁壽頒天下舍利考〉，《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1期，頁24-30。冉萬里，《中國古代舍利瘞埋制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頁34-99。長岡龍作，〈仁寿舍利塔の思想と舍利容器〉，收入氏著，《仏教と造形—信仰から考える美術史》（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21），頁27-78。大島幸代、萬納恵介，〈隋仁寿舍利塔研究序說〉，收入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東洋美術史肥田路美編集，《美術史料として読む『集神州三宝感通錄』—釈読と研究—（五）～（七）》（東京：株式会社スマッシュ，2014），頁11-31。李志鴻，〈隋代的王權與佛教—以仁壽設塔活動為核心〉，《中華佛學研究》，16期（2015），頁105-1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推手。[156] 仁壽年間第一次設置舍利塔是在仁壽元年（601），曇遷奉敕命於岐州（陝西扶風縣）鳳泉寺造塔並埋藏舍利，其過程如下：

> 乃令詣岐州鳳泉寺起塔。晨夕請瑞，以沃帝心。將造石函，於寺東北二十里許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大小平正，取為重函。其內自變作雙樹之形，高三尺餘，異色相宣，或有鳥獸龍象之狀，花葉旋轉之形。以事上聞，帝大悅。[157]

文中描述曇遷如有天助，順利取得製作舍利石函的石材。文石為有紋理的石材，共有四塊。其中「光潤如玉」的描述值得注意。這四塊文石雖非玉石，仍具有光潤如玉的特質，之後在石函內隨即出現一連串的祥瑞，變化出「雙樹之形」、「鳥獸龍象之狀」。

釋法性為兗州人，仁壽二年（602）第二次頒布舍利時，奉勅護送舍利至州（山東兗州市）普樂寺：

> 釋法性，兗州人。……仁壽之年，敕召送舍利於本州普樂寺。初營外函，得一青石，錯磨始了，將欲鏨飾，變成馬瑙，五色相雜，文彩分明。函內斑剝，雜生白玉，凝潤光淨。函之內外，光如水鏡，洞照無障。[158]

在這段記載中仔細地描述青石如何變化出白玉的過程。起初法性為了製作外側石函，獲得一塊青石，加工完成後要加以磨飾時卻變成瑪瑙，有五色，紋理與色彩歷歷分明。接著在石函內斑紋處參差地出現白玉，華麗光滑且明亮潔淨。在白玉的映照下，石函內外兩側均如水如鏡一般明亮透徹。在此，石函材質的轉變過程是青石—瑪瑙—白玉。白玉顯示出宛若放光的奇瑞，文中形容為「凝

---

[156] 鎌田茂雄，《中国仏教史》，第五巻　隋唐の仏教（上）（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4），頁14-28。

[157] （唐）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卷第18，〈習禪三・隋西京禪定道場曇遷傳一〉，頁666。

[158] （唐）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卷28，〈感通下・隋京師勝光寺釋法性傳三十六〉，頁1121。引文校勘另根據《續高僧傳》研讀班，主譯者林聖智，〈《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釋法性傳〉〉（未刊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潤光淨」、「光如水鏡，洞照無障」。在上述的感應敘事中，白玉的位階顯然高於青石。

慧遷為瀛州（河北河間市）人，仁壽四年（604）護送舍利至海州（河北邢台市）安和寺：「掘深五尺，便獲白土，色逾於粉，遍滿坑中。復深八尺，於白土內得白玉一枚，方餘徑尺，光潤難比。」[159] 其過程首先是先發現白土，進一步發掘之後由白土內獲得一塊白玉，並以「光潤難比」來加以形容。

除了石函中生出白玉之外，還有其他不少與白色有關的祥瑞。例如釋法楷為曹州（山東曹縣）人，仁壽二年（602）護送舍利至曹州。所現的神瑞首先是「見佛半身，面白如玉。」，其後屢見白色祥瑞，包括「舍利上踊，白色鮮明」、「白色雲氣」、「白色師子蹲踞石」、「天雨白花」等。[160] 其中佛像「面白如玉」，顯示白玉像適合來模擬瑞像。

彥琮出身趙郡李氏，仁壽四年（604）第三次頒布舍利之際，護送舍利至復州（湖北仙桃市）方樂寺。據《續高僧傳》：

> 俗緣李氏，趙郡栢人人也。世號衣冠，門稱甲族。……末又覓石造函，遍求不獲，乃於竟陵縣界感得一石，磨治既了，忽變為玉，五色光潤內徹，照見旁人，又於石中現眾色象。[161]

首先是彥琮於竟陵縣（湖北仙桃市北）「感得」一石，磨製之後由石變為玉。文中以「五色光潤內徹，照見旁人」來描述這塊玉石。舍利有五色放光的記載已可見於梁慧皎《高僧傳》，不過至初唐《續高僧傳》中有關舍利的祥瑞，則進一步將放光與玉石的材質相聯繫。其中「光潤內徹」的描述與前引〈曇遷傳〉中的「光潤如玉」相呼應。

---

[159]（唐）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卷12，〈唐京師大總持寺釋慧遷傳十二〉，頁422。

[160]（唐）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卷28，〈隋京師揚化寺釋法揩傳三十九〉，頁1124-1125。

[161]（唐）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卷2，〈隋東都上林園翻京館沙門釋彥琮傳四〉，頁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靈裕（518-605）為北齊至隋代的高僧，晚年屢次辭退隋文帝的延攬，自長安大興善寺返回相州寶山寺（河南安陽西南）⑯② 以下這段記載提到他的看法，對於理解當時人如何認知白色祥瑞及玉所代表的徵驗頗有啟發性：

> 及仁壽中年分布舍利，諸州起塔多有變瑞，時人咸嘉為吉徵也。裕聞而歎曰：「此相禍福兼表矣。」由雜白花、白樹、白塔、白雲相現吉緣所為凶兆，眾初不信之也，俄而獻后、文帝相次昇遐，一國素衣，斯言有據。相州刺史內陽公薛胄所住堂礎忽變為玉，胄謂為善徵也，設齋慶之。裕曰：「斯琉璃耳，宜慎之戒之，可禳之以福。」胄不從其言，後楊諒起逆，事有相緣，乃流之邊裔，追悔昔言不慎之晚矣。⑯③

一般人視「白花、白樹、白塔、白雲」為舍利感應所引發的祥瑞，可與前引《續高僧傳》〈釋法揩〉的記載相對照。靈裕則認為可能是「禍福兼表」。仁壽二年（602）八月文獻獨孤皇后（544-602）亡故，仁壽四年（604）七月隋文帝駕崩，舉國著素衣（白衣）服喪，印證靈裕的見解。⑯④ 由此可知白色預兆具有兩種解釋的可能性，且彼此之間有所牴觸。由佛教舍利信仰的觀點來看，佛牙舍利光潔如白，白色奇瑞可做為舍利感應的瑞兆；不過若是由儒家喪葬禮俗的觀點來看，素衣為喪服，卻是代表凶禮。

引文的後半描述相州刺史內陽公薛胄被流放之前的預兆。⑯⑤ 薛胄將宅邸石礎變為玉視為吉兆，並「設齋慶之」，可知信仰佛教。但靈裕認為礎石並非變為玉而是變為琉璃，代表凶兆，反而建議薛胄祈求解除災禍。就本文來看，重要的是兩者都認為玉石可以做為吉兆的表徵，代表當時僧俗的共通認識。

---

⑯② 牧田諦亮，〈寶山寺靈裕について〉，《東方學報》，36冊（1964），頁261-286。

⑯③（唐）道宣撰，郭紹林點校，《續高僧傳》，卷9，〈隋相州演空寺釋靈裕傳八〉，頁314。

⑯④（唐）魏徵等撰，《隋書》，卷36，〈文獻獨孤皇后傳〉，頁1108-1109。

⑯⑤ 薛胄字紹玄，河東郡汾陰縣（今山西省運城市萬榮縣）人，出自河東薛氏，任大理卿、刑部尚司，檢校相州刺史。仁壽四年（604）隋文帝駕崩，隋文帝第五子漢王楊諒自并州起兵，攻打慈州。薛胄因畏其兵勢，未出兵前往救援，又收容楊諒的部下綦良，後來被朝廷流放至嶺南，於途中病故。（唐）魏徵等撰，《隋書》，卷56，〈薛胄傳〉，頁1387-13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幾位僧人與白玉像流通區域之間的地緣關係。曇遷為博陵（河北定州一帶）饒陽人。慧謙為瀛州人（今河北河間市），其安放塔基之處為海州（今江蘇連雲港）安和寺。釋法揩為曹州（今山東曹縣）人，護送舍利至曹州。僧人彥琮出自趙郡（河北趙縣）李氏，護送舍利至復州（湖北）安樂寺。靈裕俗姓趙，定州鉅鹿曲陽人（今河北曲陽）。薛胄的宅邸位在相州（河南安陽）。靈裕出生地為定州曲陽，正是東魏、北齊至隋代白玉佛像的生產中心。總括來說，這幾位僧人的出生地與薛胄所活躍的地區，除了復州之外，均為北齊白玉像的主要產地與流通範圍。推測上述僧人不但熟悉這一地區的白玉造像，也對於白玉做為新興造像材質與感應、祥瑞之間的相關性有著真切的認識。進一步而言，也值得留意僧人是否曾在白玉感應觀的發展過程中扮演過推廣的角色。

目前所出土的隋仁壽舍利石函均為青石所造，應是遵循隋代官方下達全國各州的統一規範。河北定州靜志寺塔曾出土一件隋大業二年（606）舍利白玉石函，採用曲陽白石雕造。石函蓋上平放一方形石誌，亦為白石雕造（圖83）。[166]在靜志寺塔的地宮中還出土三件隋代白玉菩薩像，高約25公分，彩繪描金，立於蓮花座上，可做為隋代白玉像與舍利信仰相互結合的實例（圖84）。[167]

北齊至隋代佛教造像材質的位階有所轉變，金像的地位依然最高，白玉的地位上升，青石退居其次，形成「金—白玉—青石」的位階關係。關於造成轉變的原因，推測可能與舍利信仰有關。此外，白玉具有光潔、明亮的特質，容易與佛像放光相聯想，被視為易於引發感應的造像材質。上述由青石到白玉的材質位階轉換，與北齊至隋代白玉葬具的出現與流行相互呼應。白玉在儒家禮制中具有尊貴的政治地位，在佛教的脈絡中重新被賦予新的宗教形式與意涵。活躍於北朝晚期至隋代的虞弘應該對於白玉感應有所認識，喪家因而選擇白玉來製作其葬具與隨葬人俑。虞弘墓中還出土一件通高47.8公分的石燈，由燈座與

[166] 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頁39-51。浙江省博物館、定州市博物館編，《心放俗外—定州靜志、淨眾佛塔地宮文物》（北京：中國書店，2014），頁44-45、59-65。

[167] 在唐大中十二年（858）《唐定州靜志寺重葬真身記》中稱這三件白玉菩薩像為「珉像」。黎毓馨，〈隋代初建、晚唐改造、北宋沿用的定州靜志寺塔地宮〉，頁8-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燈盞組成，亦採漢白玉製作（圖85）。在北朝至隋代的墓葬中屢見隨葬石燈，然而白玉燈十分罕見。採用白玉製燈，可說是善用白玉放光的特質。除此之外，漢地粟特人是否可能賦予白玉新的祆教意涵，則有待進一步研究。[168]

結語

在虞弘墓中可見到三種來源不同、類型互異的網絡，代表不同的宗教文化範疇，可藉由粟特、墓葬、佛教來加以歸納。具體而言，這三種網絡分別是：第一、以粟特人聚落為節點的東西向粟特人貿易網絡；第二、以晉陽為中心的北鎮武人墓葬文化網絡；第三、以定州與鄴城為中心的白玉像製作網絡。本文主標題鸚鵡與白玉分別代表後兩者。上述三種網絡中，粟特人網絡具有國際性質，藉由遠距離貿易的模式傳播粟特、祆教圖像，這部分向來是虞弘墓石槨圖像的研究焦點。第二、三種網絡則是東魏、北齊至隋代地域文化的新發展。過去學界偏重於第一種粟特國際網絡的分析。本文調整視角，重新發掘地域網絡所蘊含的政治、宗教文化因素。考察這三種網絡之間的重疊、交錯關係，有助於重新認識粟特網絡與北朝晚期至隋代地域文化所共構的多層次文化交流樣態。

---

[168] 虞弘字「莫潘」，此二字為漢字標音，粟特文的標音為*Māx-farn*，原意為「月神的榮光」（Mākhfarn）。*Māx*即Mākh、Māh（Moon），指月神。瑣羅亞斯德教的經典中將月神視為明亮、散發光芒的光榮賜水者，並賜予智慧與財富。若參考前引《趙郡王高叡定國寺碑》所記「夜光遍體，因現神通之色」，虞弘本名「月神的榮光」與佛教白玉像之間的共通點在於月光。白玉所具有的光明潔白的物質性，是否為虞弘後人選擇此材質的原因之一？有待進一步探究。「莫潘」的粟特文標音參見吉田豊、影山悅子，〈ソグド人—典籍を補う最新の出土資料〉，《月刊しにか》，9號（2002），頁44-49。Etsuko Kageyama, “The Winged Crown and the Triple-crescent Crown in the Sogdian Funerary Monuments from China: Their Relation to the Hephthalite Occupation of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no. 2 (2007), pp. 11-22. 瑣羅亞斯德教的月神信仰參見M. N. Dhalla, *The History of Zoroastria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Toronto, 1938), pp. 196-197. John M. Rosenfield,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 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虞弘墓石槨具備多重的文化因素，以視覺與物質的形式充分體現出這三種網絡的交錯關係，表現出擔任儀同大將軍、統領并、代、介三州鄉團與檢校薩保府的政治宗教身分。虞弘墓石槨出現嶄新的多層結構，將石槨（石堂）、石牀、石獅座墊統合成新的綜合體。這些來源不同的結構，以上下疊加的方式來加以構築。虞弘墓石獅頭座墊的形制採自石門的伏獅石墩，並吸收帳座石獅的布局，增加石獅的數量，轉用晉陽北鎮武人的墓葬因素，進一步強化石獅守護牀座的功能，也表現出墓主尊貴的地位。白玉伎樂俑延續北齊晉陽地區的陶俑風格，表現出北鎮武人的理想體態。石槨採白玉雕製，既是身分地位的象徵，還具有感應與放光的宗教意涵。

就裝飾而言，蓮花變形紋、鸚鵡母題均繼承自北魏平城時期的墓葬文化。考慮到虞弘父君陀曾在柔然擔任要職，不能排除其中可能具有柔然文化的因素。北朝鸚鵡母題具有三重意涵：北魏平城時期做為佛教靈鳥、瑞鳥；洛陽時期開始出現守護的功能；東魏、北齊進一步做為勇武的象徵，成為代表高歡的政治符號。虞弘墓石槨中口銜葡萄的鸚鵡可視為瑞鳥，表現天國淨土；槨座配置天人奏樂、狩獵等圖的鸚鵡龕，具有守護墓主的意涵。此外，這些鸚鵡母題均顯示出與北鎮武人文化的相關性。

北朝晚期至隋代密集出現白玉葬具、白玉俑的現象，與佛教物質文化的發展密切相關。這段時期佛教造像材質的位階有所轉變，形成「金—白玉—青石」的位階關係。除了虞弘墓之外，麴慶墓中也可見白玉地位高於青石的現象。白玉具有光潔、明亮的特質，被佛教徒視為易於引發感應的造像材質。白玉在佛教的脈絡中被賦予新的宗教形式與意涵，活躍中原的粟特人首領顯然對於白玉感應有所認識。對於虞弘一族而言，這種光明潔白的物質性適合用來製作葬具與隨葬品，是否可能被賦予新的祆教意涵，例如代表月神的賜福與榮光，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就虞弘墓石槨內外的圖像所見，除了表現祆教天神與信仰，以及虞弘夫婦死後居於天國之外，還藉由搏鬥、狩獵主題以及動態的風格，傳達出虞弘勇敢而高貴的武人形象。虞弘墓石槨圖像的風格特徵為誇大的動態感，既不同於西亞、中亞的圖像原型，也未見於其他漢地粟特人葬具。若由虞弘統領鄉團以及承繼晉陽北鎮武人墓葬傳統的角度來看，可視為武勳的視覺化展現，傳達出虞弘的武人品味與性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虞弘曾仕於北齊，在北周至隋的更迭之際能洞察時局變遷，不但擔任儀同大將軍並因出自楊堅的丞相府而被委與重任，保有山西中北部的武力並檢校薩保府。在隋初政局動盪以及突厥侵逼的情勢下，虞弘的政治、軍事實力持續有所提升。虞弘墓石槨中所見多層結構的設計與獨特的國際性圖像，可用來彰顯其新興的政治軍事地位。由於隋初墓葬尚未如唐代形成一套嚴格的等級規範，對於粟特人聚落的管理亦較有彈性，因此粟特人有機會創造新的葬具形制並選用新型墓葬圖像，進行較具有個人性的自我敘事。考察虞弘墓石槨多重文化因素之際，除了重視粟特網絡與地域網絡的交互作用之外，還必須充分考慮虞弘的生平、北朝晚期至隋初的政治變遷，以及這一階段粟特人武人化的現象。

最後由研究方法的角度來闡述地域網絡研究的內涵。首先，地域網絡可做為研究歷史記憶的一個重要環節。經由以上考察可知，虞弘墓中依然可見粟特人對於北魏的歷史記憶，然而此階段歷史記憶的生成機制已有所不同。虞弘墓中所體現的北魏歷史記憶，主要是透過北齊、隋代并州的地域網絡而被加以形塑與重構。其中既包含直接繼承代北的裝飾因素（例如蓮花變形紋），也可見經由北鎮武人集團重新詮釋的政治符號（例如鸚鵡）。其次，就墓葬圖像研究而言，將地域網絡的視角與物質文化研究相互結合，有助於擴大關照材料的範圍，依據不同載體的物性來解析重層的圖像意義，重構圖像載體的宗教社會史，進而豐富圖像研究的內涵。由此來看，地域網絡不僅是由人群所構成的政治、社會關係網絡，也是圖像、視覺與物質所共同交織而成的意義之網。

本文藉由粟特、墓葬、佛教三重網絡的錯綜關係來重新檢視虞弘墓，嘗試說明地域網絡的視角對於探索漢地粟特墓葬圖像的有效性。如何由地域網絡的視角來探索圖像、人群與物質文化之間的錯綜關係，並由跨地域的視野重建中古前期絲路沿線由中亞、北亞至東北亞之間文化交流的複雜樣貌，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記：本文初稿曾以〈隋代虞弘墓新探〉為題，發表於2022年12月2日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主辦，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lk Road Studies: Archaeology, History, Culture, Languages and Religions on the Silk Roads。二稿發表於2023年12月25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12年度第20次講論會，會中得到顏娟英博士、鄭雅如博士等多位師友的寶貴意見。黃閔翎協助資料整理，另承蒙兩位審查先生悉心指正，謹致謝忱。）

（責任編輯：黃閔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佛本行集經》，收入高楠順次郎編，《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第3卷。
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紀念館編
《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
（唐）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
《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
（唐）玄奘著；水谷真成譯
《大唐西域記》，東京：平凡社，1971。
（唐）李百藥
《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
（唐）李延壽
《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83。
李滌生
《荀子集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1。
（清）阮元校刊
《十三經注疏5 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唐）姚汝能撰
《安祿山事迹》，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傳記類》，550冊，清宣統三年葉氏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
范祥雍校注
《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
《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6。
（西晉）陳壽
《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
（清）陸增祥編
《八瓊室金石補正》，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第6冊。
（晉）陸翽
《鄴中記》，收入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叢書集成新編》，第113冊，史地類，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唐）道宣撰；郭紹林點校
《續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
（後晉）劉昫等撰
《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後秦）鳩摩羅什譯
《妙法蓮華經》，收入高楠順次郎編，《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第9卷。
（南朝宋）劉義慶
《幽明錄》，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顏娟英主編
《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
（北齊）魏收
《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92。
（北齊）魏收著；塚本善隆譯註
《魏書釈老志》，東京：平凡社，1990。
（唐）魏徵等撰
《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4。
（唐）蘇敬撰
《新修本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醫家類》，989冊，清康熙二十一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
《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

近人論著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2001 〈大同市北魏宋紹祖墓發掘簡報〉，《文物》，7期，頁19-39。
2017 《太原沙溝隋代斛律徹墓》，北京：科學出版社。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Shanxi
2001 “Excavation of Song Shaozu’s Tomb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in Datong,” *Cultural Relics*, no. 7, pp. 19-39.
2017 *Taiyuan Shagou Suidai Hulu Che mu* (Excavation of Hulu Che’s Tomb of the Sui Dynasty in Shagou, Taiyuan), Beijing: The Science Press.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運城市文物保護中心、萬榮縣文化和旅遊局
2023 〈山西萬榮西思雅北魏薛懷吉墓發掘簡報〉，《文物》，1期，頁4-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h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Yuncheng Municipal Preservation Center of Cultural Relics, and Bureau of Culture and Tourism of Wanrong County

2023 "The Excavation of Xue Huaiji's Tomb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in West Siya, Wanrong, Shanxi,"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4-3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1992 〈太原隋斛律徹墓清理簡報〉,《文物》, 10期, 頁1-14。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Shanxi, and Taiyuan Shi wenwu guanli weiyuanhui (The Taiyuan City Management Committee for Cultural Relics)

1992 "Taiyuan Sui Hulu Che mu qingli jianbao (Excavation Clearance of Hulu Che's Tomb of the Sui Dynasty in Taiyuan)," *Cultural Relics*, no. 10, pp. 1-1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2001 〈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簡報〉,《文物》, 1期, 頁27-52。

2003 〈太原北齊徐顯秀墓發掘簡報〉,《文物》, 10期, 頁4-40。

2005 《太原隋虞弘墓》,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6 《北齊東安王婁叡墓》, 北京：文物出版社。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Shanxi and Others

2001 "Excavation of Yu Hong of the Sui Dynasty in Taiyuan, Shanxi,"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27-52.

2003 "Excavation of the Xu Xianxiu's Tomb of the Northern Qi in Taiyuan," *Cultural Relics*, no. 10, pp. 4-40.

2005 *Sui Dynasty Tomb of Yu Hong in Taiyua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06 *Lou Rui's Tomb*,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大同市博物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

1978 〈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 7期, 頁29-35。

Datong Museum, and Shanxi Sheng wenwu gongzuo weiyuanhui (The Shanxi Provincial Working Committee for Cultural Relics)

1978 "Datong Fangshan Beiwei Yongguling (Yonggu Mausoleum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t Fangshan, Datong)," *Cultural Relics*, no. 7, pp. 29-35.

大同市博物館

2007 〈大同北魏方山思遠佛寺遺址發掘報告〉,《文物》, 4期, 頁4-26。

The Museum of Datong City

2007 "The Excavation Report on Siyuan Temple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Cultural Relics*, no. 4, pp. 4-26.

大同市博物館編；王利民主編

2016 《平城文物精粹：大同市博物館館藏精品錄》, 南京：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

Datong Museum ed.; Wang, Limin (editor-in-chief)

2016 *Pingcheng wenwu jingcui: Datong Shi bowuguan guancang jingpin lu* (Pingche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ultural Relics: The Collection Catalogue of Datong Municipal Museum), Nanjing: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2011 〈山西大同雲波里路北魏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 12期，頁13-25。

2023 〈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M29發掘簡報〉,《文物》, 1期，頁33-57。

Dato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2011 "A Mural-Painted Tomb of the Northern Wei in Yunboli Road, Datong, Shanxi," *Cultural Relics*, no. 12, pp. 13-25.

2023 "The Excavation of Tomb M29 at the Qilicun Tomb Complex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in Datong, Shanxi,"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33-56.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劉俊喜主編

2008 《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 北京：文物出版社。

Dato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Liu, Junxi) ed.

2008 *Tombs of the Northern Wei Period in Yanbei Teachers College at Datong*,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大同市博物館馬玉基

1983 〈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臺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 8期，頁1-4。

Datong Museum (Ma, Yuji)

1983 "Datong Shi Xiaozhancun huayi tatai Beiwei mu qingli jianbao (Excavation Clearance of the Northern Wei Tomb at Huageta Tai, Xiaozhan Village, Datong)," *Cultural Relics*, no. 8, pp. 1-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洛陽古墓博物館

1994 〈北魏宣武帝景陵發掘報告〉,《考古》, 9期，頁801-814。

Excavation Team of the Luoyang Old City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Luoyang Museum of Ancient Tombs

1994 "Beiwei Xuanwudi Jingling fajue baogao (Excavation of Jing Mausoleum, Tomb of the Northern Wei Emperor Xuanwu)," *Archaeology*, no. 9, pp. 801-814.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

1959 〈安陽隋張盛墓發掘記〉,《考古》, 10期，頁541-545。

Excavation Team of Anyang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59 "Anyang Sui Zhang Cheng mu fajue ji (Excavation Record of the Sui Dynasty Zhang Cheng's Tomb in Anyang)," *Archaeology*, no. 10, pp. 541-54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96 《北魏洛陽永寧寺 1979～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96 *The Yongningsi Temple in Northern Wei Luoyang: Excavation in 1979-1994*, Beijing: The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
1980 《唐長安城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80 *Excavation of the Sui and Tang Tombs at Xi'a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著
2019 《鄴城北吳莊出土佛教造像》，北京：科學出版社。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ebei Sheng wenwu yanjiusuo (He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2019 *Yecheng Beiwuzhuang chutu Fojiao zaoxiang* (The Buddhist Sculptures Excavated from Beiwuzhuang, Yecheng), Beijing: The Science Press.
天水市博物館
1992 〈天水市發現隋唐屏風石棺牀墓〉，《考古》，1期，頁46-54。
Tianshui Museum
1992 "Tianshui Shi faxian Sui Tang pingfeng shiguanchuang mu (The Tomb with Screen-style Sarcophagus of Sui and Tang Dynasty Discovered in Tianshui)," *Archaeology*, no. 1, pp. 46-54.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
2004 《北齊婁叡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5 《晉陽古城》，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5 《隋代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Taiyuan Shi wenwu kaogu yanjiusuo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Taiyuan) ed.
2004 *Beiqi Lou Rui mu* (Lou Rui's Tomb of the Northern Qi),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05 *Jinyang gucheng* (The Ancient City of Jinyang),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05 *Suidai Yu Hong mu* (Yu Hong's Tomb of the Sui Dynast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王仲犖
1980 《北周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
Wang, Zhongluo
1980 *Beizhou dili zhi* (The Annals of Northern Zhou's Geograph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王怡辰
2006 《東魏北齊的統治集團》，臺北：文津出版社。
Wang, Yi-chen
2006 *Dongwei Beiqi de tongzhi jituan* (The Ruling Group of the Eastern Wei and Northern Qi), Taipei: Wenchin Publishing Co., Ltd.
王煜、陳珠伊
2022 〈敦煌佛爺廟灣魏晉壁畫墓鸚鵡圖像初探〉，《敦煌研究》，3期，頁31-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ang, Yu, and Shuyi Chen
2022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Parrot Images from the Wei-Jin Mural Tombs at Foyemiaowan, Dunhuang,” *Dunhuang Research*, no. 3, pp. 31-38.
冉萬里
2013 《中國古代舍利瘞埋制度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
Ran, Wanli
2013 *Zhongguo gudai sheli yimai zhidu yanjiu* (A Study of the Burial System for Buddhist Relics in the Ancient China),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
2004 〈西安市北周史君石槨墓〉，《考古》，7期，頁38-49。
2005 〈西安北周涼州薩保史君墓發掘簡報〉，《文物》，3期，頁4-33。
2008 〈西安北周康業墓發掘簡報〉，《文物》，6期，頁14-35。
Xi’an Municip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2004 “Xi’an Shi Beizhou Shijun shiguo mu (The Wirkak [Shi Jun] Sarcophagus of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in Xi’an),” *Archaeology*, no. 7, pp. 38-49.
2005 “Excavation of Shi’s Tomb of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at Sabao near Xi’an,” *Cultural Relics*, no. 3, pp. 4-33.
2008 “Tomb of Kang Ye of the Northern Zhou in Xi’an, Shaanxi,” *Cultural Relics*, no. 6, pp. 14-35.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編著；楊軍凱著
2014 《北周史君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Xi’an Municip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Yang, Junkai
2014 *Shi Jun Tomb of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23 〈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夫妻合葬墓的發掘〉，《考古學報》，3期，頁393-433。
Anya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rchaeology, and He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chaeology
2023 “The Excavation of a Sui Joint Tomb of Qu Qing and His Wife in Anyang, Henan,” *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no. 3, pp. 393-433.
李靜杰、田軍編著
2019 《定州白石佛像》，臺北：財團法人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會。
Li, Jingjie, and Jun Tian
2019 *Dingzhou baishi foxiang* (The White Marble Buddha Sculptures in Dingzhou), Taipei: Chue Feng Buddhist Art & Culture Foundation.
李愛國
2001 〈太原市晉陽古城遺址出土北朝漢白玉石造像〉，《文物》，5期，頁90-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i, Aiguo
2001 "Taiyuan Shi Jinyang gucheng yizhi chutu Beichao Han baiyushi zaoxiang (The Han White Jade Sculptur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Excavated from the Jinyang Ancient City Site in Taiyuan)," *Cultural Relics*, no. 5, pp. 90-91.

吳玉貴
1998 《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Wu, Yugui
1998 *Tujue Hanguo yu Sui Tang guanxishi yanjiu* (The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urkic Khaganate and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吳強華、趙超編
2022 《翟門生的世界：絲綢之路上的使者》，北京：文物出版社。

Wu, Qianghua, and Zhao Chao eds.
2022 *The World of Di Mensheng: An Envoy on the Silk Road*,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沈睿文
2011 〈論墓制與墓主國家和民族認同的關係—以康業、安伽、史君、虞弘諸墓為例〉，《西域文史》，第6輯，頁205-232。
2019 《中古中國祆教信仰與喪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Shen, Ruiwen
2011 "Lun muzhi yu muzhu guojia he minzu renting de guanxi: yi Kang Ye, An Qie, Shi Jun, Yu Hong zhumu wei li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urial Systems and the National and Ethnic Identity of the Tomb Owners: Examples of Kang Ye, An Qie, Shi Jun, and Yu Hong Tombs)," *Literature & Histor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no. 6, pp. 205-232.
2019 *Zoroastrians in Medieval China: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and Funeral*,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李梅田
2021 《葬之以禮：魏晉南北朝喪葬禮俗與文化變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Li, Meitian
2021 *Zang zhi yi li: Wei Jin Nan Beichao sangzang lisu yu wenhua bianqian* (Burial with Rites and Rituals: Funeral Customs and Cultural Evolution in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李寧民
2013 〈天水出土屏風石棺牀再探討〉，《中原文物》，3期，頁85-105。
2016 〈天水出土屏風式石棺牀的修復及研究〉，收入榮新江、羅豐主編，《粟特人在中國：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上冊，北京：科學出版社，頁191-2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i, Ningmin
2013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Screen-style Sarcophagus Bed of Sui and Tang Dynasty Unearthed from Tainshui City,”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no. 3, pp. 85-105.
2016 “Tianshui chutu pingfengshi shiguanchuang de xiufu ji yanjiu (Restoration and Study of the Screen-style Sarcophagus Excavated in Tianshui),” in Rong Xinjiang and Luo Feng eds., *Sogdians in China: New Evidence in Archaeological Finds and Unearthed Texts*, vol. 1, Beijing: The Science Press, pp, 191-206.

李玉珉
2002 〈南北朝觀世音造像考〉，收入邢義田主編，《中世紀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與藝術》，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235-331。

Lee, Yu-min
2002 “Nan-Beichao Guanshiyin zaoxiang kao (A Study of Avalokiteshvara Sculptures of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n Hsing I-tien ed., *Regional Culture, Religion, and Arts Before the Seventh Century*, Taipei: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李志鴻
2015 〈隋代的王權與佛教—以仁壽設塔活動為核心〉，《中華佛學研究》，16期，頁105-126。

Li, Chih-hung
2015 “Buddhism and Kingship in Sui Dynasty: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s of Stupa During the Renshou Period,” *Chung-Hwa Buddhist Studies*, no. 16, pp. 105-126.

定縣博物館
1972 〈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8期，頁39-51。

Dingxian County Museum
1972 “Hebei Ding Xian faxian liangzuo Songdai taji (Discovery of Two Song Pagoda Bases in Ding County, Hebei),” *Cultural Relics*, no. 8, pp. 39-51.

呂春盛
2002 《關隴集團的權力結構演變—西魏北周政治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

Lu, Chun-sheng
2002 *Guanlong Jituan de quanli jiegou yanbian-Xiwei Beizhou zhengzhishi yanjiu* (Evolution of the Power Structure in the Guanlong Group: A Study 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ei and Northern Zhou), Taipei: Daw Shiang Publishing.

林郡儀
2021 〈區域互動下陶俑樣式的轉變：以北周到隋的長安地區為中心〉，《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51期，頁1-100。

Lin, Chun-i
2021 “Changes in the Forms of Ceramic Tomb Figurines in the Context of Regiona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teraction: The Chang'an Area from the Northern Zhou to the Sui Dynasty as a Case Study,"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51, pp. 1-100.

林梅村

2002 〈稽胡史跡考—太原新出隋代虞弘墓誌的幾個問題〉,《中國史研究》,1期,頁71-84。

Lin, Meicun

2002 "Ji Hu shiji kao: Taiyuan xinchu Suidai Yu Hong muzhi de jige wenti (Study of the Jihu Historical Sites: Several Issues Regarding the Newly Discovered Yu Hong's Epitaph of Sui Dynasty in Taiyuan),"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no. 1, pp. 71-84.

林偉正、徐胭胭

2022 〈材質與工藝—中國中古佛像材質的思考〉,《美術研究》,4期,頁66-79。

Lin, Weicheng, and Yanyan Xu

2022 "Caizhi yu gongyi: Zhongguo zhonggu foxiang caizhi de sikao (Materials and Craftsmanship: Thoughts on the Materials of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s)," *Art Research*, no. 4, pp. 66-79.

林聖智

2010 〈北朝晚期漢地粟特人葬具與北魏墓葬文化——以北齊安陽石棺床為主的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1本3分,頁513-596。

2019 《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2022 〈墓葬與佛教:重探北魏平城時期的屋形葬具〉,《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53期,頁45-148。

2023 〈北魏平城時期石牀的系譜:裝飾的觀點〉,《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4本1分,頁59-154。

未刊稿〈《續高僧傳》〈感通篇〉譯注〈釋法性傳〉〉。

Lin, Sheng-chih

2010 "Stone Funerary Couches of the Late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Rethinking the Funerary Culture of the Sogdians in Chin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 81, no. 3, pp. 513-596.

2019 *Image and Ornament: The Representation of Death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22 "Tombs and Buddhism: Re-Exploring House-Shaped Sarcophagi from the Pingcheng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53, pp. 45-148.

2023 "The Chronology of Stone Beds from the Pingcheng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namentatio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 94, no. 1, pp. 59-154.

Unpublished ""Xu gaoseng zhuan" 'gantong pian' yizhu 'Shi Faxing chuan' (Interpretation and Comments on Xu Gao Seng Chuan: Shi Fa-x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周偉洲

2004 〈隋虞弘墓誌釋證〉，收入榮新江、李孝聰主編，《中外關係史：新史料與新問題》，北京：科學出版社，頁247-257。

Zhou, Weizhou

2004 "Sui Yu Hong muzhi shizheng (Interpret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Yu Hong's Epitaph of the Sui Dynasty)," in Rong Xinjiang and Li Xiaocong eds., *Zhong wai guanxishi: xin shiliao yu xin wenti* (History of China's Relationships with the Other Countries: New Sources and New Issues), Beijing: The Science Press, pp. 247-257.

金申

2008 〈古代佛造像的石料產地問題〉，收入西安碑林博物館編，《紀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583-588。

2010 《佛教美術考古叢考續編》，北京：華齡出版社。

Jin, Shen

2008 "Gudai fo zaoxiang de shiliao chandi wenti (The Issues of Material Sources of the Ancient Buddhist Stone Sculptures)," in Xi'an Beilin Museum e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eminar on Commemorating the 920th Anniversary of Establishment of Xi'an Beili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pp. 583-588.

2010 *Fojiao meishu congkao xubian* (A Sequel Compilation of Archaeological Studies on Buddhist Art), Beijing: Hualing chubanshe.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

1966 〈河北定縣出土北魏石函〉，《考古》，5期，頁252-259。

Hebei Sheng wenhuaju wenwu gongzuodui (Cultural Relics Team of Hebei Provincial Bureau of Culture)

1996 "Hebei Ding Xian chutu Beiwei shihan (The Stone Box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Unearthed in Ding County, Hebei Province)," *Archaeology*, no. 5, pp. 252-259.

馬雍

1983 〈北魏封和突墓及其出土的波斯銀盤〉，《文物》，8期，頁8-12、39。

Ma, Yong

1983 "Beiwei Feng Hetu mu ji qi chutu de Bosi yinpan (Feng Hetu's Tomb of the Northern Wei and Its Unearthed Persian Silver Plate)," *Cultural Relics*, no. 8, pp. 8-12, 39.

馬琳燕

2013 〈甘肅天水隋唐彩繪圍屏石榻的保護與修復〉，《文物》，7期，頁83-89。

Ma, Linyan

2013 "Gansu Tianshui Sui Tang caihui weiping shita de baohu yu xiufu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of the Sui and Tang Stone Bed with Three-sided Painted Screen Discovered in Tianshui, Gansu)," *Cultural Relics*, no. 7, pp. 83-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姜伯勤
1999 〈安陽北齊石棺牀畫像石的圖像考察與入華粟特人的祆教美術〉,《藝術史研究》,1輯,頁151-186。
2001 〈隋檢校薩寶虞弘墓石槨祆教畫像石圖像程序試探〉,收入巫鴻主編,《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互動與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頁29-50。
2002 〈隋檢校薩寶虞弘墓祆教畫像石圖像的再探討〉,《藝術史研究》,4輯,頁183-198。
2004 《中國祆教藝術史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Jiang, Boqin
1999 "Stone Illustrations from an Anyang Mortuary Bed of Northern Qi and the Sogdian Art," *The Study of Art History*, no. 1, pp. 151-186.
2001 "Sui Jianjiao Sabao Yu Hong mu shiguo xianjiao huaxiangshi tuxiang chengxu shitan (Pilot Study on the Zoroastrian Stone Relief from the Sarcophagus of Yu Hong, the Acting Director of Zoroastrian Affairs of the Sui Dynasty)," in Wu Hung ed., *Between Han and Tang: Cultural and Artistic Interaction in a Transformative Period*,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pp. 29-50.
2002 "Rethinking the Stone Relief from Tomb of Yu Hong, Jianjiao Sabao in the Sui Period," *The Study of Art History*, no. 4, pp. 183-198.
2004 *A History of Chinese Zoroastrian Art*,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孫武軍
2014 《入華粟特人墓葬圖像的喪葬與宗教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Sun, Wujun
2014 *Ruhua Suteren muzang tuxiang de sangzang yu zongjiao wenhua* (The Funerary and Religious Culture of the Image of Sogdian Tombs in China),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浙江省博物館、定州市博物館編
2014 《心放俗外—定州靜志、淨眾佛塔地宮文物》,北京:中國書店。
Zhejiang Provincial Museum, and Dingzhou Museum eds.
2014 *Xin fang su wai: Zingzhou Jingzhi, Jingzhong fota digong wenwu* (Away from the Secular—Artifacts from the Hypogeums of Jingzhi and Jingzhong Pagodas in Dingzhou), Beijing: China Books.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1959 〈西安郭家灘隋姬威墓清理簡報〉,《文物》,8期,頁4-7。
Shaanxi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ultural Relics
1959 "Xi'an Guojiatan Sui Ji Wei mu qingli jianbao (Excavation Clearance of Ji Wei's Tomb of the Sui Dynasty at Guojiatan, Xi'an)," *Cultural Relics*, no. 8, pp. 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編著
2003 《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ed.
2003 *Xi'an Beizhou An Qie mu* (The Tomb of An Jia of the Northern Zhou in Xi'a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2008 〈陝西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5期，頁4-31。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2008 "A Mural Tomb of Sui Dynasty in Shuicun Village, Tongguan County, Shaanxi," *Cultural Relics*, no. 5, pp. 4-31.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編著
2013 《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ed.
2013 *The Sui Dynasty Mural Painting Tomb in Shuicun, Tonggua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唐長孺
1955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9 《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
Tang, Changru
1955 *Wei Jin Nanbeichao shi luncong* (Collection of the Historical Essays on the Six Dynastie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Shanju cungao* (Manuscripts from the Dwelling in the Mountain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唐金裕
1959 〈西安西郊隋李靜訓墓發掘簡報〉，《考古》，9期，頁471-472。
Tang, Jinyu
1959 "Xi'an xijiao Sui Li Jingxun mu fajue jianbao (Excavation of Li Jingxun's Tomb of the Sui Dynasty in the Western Suburbs of Xi'an)," *Archaeology*, no. 9, pp. 471-472.
夏鼐
1983 〈漢代的玉器—漢代玉器中傳統的延續和變化〉，《考古學報》，2期，頁125-145。
1983 〈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薩珊銀盤考〉，《文物》，8期，頁5-7。
Xia, Nai
1983 "Handai de yuqi: Handai yuqi Zhong chuantong de yanxu he bianhua (Jade Artifacts of the Han Dynasty—The Continuities and Changes in the Tradition)," *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no. 2, pp. 125-145.
1983 "Beiwei Feng Hetu mu chutu Sashan yinpan kao (Study on the Persian Silver Plate Unearthed from the Feng Hetu's Tomb of the Northern Wei)," *Cultural Relics*, no. 8, pp. 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韋正
2002 〈東漢、六朝的朝服葬〉,《文物》,3期,頁72-78。
Wei, Zheng
2002 "Donghan, Liuchao de chaofu zang (Burial with Official Court Robes as Burial Garments in the Eastern Han and Six Dynasties)," *Cultural Relics*, no. 3, pp. 72-78.
渠傳福
2003 〈徐顯秀墓與北齊晉陽〉,《文物》,10期,頁50-52、65。
Qu, Chuanfu
2003 "Xu Xianxiu mu yu Beiqi Jinyang (Tomb of Xu Xianxiu and the City Jinyang During the Northern Qi)," *Cultural Relics*, no. 10, pp. 50-52, 65.
宿白
1977 〈盛樂、平城一帶的拓跋鮮卑——北魏遺迹——鮮卑遺迹輯錄之二〉,《文物》,11期,頁38-46。
Su, Bai
1977 "Shengle, Pingcheng yidai de Tuoba Xianbei, Beiwei yiji, Xianbei yiji jilu zhi er (Tuoba Xianbei in Shengle and Pingcheng Areas: Relics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Relics of Xianbei Part 2)," *Cultural Relics*, no. 11, pp. 38-46.
康樂
1991 〈代人與鎮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本4分,頁895-916。
1995 《從西郊到南郊—國家祭典與北魏政治》,臺北:稻鄉出版社。
Kang, Le
1991 "The Tai Group and the Garrison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vol. 61, no. 4, pp. 895-916.
1995 *Cong xijiao dao nanjiao: guojia jidian yu beiwei zhengzhi* (From the Western Suburb to the Southern Suburb: State Cults and Northern Wei Politics), Taipei: Daw Shiang Publishing.
馮賀軍
2005 《曲陽白石造像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Feng, Hejun
2005 *Quyang baishi zaoxiang yanjiu* (Study of the White Marble Sculptures in Quyang), Beijing: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陳悅新
2018 〈北齊趙郡王高睿造像的佛衣類型〉,《華夏考古》,1期,頁77-82。
Chen, Yuexin
2018 "The Costume Type of the Buddhist Statues Made by Gao Rui, the Prince of the Zhao Commandery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Huaxia Archaeology*, no. 1, pp. 77-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馮培紅
2020 〈廿年虞弘夫婦合葬墓研究回顧與展望—以虞弘族屬與魚國地望為中心〉,《西域研究》, 2期，頁153-165。
Feng, Peihong
2020 "The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Yuhongs' Co-burial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Focusing on the Yu Hong's Ethnic Background and Location of Yu State," *The Western Regions Studies*, no. 2, pp. 153-165.
畢波
2006 〈虞弘墓所謂"夫婦宴飲圖"辨析〉,《故宮博物院院刊》, 1期，頁66-83。
Bi, Bo
2006 "An Analysis of the Mural Painting of the "Husband and Wife Banqueting" in the Tomb of Yu Hong,"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1, pp. 66-83.
黃明蘭
1987 《洛陽北魏世俗石刻線畫集》, 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Huang, Minglan
1987 *Luoyang Beiwei shisu shike xianhua ji* (Collection of Secular Artworks in Stone Line Engraving of the Northern Wei in Luoyang), Beijing: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敦煌文物研究所
1972 〈新發現的北魏刺繡〉,《文物》, 2期，頁54-60。
Dunhua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ed.
1972 "Xin faxian de Beiwei cixiu (The Newly Discovered Northern Wei Embroidery)," *Cultural Relics*, no. 2, pp. 54-60.
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編
1989 《中國石窟 雲岡石窟》, 一，東京：平凡社。
Institut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Yungang Grottoes ed.
1989 *Zhongguo shiku: Yungang shiku* (The Grotto Art of China: The Yungang Grottoes), vol. 1, Tokyo: Heibonsha.
張慶捷
2001 〈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槨浮雕的初步考察〉, 收入巫鴻主編,《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互動與交融》, 北京：文物出版社，頁3-28。
2001 〈《虞弘墓誌》中的幾個問題〉,《文物》, 1期，頁102-108。
2001 〈隋虞弘墓誌考釋〉,《唐研究》, 7卷，頁145-176。
2003 〈虞弘墓石槨圖像中的波斯文化因素〉, 收入葉奕良編,《伊朗學在中國論文集》, 第三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237-255。
2004 〈入鄉隨俗與難忘故土——入華粟特人石葬具概觀〉, 收入榮新江、張志清主編,《從撒馬爾干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迹》,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頁9-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10 《胡商、胡騰舞與入華中亞人—解讀虞弘墓》，太原：山西出版集團・北岳文藝出版社。

2016 〈北魏石堂棺牀與附屬壁畫文字——以新發現解興石堂為例探討葬俗文化的變遷〉，收入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兩個世界的徘徊：中古時期喪葬觀念風俗與禮儀制度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頁233-249。

2020 《解讀虞弘墓—北朝定居中國的粟特人》，太原：山西出版傳媒集團・三晉出版社。

Zhang, Qingjie

2001 "Taiyuan Suidai Yu Hong mu shiguo fudiao de chubu kaoch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ief Carvings on Yu Hong's Sarcophagus of the Sui Dynasty in Taiyuan)," in Wu Hung ed., *Between Han and Tang: Cultural and Artistic Interaction in a Transformative Period*,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pp. 3-28.

2001 "'Yu Hong muzhi' zhong de jige wenti (Several Issues Regarding Yu Hong's Epitaph),"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102-108.

2001 "Sui Yu Hong muzhi kaoshi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i Dynasty Yu Hong's Epitaph)," *Journal of Tang Studies*, vol. 7, pp. 145-176.

2003 "Yu Hong mu shiguo tuxiang zhong de Bosi wenhua yinsu (The Persian Cultural Influence on the Decorative Images of Yu Hong's Sarcophagus)," in Ye Yiliang ed.,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Iranian Studies in China*, no. 3,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pp. 237-255.

2004 "Acculturation in a New Land and the Persistence of Homeland Memories: An Overview of the Funerary Use of Stone by the Sogdians in China," in Rong Xinjiang and Zhang Zhiqing eds., *From Samarkand to Chang'an: Cultural Traces of the Sogdians in China*,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pp. 9-16.

2010 *Hushang, Hutengwu yu ruhua Zhongyaren: jiedu Yu Hong mu* (Hu Merchants, Hu Dance, and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Interpreting the Tomb of Yu Hong), Taiyuan: Shanxi Publishing Media Group,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6 "Beiwei shitang guanchuang yu fushu bihua wenzi: yi xin faxian xiexing shitang wei li tantao zangsu wenhua de bianqian (The Coffin Platform and Frescoes of the Stone House-shaped Tomb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With the Case Study of the Newly Discovered Xiexing Stone House-shaped Tomb to Explore the Changes of Funeral Customs and Cultures)," i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rcha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ed., *Symposium in Funeral Customs and Ritual in Medieval China*, Beijing: The Science Press, pp. 233-249.

2020 *Jiedu Yu Hong mu: Beichao dingju Zhongguo de Suteren* (Interpretation of Yu Hong's Tomb: The Sogdians Settled in China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aiyuan: Shanxi Publishing Media Group, Sanjin Publishing Hous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柏主編
2008 《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2 河南》，北京：科學出版社。
Zhang, Bo ed.
2008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eramic Art Unearthed in China*, Beijing: The Science Press.
游自勇
2003 〈隋文帝仁壽頒天下舍利考〉，《世界宗教研究》，1期，頁24-30。
You, Ziyong
2003 "Sui Wendi renshou ban tianxia sheli kao (A Study on Sui Emperor Wen's Distribution of Sacred Relics)," *Studies in World Religions*, no. 1, pp. 24-30.
張志忠
2007 〈北魏宋紹祖墓相關問題的研究〉，《文物世界》，4期，頁13-15。
Zhang, Zhizhong
2007 "Beiwei Song Shaozu mu xiangguan wenti de yanjiu (Research of the Issues Regarding the Tomb of Song Shaozu of the Northern Wei)," *Journal of Chinese Antiquity*, no. 4, pp. 13-15.
張廣達
2008 〈再讀晚唐蘇諒妻馬氏雙語墓誌〉，《文本、圖像與文化流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250-273。
Zhang, Guangda
2008 "Zaidu Wantang Su Liang qi Mashi shuangyu muzhi (Re-reading the Late Tang Dynasty Bilingual Epitaph of Ma, the Wife of Su Liang)," *Wenben, tuxiang yu wenhua liuchuan* (Texts, Images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p. 250-273.
張金龍
2016 〈隋代虞弘族屬及其祆教信仰管窺〉，《文史哲》，2期，頁91-113。
Zhang, Jinlong
2016 "A Study of the Ethnic Background of Yu Hong in the Sui Dynasty and Their Zoroastrian Faith,"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no. 2, pp. 91-113.
楊伯達
1960 〈曲陽修德寺出土紀年造像的藝術風格與特徵〉，《故宮博物院院刊》，1期，頁43-60。
Yang, Boda
1960 "Quyang Xiudesi chutu jinian zaoxiang de yishu fengge yu tezheng (The Artistic Sty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ated Sculptures Excavated from the Temple of Xiude in Quyang),"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1, pp. 43-60.
楊泓
1986 〈北朝陶俑的源流、演變及其影響〉，收入中國考古學研究編委會編，《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記念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頁268-2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0 《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術》，北京：科學出版社。

Yang, Hong

1986 "Beichao taoyong de yuanliu, yanbian ji qi yingxiang (Origins,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Pottery Figurines)," in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China e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China: A Collection of Paper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Fiftieth Year of Prof. Xia Nai's Work in Archaeolog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pp. 268-276.

2000 *Art Archaeology and Buddhist Art of the Han-Tang Period*, Beijing: The Science Press.

葛承雍

2016 〈北朝粟特人大會中祆教色彩的新圖像—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北朝石堂解析〉，《文物》，1期，頁71-84。

Ge, Chengyong

2016 "New Images with Zoroastrian Flair in a General Assembly of Sogdians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Analy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the Outer Sarcophagu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Collected in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71-84.

楊軍凱

2003 〈北周史君墓石槨東壁浮雕圖像初探〉，《藝術史研究》，5輯，頁189-198。

2004 〈入華粟特聚落首領墓葬的新發現—北周涼州薩保史君墓石槨圖像初釋〉，收入榮新江、張志清主編，《從撒馬爾干到長安—粟特人在中國的文化遺迹》，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頁17-26。

2005 〈西安北周史君墓石槨圖像初探〉，收入《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法國漢學第10輯：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北京：中華書局，頁3-15。

Yang, Junkai

2003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the Eastern Panels from the Tomb of Shi Jun in Northern Zhou Period," *The Study of Art History*, no. 5, pp. 189-198.

2004 "Newly Discovered Burials of Sogdian Community Leaders in China: A Preliminary Decoding of the Illustrations on the Stone Sarcophagus of the *Sabao* Shi of Liangzhou Dating from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in Rong Xinjiang and Zhang Zhiqing eds., *From Samarkand to Chang'an: Cultural Traces of the Sogdians in China*, Beijing: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pp. 17-26.

2005 "Xi'an Beizhou Shijun mu shiguo tuxiang chutan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he Decoration of Northern Zhou Shi Jun's Sarcophagus in Xi'an)," in Faguo hanxue congshu bianji weiyuanhui (The Editorial Board of *Sinologie Française*) ed., *Sinologie Française*, no. 10: *Suteren zai Zhongguo: Lishi, kaogu, yuyan de xin tansuo* (Sogdians in China: New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pp. 3-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磁縣文化館
1979 〈河北磁縣北齊高潤墓〉,《考古》, 3期，頁235-243、234。
1984 〈河北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 4期，頁1-15。
Ci Xian wenhuaguan (Cixian Cultural Center)
1979 "Hebei Ci Xian Beiqi Gao Run mu (Gao Run's Tomb of the Northern Qi in Cixian, Hebei)," *Archaeology*, no. 3, pp. 235-243, 234.
1984 "Hebei Ci Xian Dongwei Ruru Gongzhu mu fajue jianbao (Excavation of the Eastern Wei Princess Ruru's Tomb in Cixian, Hebei)," *Cultural Relics*, no. 4, pp. 1-15.
嘉祥縣文物管理所
1987 〈山東嘉祥英山二號隋墓清理簡報〉,《文物》, 11期，頁57-60。
Jiaxiang Xian wenwu guanlisuo (The Jiaxiang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Office)
1987 "Shandong Jiaxiang Yingshan erhao Sui mu qingli jianbao (Excavation Clearance of the Sui Tomb Number Two at Yingshan in Jiaxiang, Shandong)," *Cultural Relics*, no. 11, pp. 57-60.
榮新江
1999 〈北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國學研究》, 6期，頁27-86。
2001 〈粟特祆教美術東傳過程中的轉化——從粟特到中國〉, 收入巫鴻主編,《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互動與交融》, 北京：文物出版社，頁51-72。
2001 〈隋及唐初并州的薩保府與粟特聚落〉,《文物》, 4期，頁84-89。
2003 〈Miho美術館粟特石棺屏風的圖像及其組合〉,《藝術史研究》, 4輯，頁199-221。
2014 《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修訂版）》,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4 《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4 〈海外回歸的兩件粟特彩繪浮雕石牀前檔圖像〉,《故宮博物院院刊》, 1期，頁21-29。
Rong, Xinjiang
1999 "Beichao Sui Tang Suteren zhi qianxi ji qi juluo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s of the Sogdians During the Northern Dynasties, Sui, and Tang)," *Studies in Sinology*, no. 6, pp. 27-86.
2001 "Sute Xianjiao meishu dongchuan guocheng zhong de zhuanhua: cong Sute dao Zhongguo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gdian Zoroastrian Art Spreading to the East: From Sogdia to China)," in Wu Hung ed., *Between Han and Tang: Cultural and Artistic Interaction in a Transformative Period*,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pp. 51-72.
2001 "The Sabao Office and the Sogdian Settlement in Bingzhou in the Sui and Early Tang," *Cultural Relics*, no. 4, pp. 84-89.
2003 "The Illustrative Sequence of the Scree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anels of the Miho Couch," *The Study of Art History*, no. 4, pp. 199-221.
2014 *Medieval China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14 *Medieval China and Sogdian Cultur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4 "On Two Color-painted Gilt Bas-relief Stone-Bed Front-Panels Repatriated from Overseas,"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1, pp. 21-29.

榮新江、羅豐主編

2016 《粟特人在中國：考古發現與出土文獻的新印證》，上下冊，北京：科學出版社。

Rong, Xinjiang, and Feng Luo eds.

2016 *Sogdians in China: New Evidence in Archaeological Finds and Unearthed Texts*, vol. 1, 2, Beijing: The Science Press.

齊香鈞

2014 〈北朝至隋墓葬出土石堂再研究〉,《安陽師範學院學報》，6期，頁68-73。

Qi, Xiangjun

2014 "Beichao zhi Sui muzang chutu shitang zai yanjiu (Further Investigation on the Unearthed Stone Burial Chambers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o Sui)," *Journal of 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o. 6, pp. 68-73.

鄭岩

2001 〈青州北齊畫像石與入華粟特人美術—虞弘墓等考古新發現的啟示〉，收入巫鴻主編,《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互動與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頁73-109。

2016 《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增訂版）》，北京：文物出版社。

Zheng, Yan

2001 "Qingzhou Beiqi huaxiangshi yu ruhua Suteren meishu: Yu Hong mu deng kaogu xin faxian de qishi (Northern Qi Stone Relief in Qingzhou and the Sogdian Art in China: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as the Tomb of Yu Hong)," in Wu Hung ed., *Between Han and Tang: Cultural and Artistic Interaction in a Transformative Period*,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pp. 73-109.

2016 *Wei Jin Nanbeichao bihuamu yanjiu* (Study on Wall Paintings in Tombs from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劉瑋琦

2013 〈試論東魏北齊時期官方樣式——鄴城與晉陽隨葬俑的特徵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1卷1期，頁1-62。

Liu Wei-chi

2013 "The Study of Official Style During the Period of Eastern Wei-Northern Qi,"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31, no. 1, pp. 1-62.

劉建華

1992 〈北齊趙郡王高睿造像及相關文物遺存〉,《文物》，8期，頁66-77。

Liu, Jianhua

1992 "Beiqi Zhao junwang Gao Rui zaoxiang ji xiangguan wenwu yicun (The Sculptures b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Commandery Prince of Zhao Gao Rui of the Northern Qi and the Related Relics),” *Cultural Relics*, no. 8, pp. 66-77.

黎毓馨

2014 〈隋代初建、晚唐改造、北宋沿用的定州静志寺塔地宫〉，收入浙江省博物館、定州市博物館編，《心放俗外—定州静志、淨眾佛塔地宫文物》，北京：中國書店，頁8-23。

Li, Yuxin

2014 “Suidai chujian, Wan Tang gaizao, Beisong Yanyong de Dingzhou Jingzhisi ta digong (Underground Chambers of the Jingzhi Pagoda in Dingzhou: Chambers Initially Built in the Early Sui Dynasty, Renovated in the Late Tang, and Continued to Be Used in the Northern Song),” in Zhejiang Provincial Museum, and Dingzhou Museum eds., *Xin fang su wai: Zingzhou Jingzhi, Jingzhong fota digong wenwu* (Away from the Secular—Artifacts from the Hypogeums of Jingzhi and Jingzhong Pagodas in Dingzhou), Beijing: China Books, pp. 8-23.

齊東方

2006 〈虞弘墓人獸搏鬥圖像及其文化屬性〉，《文物》，8期，頁78-84。

Qi, Dongfang

2006 “Yu Hong mu renshou bodou tuxiang ji qi wenhua shuxing (The Picture of Human Animal Battle in the Tomb of Yu Hong and Its Cultural Attributes),” *Cultural Relics*, no. 8, pp. 78-84.

劉健明

1999 《隋代政治與對外政策》，臺北：文津出版社。

Liu, Jianming

1999 *Suidai zhengzhi yu duiwai zhengce* (The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of the Sui Dynasty), Taipei: Wenchin Publishing Co., Ltd.

龍門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編

1987 《中國石窟 龍門石窟》，一，東京：平凡社。

Longmen wenwu baoguansuo (The Longmen Cultural Relics Conservation Center), and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eds.

1987 *Zhongguo shiku: Longmen shiku* (The Grotto Art of China: The Longmen Grottoes), vol. 1, Tokyo: Heibonsha.

濟南市考古研究所

2005 〈濟南隋代呂道貴兄弟墓〉，《文物》，1期，頁29-32。

Jinan Shi kaogu yanjiusuo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Jinan)

2005 “Jinan Suidai Lu Daogui xiongdi mu (Lu Daogui Brothers Tomb of the Sui Dynasty in Jinan),”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29-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謝明良
2010 〈中國早期鉛釉陶器〉，收入顏娟英主編，《中國史新論 美術考古分冊》，臺北：中研院、聯經，頁55-142。
2013 〈鸚鵡杯及其他〉，《故宮文物月刊》，358期，頁64-77。
2014 《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從戰國到唐代》，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5 《陶瓷手記3 陶瓷史的地平與想像》，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Hsien, Ming-liang
2010 "Zhongguo zaoqi qianyou taoqi (The Early Chinese Lead-Glazed Pottery)," in Yen Chuan-ying ed.,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ese History*, Taipei: Academia Sinica, Linking Books.
2013 "Yingwu bei ji qita (The Parrot Cup and Other Artifacts),"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of Monthly of Chinese Art*, no. 358, pp. 64-77.
2014 *Zhongguo gudai qianyoutao de shijie: cong zhanguo dao tangdai* (The World of Ancient Chinese Lead-Glazed Pottery: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to the Tang Dynasty), Taipei: Rock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2015 *Taoci shouji 3: Taocishi de diping yu xiangxiang* (Notes on Ceramics 3: The Horizons and Imaginations of the Ceramics History), Taipei: Rock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濱口重國著；林靜薇譯
2017 〈東魏的兵制〉，《早期中國史研究》，9卷1期，頁127-168。
Hamaguchi, Shigekuni; Lin, Ching-wei trans.
2017 "The Military System of Eastern Wei," *Early and Medieval Chinese History*, vol. 1, no. 1, pp. 127-168.
羅新
2007 〈虞弘墓誌所見的柔然官職〉，《北大史學》，12輯，頁50-73。
2009 《中古北族名號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Lou, Xin
2007 "Yu Hong muzhi suojian de Rouran guanzhi (The Rouran Official Positions Revealed in the Epitaph of Yu Hong)," *Clio at Beida*, no. 12, pp. 50-73.
2009 *Studies on the Titulary Medieval Inner Asian People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羅新、葉煒
2016 《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
Lou, Xin and Wei Ye
2016 *Xinchu Wei Jin Nanbeichao muzhi shuzheng* (New Annotations of the Epitaphs in the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s), revised editio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羅豐
2002 〈一件關於柔然民族的重要史料—隋《虞弘墓誌》考〉，《文物》，6期，頁78-83、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4 《胡漢之間—“絲綢之路”與西北歷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

Luo, Feng

2002 “Yi jian guanyu Rouran minzu de zhongyao shiliao: Sui ‘Yu Hong muzhi’ kao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Source Related to the Rouran People: The Study of Sui “Yu Hong’s Epitaph”),” *Cultural Relics*, no. 6, pp. 78-83, 93.

2004 *Between Han and Non-Han: The Silk Road and Historical Archaeology of China’s Northwestern Regions*,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小林仁

2000 〈隋俑考〉，收入清水真澄編，《美術史論叢・造形と文化》，東京：雄山閣，頁345-364。

2008 〈中国北齊時代の俑にみる二大様式の成立とその意義〉，《佛教藝術》，297號，頁48-70。

2015 《中国南北朝隋唐陶俑の研究》，京都：思文閣出版。

Kobayashi, Hitoshi

2000 “Zui yong kō (Study of Sui Dynasty Tomb Figurines),” in Mazumi Shimizumi, *Bijutsushi ronsō: Zōkei to bunka* (Anthology of Art History: Forms and Cultures), Tokyo: Yuzankaku, pp. 345-364.

2008 “Establishment and Significance of Two Great Trends in Clay Figurines of Northern Chi Dynasty in China: Ye and Jinyang,” *Ars Buddhica*, no. 297, pp. 48-70.

2015 *Chūgoku Nanbokuchō Zui Tō tōyō no kenkyū* (Research on Ceramic Figurines from the Period of Sui-Tang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Kyoto: Shibunkaku.

山下将司

2004 〈新出土史料より見た北朝末・唐初間ソグド人の存在形態—固原出土史氏墓誌を中心に〉，《唐代史研究》，7期，頁60-77。

2011 〈北朝時代後期における長安政権とソグド人—西安出土「北周・康業墓誌」の考察—〉，收入森安孝夫，《ソグドからウイグルへ—シルクロード東部の民族と文化の交流—》，東京：汲古書院，頁113-140。

2020 〈漢文墓誌より描く六世紀華北分裂期のソグド人〉，《日本女子大学紀要・文学部》，69號，頁41-54。

Yamashita, Shoji

2004 “Shin shutsudo shiryō yori mita Hokuchō matsu, Tō shokan Sogudojin no sonzai keitai: Kogen shutsudo Shishi boshi o chūshin ni (The Existence of Sogdians in the Newly Discovered Historical Source from Late Northern Dynasties to Early Tang Period: A Focus on the Epitaph of the Shi Family Excavated in Guyuan),” *The Journal of Tang Historical Studies: The Tōdaishi-kenkyū*, no. 7, pp. 60-77.

2011 “Hokuchō jidai kōki ni okeru Chōan seiken to Sogudojin: Seian shutsudo ‘Hokushū, Kō Gyō boshi’ no kōsatsu (The Changan Regime and Sogdians in the Late Norther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ynasties: A Investigation of the Epitaph of Kang Ye from the Northern Zhou Period),” in Takao Moriyasu, *Sogudo kara Uiguru e: Shiruku rōdo tōbu no minzoku to bunka no kōryū* (From Sogdians to the Uighurs: Ethn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Along the Silk Road), Tokyo: Kyuko shoin, pp. 113-140.

2020 “Sogdians During the Period of Division in North China in the Sixth Century as Depicted in Chinese-Language Epitaphs,” *Journal. Faculty of Humanities*, no. 69, pp. 41-54.

大島幸代、萬納恵介

2014 〈隋仁寿舎利塔研究序説〉，收入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東洋美術史肥田路美編集，《美術史料として読む『集神州三宝感通錄』—釈読と研究—（五）～（七）》，東京：株式会社スマッシュ，頁11-31。

Oshima, Sachiyo and Keisuke Manno

2014 “Zui Jinju sharitō kenkyu josetsu (A Research Introduction on Sui Emperor Wen’s Pagoda for Sacred Relics),” in Art Histor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aseda University (Romi Hida) ed., *Bijutsu shiryō toshite yomu ‘Shū Jinshū Sanpō kantsūroku’: Shakudoku to kenkyū* (Reading “Record of Miracles” as an Art History Source: The Interpretation and Research (Part 5-7)): vols. 5-7, Tokyo: Smash Corporation, pp. 11-31.

山崎宏

1942 〈隋の高祖文帝の佛教治國策〉，《支那中世佛教の展開》，東京：清水書店，頁274-354。

Yamazaki, Hiroshi

1942 “Zui no Kōso Buntei no Bukkyō chikokusaku (Sui Emperor Wen’s Adoption of Buddhism as the State Governance),” *Shina chūsei bukkyō no tenkai*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Medieval China), Tokyo: Shimizu shoten, pp. 274-354.

小杉一雄

1980 《中国仏教美術史の研究》，東京：新樹社。

Kosugi, Kazuo

1980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the Buddhistic Art in China*, Tokyo: Shinjusha.

水野清一

1950 〈雲岡石窟における二三の因縁像〉，收入羽田博士還曆記念會編，《東洋史論叢 羽田博士頌壽紀念》，京都：東洋史研究會，頁867-873。

1968 《中國の佛教美術》，東京：平凡社。

Mizuno, Seiichi

1950 “Unkō sekkutsu ni okeru ni san no innen-zō (Some Figures Representing the Life of Buddha in the Cave-Temples of Yun-kang),” in Haneda hakushi kanreki kinenkai (The Commemorative Society in Honour of Dr. Tōru Haneda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ixtieth Birthday) ed., *Asiatic Studies: In Honour of Tôru Haneda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ixtieth Birthday May 15, MCMXLII*, Kyoto: The Society of Oriental Researches, pp. 867-873.

1968 *Chūgoku no bukkyō bijutsu* (Buddhist Art in China), Tokyo: Heibonsh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

1954 《雲岡石窟：西暦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查報告》，第十二卷 圖版第二部 第十八洞，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55 《雲岡石窟：西暦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查報告》，第三卷第六洞本文，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Mizuno, Seiichi, and Toshio Nagahiro

1954 *Yun-Kang: The Buddhist Cave-Temples of the Fifth Century A.D. in North China: Detailes Report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Carried out by the Mission of the Tōhōbunka Kenkyūsho 1938-45*, vol. 12, plate part 2, cave 18, Kyoto: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1955 *Yun-Kang: The Buddhist Cave-Temples of the Fifth Century A.D. in North China: Detailes Report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Carried out by the Mission of the Tōhōbunka Kenkyūsho 1938-45*, vol. 3, cave 6, Kyoto: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平田陽一郎

2009 〈周隋革命と突厥情勢——北周千金公主の降嫁を中心に——〉，《唐代史研究》，12期，頁27-56。

2021 《隋唐帝国形成期における軍事と外交》，東京：汲古書院。

Hirata, Yoichiro

2009 "The Beizhou and the Sui Revolution Seen from the Situation of the Tujue: Concerning Qianjingongzhu's Marriage to the Tujue," *The Journal of Tang Historical Studies: The Tōdaishi-kenkyū*, no. 12, pp. 27-56.

2021 *Military and Diplomacy During the Formative Period of the Sui and Tang Empires*, Tokyo: Kyuko shoin.

石見清裕

2011 〈ソグド人漢文墓誌訳注（8）太原出土「虞弘墓誌」（隋・開皇十二年）〉，《史滴》，33號，頁205-237。

Iwami, Kiyohiro

2011 "Sogdian Epitaphs Written in Chinese, (8) the Epitaph of Yu Hong (虞弘) During the Sui (隋) Period," *The Shiteki*, no. 33, pp. 205-237.

石見清裕編

2016 《ソグド人墓誌研究》，東京：汲古書院。

Iwami, Kiyohiro ed.

2016 *Research on Sogdian Epitaphs*, Tokyo: Kyuko shoin.

矢島律子

2010 〈北朝の白いやきもの〉，收入常盤山文庫中国陶磁研究会編集，《常盤山文庫中国陶磁研究会 会報3 北斉の陶磁》，東京：財団法人常盤山文庫，頁27-4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Yajima, Ritsuko
2010 “Hokuchō no shiroi yakimono (On White Porcelain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n Chūgoku tōji kenkyū-kai (Research Society of Chinese Ceramics) of Tokiwayama Bunko Foundation ed., *Northern Qi Ceramics*, Tokyo: Tokiwayama Bunko Foundation, pp. 27-40.

吉開将人
1998 〈秦漢の玉器—礼玉のゆくえ〉，收入曽布川寛、谷豊信編集，《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2 秦・漢》，東京：小学館，頁245-249。

Yoshikai, Masato
1998 “Shin Kan no gyokuki: reigroku no yukue (Jade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 Evolution of Ritual Jade),” in Hiroshi Sofukawa and Toyonobu Tani eds., *New History of World Art, Tōyō hen (Eastern Series)*, vol. 2, Qin and Han Dynasties, Tokyo: Shogakukan, pp. 245-249.

ボリスI.マルシャク；稲垣肇訳
2004 〈MIHO MUSEUMの棺床屏風と6世紀後半の中国・ソグド芸術〉，《Miho Museum研究紀要》，4號，頁32-42。

Marshak, Boris I.; Inagaki, Hajime trans.
2004 “Miho Museum no kanshō byōbu to 6 seiki kōhan no Chūgoku Sogudo geijutsu (The MIHO Museum Relief Carvings of Funerary Couch and Sogdian Art in China from the Late 6th Century),” *Bulletin of Miho Museum*, no. 4, pp. 32-42.

吉田豊、影山悦子
2002 〈ソグド人—典籍を補う最新の出土資料〉，《月刊しにか》，9號，頁44-49。

Yoshida, Yutaka, and Etsuko Kageyama
2002 “Sogudojin: tenseki o oginau saishin no shutsudo shiryō (Sogdians: The Newly Excavated Material as Supplements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Sinica*, no. 9, pp. 44-49.

牧田諦亮
1964 〈寶山寺靈裕について〉，《東方學報》，36冊，頁261-286。
1966 〈高王観世音経の成立—北朝仏教の一断面〉，《仏教史学》，12巻3號，頁1-15。

Makita, Tairyo
1964 “Hōzan-ji Reiyū ni tsuite (Monk Lingyu and the Temple at Baoshan),” *The Tōhō Gakuhō: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no. 36, pp. 261-286.
1966 “Kōō kanzeon-kei no seiritsu: Hokuchō bukkyō no ichi danmen (Formation of the High King Avalokitesvara Sutra: One Aspect of Northern Dynasties Buddhism),” *The Bukkyo Shigaku (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vol. 12, no. 3, pp. 1-15.

谷川道雄
1998 〈西魏二十四軍の成立と豪族社会〉，收入氏著，《増補 隋唐帝国形成史論》，東京：筑摩書房，頁430-4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anigawa, Michio
1998 “Er-shi-si Jun 二十四軍 (the Twenty-four Divisions) of the Western Wei and Powerful Families,” in Michio Tanigawa, *Zui Tō teikoku keisei shiron* (Supplementary Studie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Sui and Tang Empire), Tokyo: Chikuma shobo, pp. 430-450
村元健一
2000 〈北魏永固陵の造營〉,《古代文化》, 52卷2號，頁18-28。
2016 《漢魏晉南北朝時代の都城と陵墓の研究》, 東京：汲古書院。
Muramoto, Ken’ichi
2000 “Hokugi Eikoryō no zōei (Construction of the Northern Wei Yonggu Mausoleum),” *Cultura Antiqua*, vol. 52, no. 2, pp. 18-28.
2016 *Kangishinnanbokuchō jidai no tojō to ryōbo no kenkyū* (Research on the Capitals and Tombs of the Han and Six Dynasties Periods), Tokyo: Kyuko shoin.
岡村秀典、向井佑介
2007 〈北魏方山永固陵の研究：東亞考古學會一九三九年收集品を中心として〉,《東方學報》, 80冊，頁69-150。
Okamura, Hidenori, and Yusuke Mukai
2007 “A Study of the Northern Wei Mausolea at Fangshan 方山: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Artifacts Collected by the Mission of the Far Eastern Archaeological Society 東亞考古學會 in 1939,” *The Tōhō Gakuhō: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no. 80, pp. 69-150.
松原三郎
1966 〈北齊の定縣樣式白玉像——特に半跏思惟像について〉, 收入氏著 ,《增訂中國佛教彫刻史研究：特に金銅仏及び石窟造像以外の石仏に就いての論考》, 東京：吉川弘文館，頁129-148。
1995 〈東魏・北齊の河北派白玉像——特に半跏思惟像について〉, 收入氏著 ,《中國佛教彫刻史論 本文編》, 東京：吉川弘文館，頁107-123。
Matsubara, Saburou
1966 “Hokusei no Teiken yōshiki hakugyoku-zō: Tokuni Hankashii-zō ni tsuite (White Jade Sculptures of Northern Qi Period in Ding County with a Focus on the Sculptures in Half-Lotus Sitting and Thinking Position),” in Saburou Matsubara,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A Study on Bronze and Stone Statues Other than Works from Cave Temples*, Tokyo: Yoshikawa kōbunkan, pp. 129-148.
1995 “Tōgi, Hokusei no Kahokuha hakugyoku-zō: Tokuni Hankashii-zō ni tsuite (White Jade Sculptures of Eastern Wei and Northern Qi Period Evolved in Hebei with a Focus on the Sculptures in Half-Lotus Sitting and Thinking Position),” in Saburou Matsubara, *Chūgoku Bukkyō chōkoku shiron: Honbun hen*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Main Edition), Tokyo: Yoshikawa kōbunkan, pp. 107-1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林巳奈夫
1969 〈中国古代の祭玉・瑞玉〉,《東方學報》,40冊,頁161-323。
1991 《中國古玉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
Hayashi, Minao
1969 "Chūgoku kodai no saigyoku, zuigyoku (Ritual Jades and Auspicious Jades in Ancient China)," *The Tōhō Gakuhō: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no. 40, pp. 161-323.
1991 *Studies of Ancient Chinese Jades*, Tokyo: Yoshikawa kōbunkan.
長廣敏雄
1984 〈曲陽発見の石仏に就いて〉,收入氏著,《中國美術論集》,東京:講談社,頁231-241。
Nagahiro, Toshio
1984 "Kyokuyō hakken no sekibutsu ni tsuite (The Stone Buddhas Discovered in Quyang)," in Toshio Nagahiro, *Chūgoku bijutsu ronshū* (Collected Essays on Chinese Art), Tokyo: Kodansha, pp. 231-241.
長岡龍作
2021 〈仁寿舎利塔の思想と舎利容器〉,收入氏著,《仏教と造形—信仰から考える美術史》,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頁27-78。
Nagaoka, Ryusaku
2021 "Jinju sharitō no shisō to shari yōki (The Ideology Behind Sui Emperor Wen's Pagoda and Reliquary for Sacred Relics)," in Ryusaku Nagaoka, *Bukkyō to zōkei: Shinkō kara kangaeru bijutsushi* (Buddhism and Form: A Way of Seeing Art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aith), Tokyo: Chuokouron bijyutsu, pp. 27-78.
肥田路美
2023 〈道宣撰『集神州三宝感通録』霊像垂降録の仏像観—僧祐撰「雑図像」と比較して〉,收入曽布川寛、宇佐美文理編,《中国美術史の眺望—中国美術研究会論集》,東京:汲古書院,頁21-40。
Hida, Romi
2023 "Dōsen sen 'Shū Shinshū sanbō kantsūroku' reizō suikōroku no butsuzōkan: Sōyū sen 'Zatsu zu zō' to hikaku shite (Observing the Appearance of Buddha in "Record of Miracles" by Monk Daoxuan: A Comparison with Monk Sengyou's "Miscellaneous Images")," in Hiroshi Sofukawa and Bunri Usami eds., *Chūgoku bijutsushi no chōbō: Chūgoku bijutsu kenkyūkai ronshū* (Chinese Art History Overview: Journal of the Chinese Art Research Society), Tokyo: Kyuko shoin, pp. 21-40.
浜口重国
1936 〈東魏の兵制〉,《東洋学報》,24卷1號,頁35-69。
1966 《秦漢隋唐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amaguchi, Shigekuni
1936 “The Study of the Military System Under the Eastern Wei Dynasty,” *The Toyo Gakuho*, vol. 24, no. 1, pp. 35-69.
1966 *Shin Kan Zui Tō shi no kenkyū*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Qin, Ha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oky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倉本尚德
2016 《北朝仏教造像銘研究》，京都：法藏館。
Kuramoto, Shotoku
2016 *Studies of Inscriptions on Northern Dynasties Buddhist Sculpture*, Kyoto: Hozokan.
徐男英
2017 〈河北出土北朝期白玉像考〉，收入濱田瑞美編，《アジア仏教美術論集：東アジアI：後漢、三国、南北朝》，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頁359-388。
Xu, Nanying
2017 “Kahoku shutsudo Hokuchōki hakugyoku-zō kō (Study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White Jade Sculptures Excavated in Hebei),” in Tamami Hamada ed., *Ajia Bukkyō bijutsu ronshū: Higashi Ajia I: Gokan, Sangoku, Nanbokuchō* (Journal of Asian Buddhist Art: East Asia I: The Late Han, Three Kingdoms,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okyo: Chuokouron bijyutsu, pp. 359-388.
船山徹
1995 〈六朝時代における菩薩戒の受容過程—劉宋・南斉期を中心に—〉，《東方学報》，67號，頁1-135。
Funayama, Toru
1995 “On the Acceptance of the Bodhisattva Precepts During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Liu Song and Nan Qi Periods,” *The Tōhō Gakuhō: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no. 67, pp. 1-135.
亀井明徳
2014 〈北朝・隋における白釉，白瓷碗・杯の追跡〉，收入氏著，《中国陶瓷史の研究》，東京：六一書房，頁90-116。
Kamei, Akinori
2014 “Hokuchō, Zui ni okeru hakuyū, hakujiwan, hai no tsuiseki (Discovering the White Glaze and White Porcelain Bowls and Cup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nd Sui Period),” in Akinori Kamei, *Researches in Chinese Ceramic History*, Tokyo: Roku ichi shobo, pp. 90-116.
森安孝夫
2007 《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國》，東京：講談社。
Moriyasu, Takao
2007 *Shiruku rōdo to Tō teikoku* (The Silk Road and the Tang Empire), Tokyo: Kodansh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菅野博史
1983 〈竺道生における機と感応について〉,《印度学仏教学研究》, 32卷1號，頁261-264。
Kanno, Hiroshi
1983 "Tao-shêng's Interpretation of Innate Capacity and Responsive Communion," *Journal of Indogaku Bukkyōgaku Kenkyū: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 vol. 32, no. 1, pp. 261-264.
曾布川寬
2006 〈中國出土のソグド石刻畫像試論〉, 收入氏編,《中國美術の圖像學》, 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頁97-182。
Sofukawa, Hiroshi
2006 "Chūgoku shutsudo no Sogudo sekkoku gazō shiron (Preliminary Study of Sogdian Stone Engravings Excavated in China)," in Hiroshi Sofukawa, *Chūgoku bijutsu no zuzōgaku* (Iconography in Chinese Art), Kyoto: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Humanities, Kyoto University, pp. 97-182.
曾布川寬、岡田健編
2000 《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 第三卷 三國・南北朝，東京：小学館。
2000 *New History of World Art, Tōyō hen (Eastern Series)*, vol. 3, Three Kingdoms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okyo: Shogakukan.
曾布川寬、吉田豐編
2011 《ソグド人の美術と言語》, 京都：臨川書店。
Sofukawa, Hiroshi and Yutaka Yoshida eds.
2011 *Sogudojin no bijutsu to gengo* (Art and Language of the Sogdians), Kyoto: Rinsen Book Co.
楊伯達著；松原三郎譯
1985 《埋もれた中国石仏の研究：河北省曲陽出土の白玉像と編年銘文》, 東京：東京美術。
Yang, Boda; Matsubara, Saburou trans.
1985 *Umoreta Chūgoku sekibutsu no kenkyū: Kahoku-shō Kyokuyō shutsudo no hakugyoku-zō to hen'nen meibun* (Research on the Buried Chinese Stone Buddhas: The White Jade Sculptures and Dated Inscriptions Excavated in Quyang Hebei), Tokyo: Tokyo Bijutsu Co., Ltd.
奥村伊九良
1939 〈鍍金孝子傳石棺の刻畫に就て〉,《瓜茄》, 1卷5冊，頁359-382。
Okumura, Ikuro
1939 "Mekki kōshiden sekkan no kokuga ni tsuite (Gilt Engraving on Sarcophagi Illustrating Accounts of Filial Offspring)," *Kaka*, vol. 1, no. 5, pp. 359-382.
榮新江著；森部豐譯・解說
2011 〈新出石刻史料から見たソグド人研究の動向〉,《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紀要》, 44號，頁121-1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ong, Xinjiang; Moribe, Yutaka trans.
2011 "Research Trends in the Study of the Sogdians from Newly Found Archaeological Epigraphy," *Annual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Studies at Kansai University*, no. 44, pp. 121-151.
稲垣肇
2009 〈MIHO MUSEUM所蔵中国北朝石榻圍屏門闕の様式淵源と復元試論〉,《國華》, 1363號，頁19-36。
Inagaki, Hajime
2009 "The Source of Style and Reconstruction of Funerary Couch Owned by Miho Museum," *Kokka*, no. 1363, pp. 19-36.
諏訪義純
1988 《中国中世仏教史研究》，東京：大東出版社。
Suwa, Gijun
1988 *Chūgoku chūsei bukkyōshi kenkyū*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Medieval China), Tokyo: Daito Publishing Co., Inc.
影山悦子
2014 〈ソグド人の墓と葬具―中国とソグディアナ〉，收入森部豊，《ソグド人と東ユーラシアの文化交渉》，東京：勉誠出版社，頁61-86。
Kageyama, Etsuko
2014 "Sogudojin no haka to sōgu: Chūgoku to Sogudiana (Sogdian Tombs and Burial Objects: China and Sogdia)," in Yutaka Moribe, *Chūgoku sekkutsu bijutsu no kenkyū* (Sogdians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Eastern Eurasia), Tokyo: Benseisha Publishing Inc., pp. 61-86.
鎌田茂雄
1994 《中国仏教史》，第五卷 隋唐の仏教（上），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Kamata, Shigeo
1994 *Chūgoku bukkyō-shi*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vol. 5, Zui tō no bukkyō (Buddhism in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part 1, Tokyo: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Dhalla, M. N.
1938 *The History of Zoroastrian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Toronto.
Grenet, Frantz, Pénélope Riboud et Yang Junkai
2004 "Zoroastrian Scenes on A Newly Discovered Sogdian Tomb in Xi'an, Northern China," *Studia Iranica*, no. 33, pp. 273-284.
Harper, Prudence O.
1990 "An Iranian Silver Vessel from the Tomb of Feng Hetu,"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o. 4, pp. 51-5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Juliano, Annette L.

2006 "Converging Traditions in the Imagery of Yu Hong's Sarcophagus: Possible Buddhist Sources,"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no. I, pp. 29-49.

2012 *Unearthed: Rece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form Northern China*, Massachusetts: Sterling and Francine Clark Art Institute.

Juliano, A. L. and J. A. Lerner

1997 "Cultural Crossroads: Central Asian and Chinese Entertainers on the Miho Funerary Couch," *Orientations*, vol. 28, no. 9 , pp. 72-78.

2001 "The Miho Couch Revisited in Light of Recent Discoveries", *Orientations*, vol. 32, no. 8, pp. 54-61.

Kageyama, Etsuko

2007 "The Winged Crown and the Triple-crescent Crown in the Sogdian Funerary Monuments from China: Their Relation to the Hephthalite Occupation of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Inner Asian Art and Archaeology*, no. 2, pp. 11-22.

Lerner, Judith A.

2005 "Aspects of Assimilation: The Funerary Practices and Furnishings of Central Asians in China," *Sino-Platonic Papers*, no. 168, pp. 1-73.

Marshak, Boris I.

2004 "The Miho Couch and the Other Sino-Sogdian Works of Art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6th Century," 《Miho Museum研究紀要》，4號，pp. 16-31.

2004 "The Sarcophagus of Sabao Yu Hong, a Head of the Foreign Merchants (592-98)," *Orientations*, vol. 35, no. 7, pp. 57-65.

Miho Museum

1997 《Miho Museum南館圖錄》，滋賀：Miho Museum。

Müller, Shing

2019 "Funerary Beds and Hous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n Shing Müller, Thomas O. Höllmann, Sonja Filip eds., *Early Medieval North China: Archaeological and Textual Evidence* (從考古與文獻看中古早期的中國北方),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pp. 383-474.

Rosenfield, John M.

1967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caglia, Gustina

1958 "Central Asians on a Northern Ch'I Gate Shrine," *Artibus Asiae*, vol. 21, no. 1, pp. 9-28.

Sickman, Laurence and Alexander Soper

1968 *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Watt, James C. Y.

2004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ertmann, Patrick
2015 *Sogdians in China: Archaeological and Art Historical Analyses of Tombs and Texts from the 3rd to the 10th Century AD*, German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Eurasia Department, Beijing Branch Office; Darmstadt: Verlag Philipp von Zaber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12。
圖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13。
圖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23。
圖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19。
圖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37。
圖6a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38。
圖6b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38。
圖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123。
圖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136。
圖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136。
圖1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123。
圖1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98。
圖1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114。
圖1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99。
圖1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101。
圖1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102。
圖1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106。
圖1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110。
圖1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111。
圖1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113。
圖20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73。
圖2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77。
圖2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91。
圖23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編著，楊軍凱著，《北周史君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83。
圖24　曽布川寛、岡田健編，《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第三巻　三國・南北朝(東京：小学館，2000)，頁268。
圖25　曽布川寛、岡田健編，《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第三巻　三國・南北朝，頁269。
圖26　馮賀軍，《曲陽白石造像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105。
圖27　吳強華、趙超編，《翟門生的世界：絲綢之路上的使者》(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頁136。
圖2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唐長安城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9。
圖29　筆者拍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0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北周康業墓發掘簡報〉，《文物》，2008年6期，頁17。
圖31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齊婁叡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29。
圖3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北齊徐顯秀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10期，頁7。
圖3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北齊東安王婁叡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彩版152。
圖34a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太原隋斛律徹墓清理簡報〉，《文物》，1992年10期，頁2。
圖34b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沙溝隋代斛律徹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頁94。
圖3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沙溝隋代斛律徹墓》，頁8。
圖36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北齊高潤墓〉，《考古》，1979年3期，頁241。
圖37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劉俊喜主編，《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彩版61。
圖38　大同市博物館編、王利民主編，《平城文物精粹：大同市博物館館藏精品錄》（南京：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6），頁77。
圖39　筆者拍攝。
圖40　筆者拍攝。
圖4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圖版20。
圖4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圖版20。
圖43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雲波里路北魏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11年12期，頁23。
圖44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M29發掘簡報〉，《文物》，2023年1期，頁44。
圖45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M29發掘簡報〉，頁44。
圖46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M29發掘簡報〉，頁46。
圖47　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西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國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學的調查報告》，第十二卷 圖版第二部 第十八洞（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4），PLATE 103。
圖48　曾布川寬、岡田健編，《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第三卷　三國・南北朝，頁166。
圖49　龍門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編，《中國石窟　龍門石窟》，一（東京：平凡社，1987），圖版209。
圖50　龍門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編，《中國石窟　龍門石窟》，一，圖版220。
圖51　龍門文物保管所、北京大學考古系編，《中國石窟　龍門石窟》，一，圖版158。
圖52　雲岡石窟文物保管所編，《中國石窟 雲岡石窟》，一（東京：平凡社，1989），圖版140。
圖53　筆者拍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圖版20。
圖55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隋代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圖版29。
圖56 James C. Y. Watt,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4), p. 240.
圖57 奥村伊九良，〈鍍金孝子傳石棺の刻畫に就て〉，《瓜茄》，1卷5冊（1939），圖1。
圖58 奥村伊九良，〈鍍金孝子傳石棺の刻畫に就て〉，圖一。
圖59 筆者拍攝。
圖60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晉陽古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圖版67。
圖61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附圖二。
圖62a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隋代虞弘墓》，圖版55。
圖62b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54。
圖6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63。
圖64 Miho Museum，《Miho Museum南館圖錄》（滋賀：Miho Museum，1997），頁249。
圖65a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齊婁叡墓》，圖版90。
圖65b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北齊婁叡墓》，圖版90。
圖6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沙溝隋代斛律徹墓》，圖版18。
圖67 Boris I. Marshak, “The Miho Couch and the Other Sino-Sogdian Works of Art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6th Century,” 《Miho Museum研究紀要》，4號（2004），p. 20.
圖68 James C. Y. Watt, *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 p. 153.
圖69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編著，《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圖版44。
圖70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夫妻合葬墓的發掘〉，《考古學報》，2023年3期，頁399。
圖7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頁133。
圖72a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夫妻合葬墓的發掘〉，圖版11-1。
圖72b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夫妻合葬墓的發掘〉，圖版11-2。
圖73a 濟南市考古研究所，〈濟南隋代呂道貴兄弟墓〉，《文物》，2005年1期，圖版2。
圖73b 濟南市考古研究所，〈濟南隋代呂道貴兄弟墓〉，《文物》，2005年1期，圖版1。
圖7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著，《鄴城北吳莊出土佛教造像》（北京：科學出版社，2019），頁95。
圖75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晉陽古城》，圖版22。
圖76a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2 河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版38。
圖76b 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12 河南》，圖版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77　曾布川寬、岡田健編，《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第三卷　三國・南北朝，頁264。

圖78　曾布川寬、岡田健編，《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第三卷　三國・南北朝，頁265。

圖79　曾布川寬、岡田健編，《世界美術大全集　東洋編》，第三卷　三國・南北朝，頁265。

圖80　筆者拍攝。

圖81　劉建華，〈北齊趙郡王高睿造像及相關文物遺存〉，《文物》，1992年8期，頁68。

圖82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陽隋代麴慶夫妻合葬墓的發掘〉，頁403。

圖83　浙江省博物館、定州市博物館編，《心放俗外—定州靜志、淨眾佛塔地宮文物》（北京：中國書店，2014），頁44。

圖84　浙江省博物館、定州市博物館編，《心放俗外—定州靜志、淨眾佛塔地宮文物》，頁52。

圖85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隋代虞弘墓》，圖版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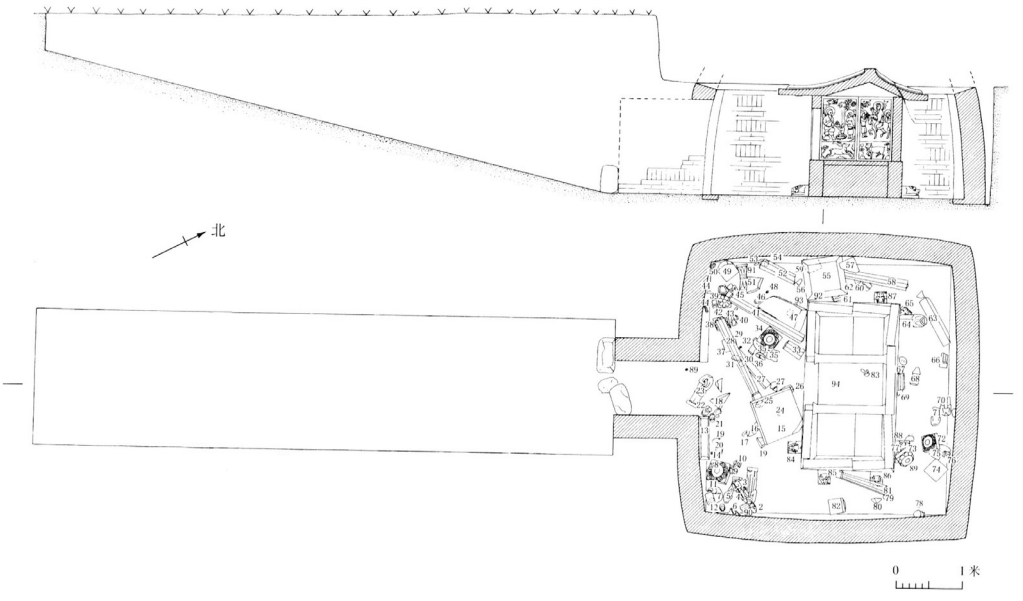


圖1　虞弘墓　平面、剖面圖　隋　山西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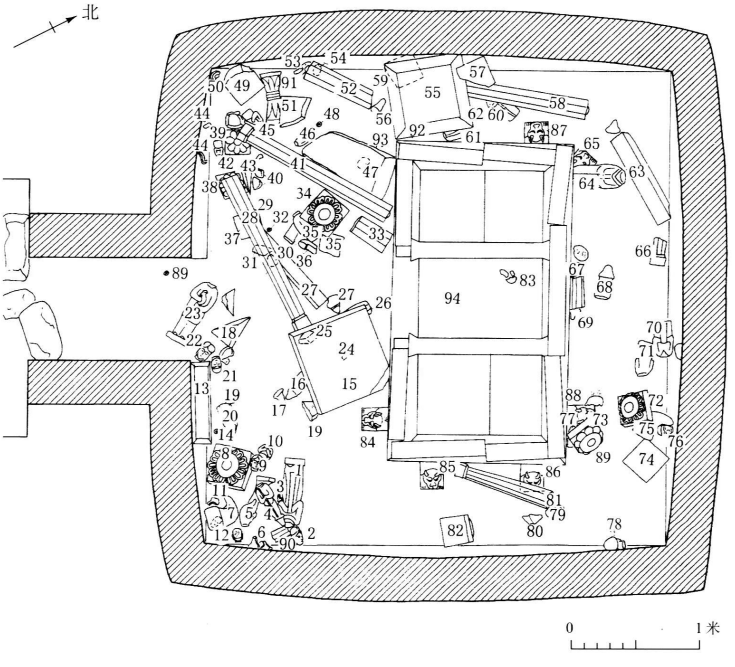


圖2　虞弘墓墓室　平面圖　隋　山西太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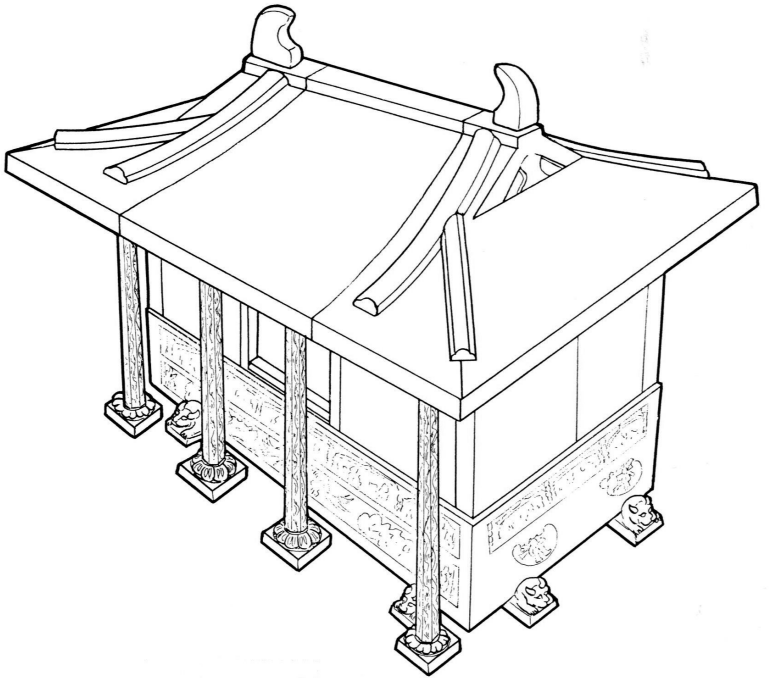


圖3 虞弘墓石槨 復原圖 隋 山西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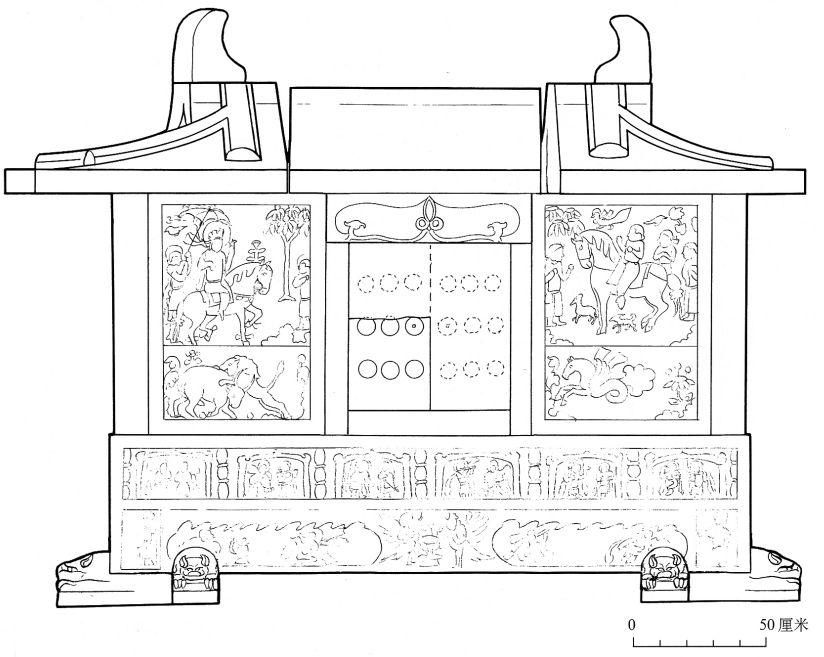


圖4 虞弘墓石槨 正面 線描圖 隋 山西太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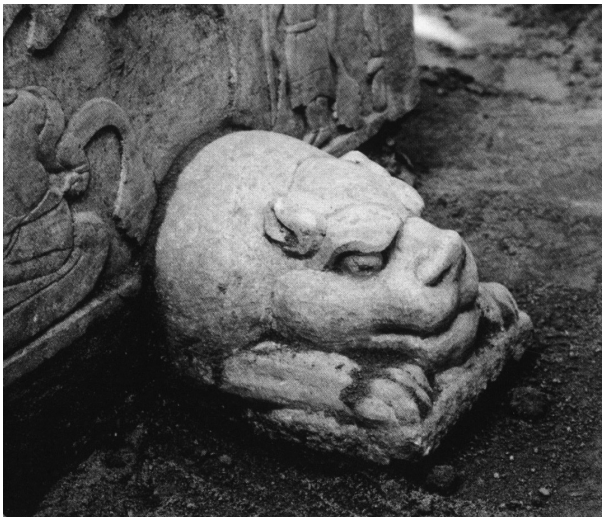


圖5　石獅頭座墊　隋　山西太原　虞弘墓



圖6a　石獅頭座墊　隋　山西太原　虞弘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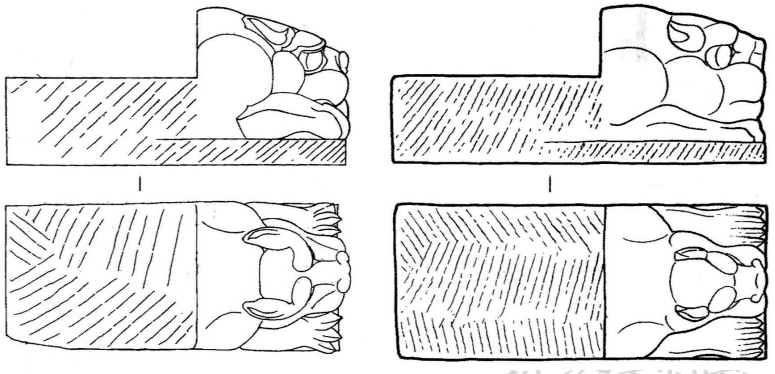


圖6b　石獅頭座墊　線描圖　隋　山西太原　虞弘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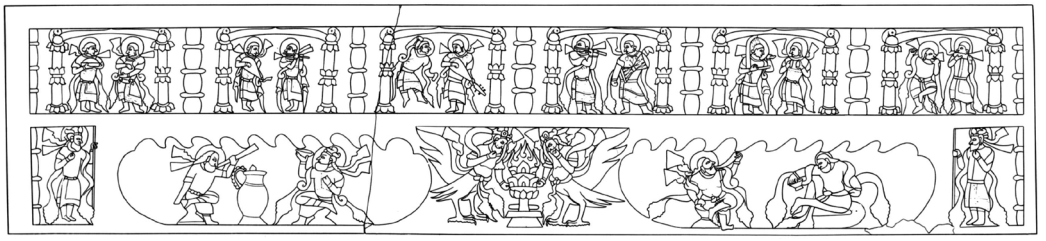


圖7 虞弘墓石槨槨座 正面 線描圖 隋 山西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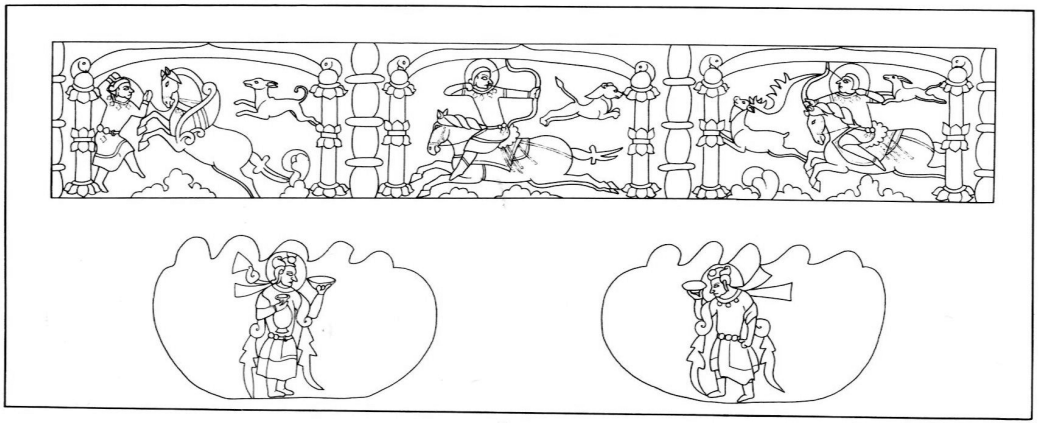


圖8 虞弘墓石槨槨座 西側 線描圖 隋 山西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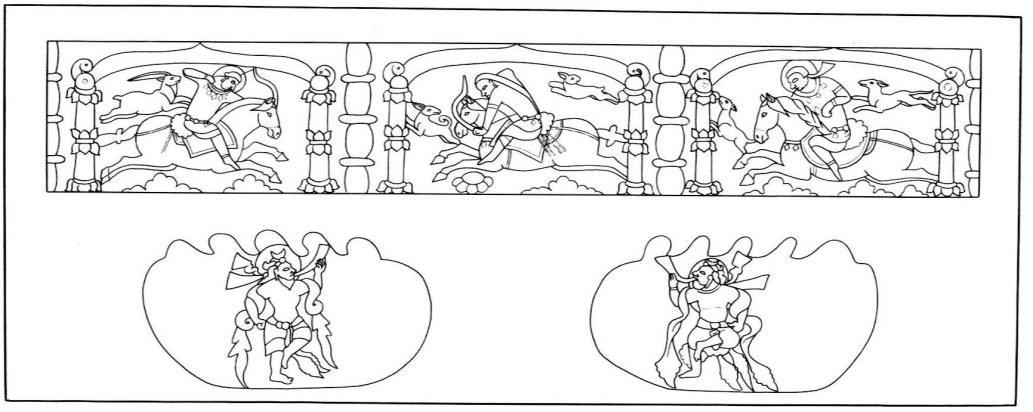


圖9 虞弘墓石槨槨座 東側 線描圖 隋 山西太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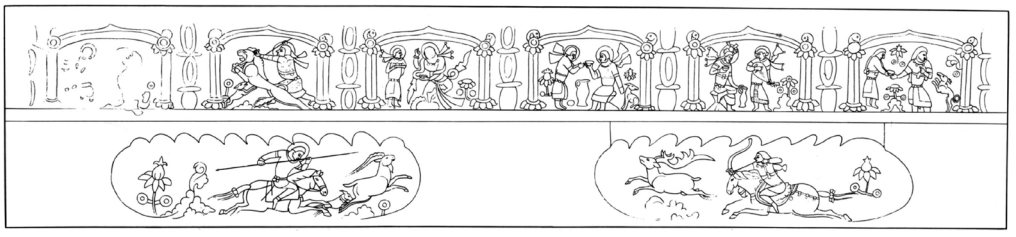


圖10　虞弘墓石槨槨座　背面　線描圖　隋　山西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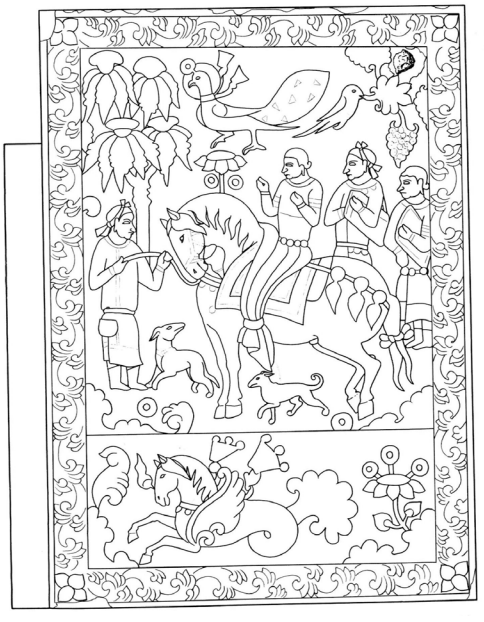


圖11　虞弘墓石槨　正面東側　隋　山西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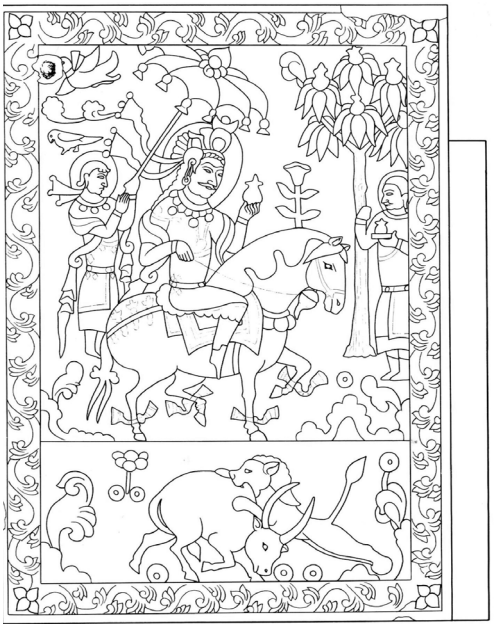


圖12　虞弘墓石槨　正面西側　隋　山西太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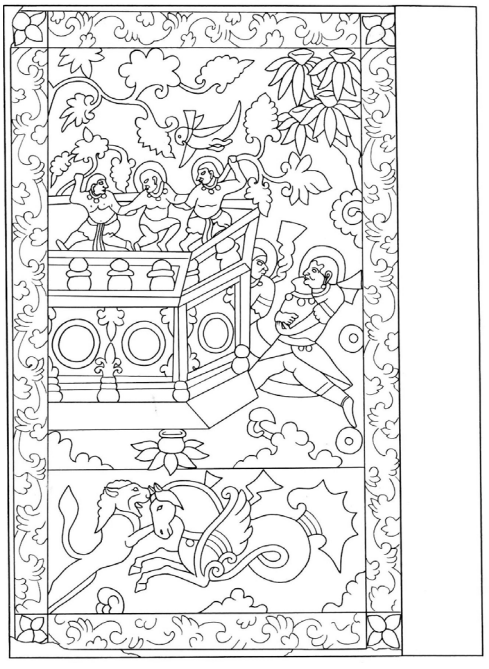


圖13 虞弘墓石槨 內部東壁南側 隋 山西太原



圖14 虞弘墓石槨 內部東壁北側 隋 山西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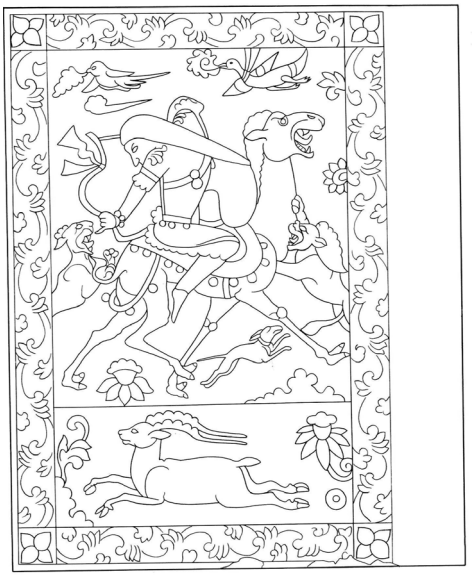


圖15 虞弘墓石槨 內部北壁東側 隋 山西太原



圖16 虞弘墓石槨 內部北壁中央 隋 山西太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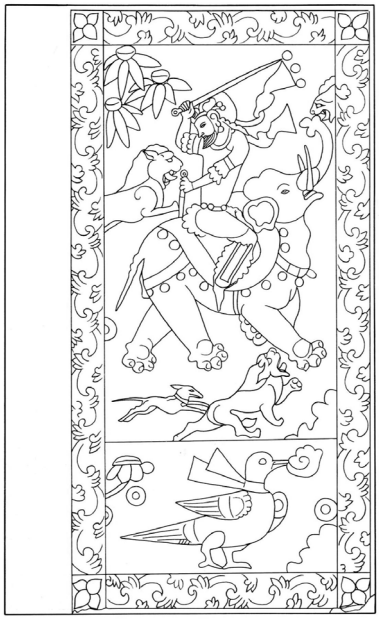


圖17　虞弘墓石槨　內部北壁西側
隋　山西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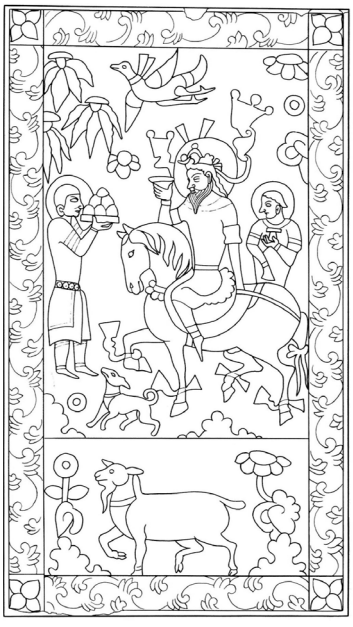


圖18　虞弘墓石槨　內部西壁北側
隋　山西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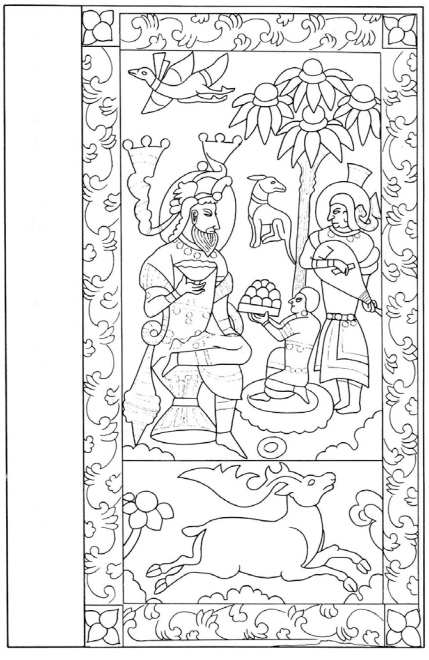


圖19　虞弘墓石槨　內部西壁南側
隋　山西太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0 白玉文吏俑 隋 山西太原虞弘墓



圖21 白玉持笛男俑 隋 山西太原虞弘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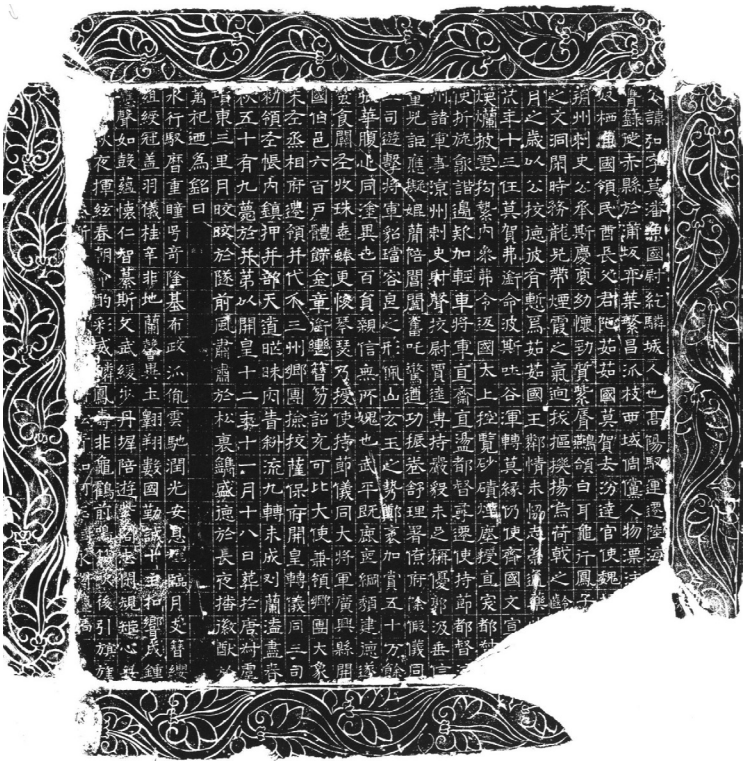


圖22　《虞弘墓誌》拓片　隋　山西太原



圖23　史君墓石堂　北周大象二年（580）　陝西西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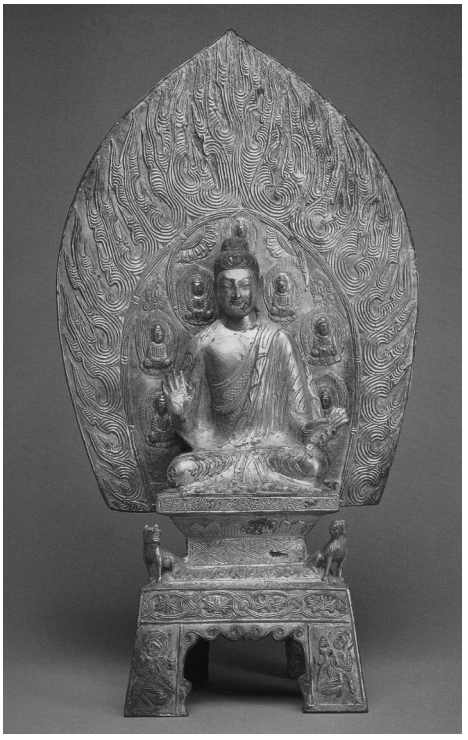


圖24 金銅佛坐像 北魏太和元年（47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5 金銅佛造像 北魏正光五年（524）
大都會博物館藏



圖26 劉氏家族造思惟菩薩白石像 北齊
河北曲陽出土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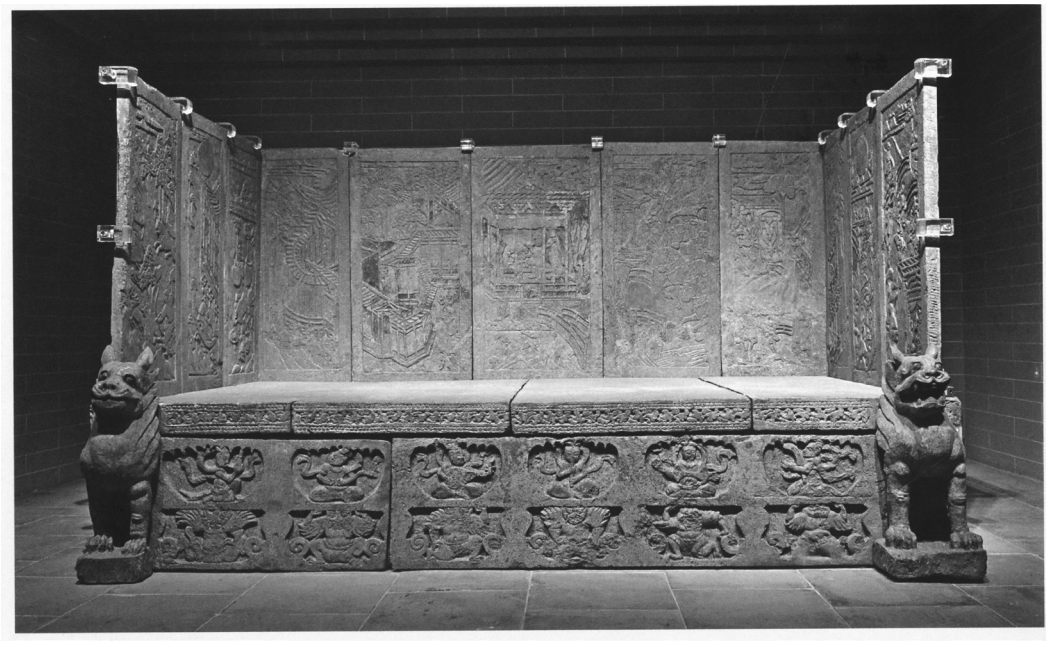


圖27　粟特人圍屏石牀　北周至隋代　甘肅天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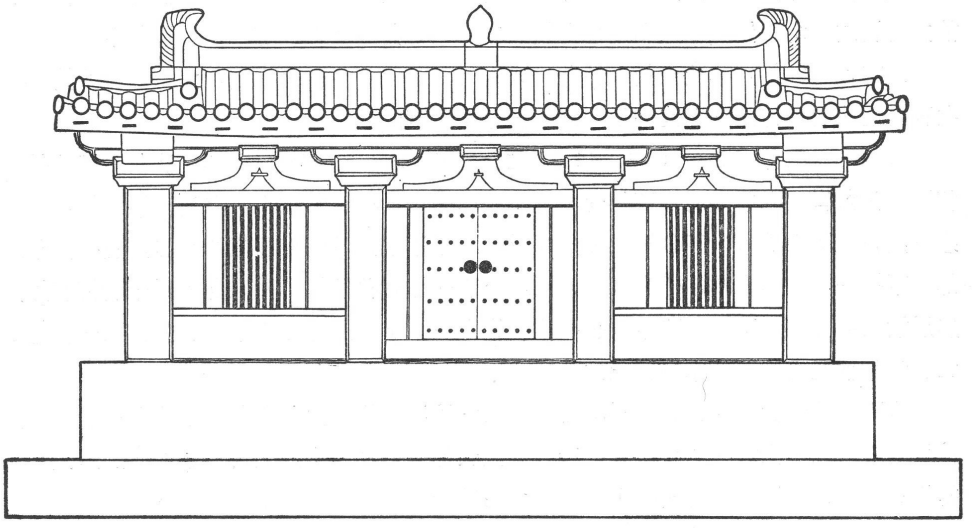


圖28　李靜訓墓石槨　隋大業四年（608）　陝西西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9 粟特白玉石牀 北朝至隋 Shelby White與Leon Levy舊藏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30 康業墓圍屏石牀 北周天和六年（571） 陝西西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1　婁叡墓　墓門　北齊武平元年（570）　山西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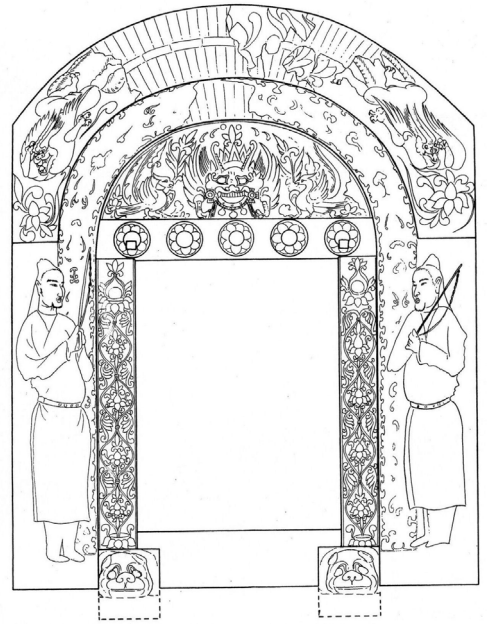


圖32　徐顯秀墓　墓門　線描圖　北齊武平二年（571）　山西太原



圖33　帳座石獅　北齊武平元年（570）　山西太原　婁叡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4a 石獅墩 隋開皇十七年（597） 山西太原 斛律徹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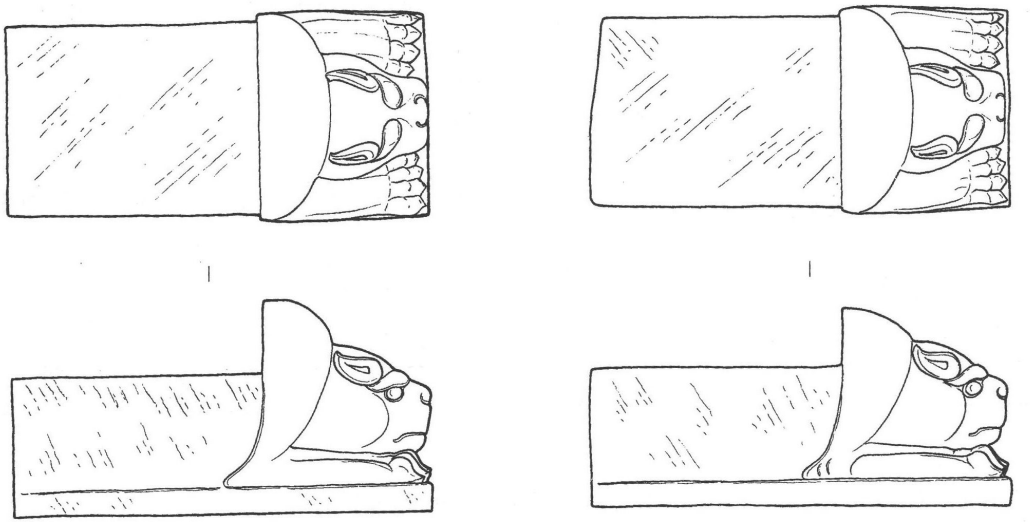


圖34b 斛律徹墓 石獅墩 線描圖 隋開皇十七年（597） 山西太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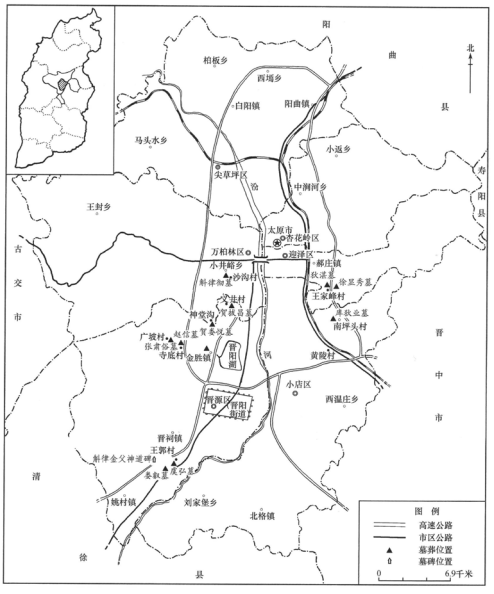


圖35　斛律徹墓、虞弘墓、婁叡墓位置圖



圖36　高潤墓　帳座石獅　北齊武平七年（576）　河北磁縣



圖37　石槨虎頭門枕　北魏太和元年（477）　山西大同　宋紹祖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8 永固陵甬道虎頭門墩 北魏太和八年（484） 山西大同



圖39 石雕武士立俑 北魏太和八年（484） 山西大同 永固陵



圖40 石門構件 北魏 山西大同東信廣場出土 大同市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1　虞弘墓石槨　正面東側　局部　隋　山西太原



圖42　虞弘墓石槨　正面東側　局部　隋　山西太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3 壁畫墓 南壁 力士像 北魏 山西大同雲波里路



圖44 壁畫墓 甬道東壁 武士壁畫 北魏 山西大同七里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45　壁畫墓　甬道東壁　蓮花紋　北魏　山西大同七里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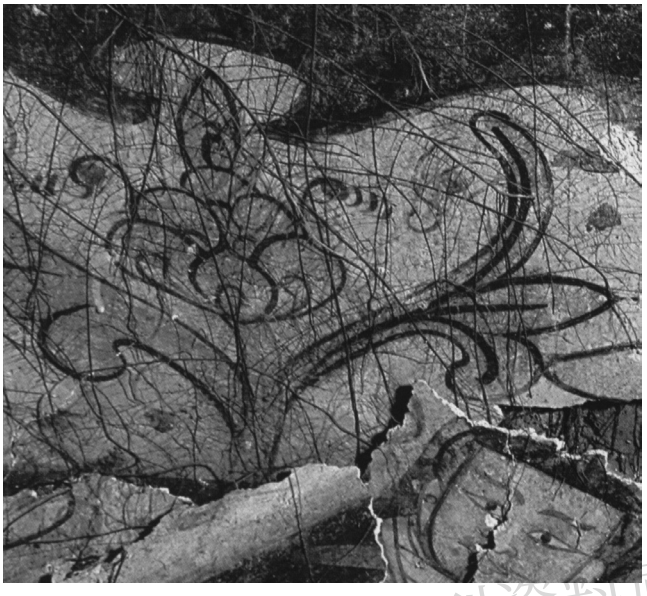


圖46　壁畫墓　北壁　墓主圖像　北魏　山西大同七里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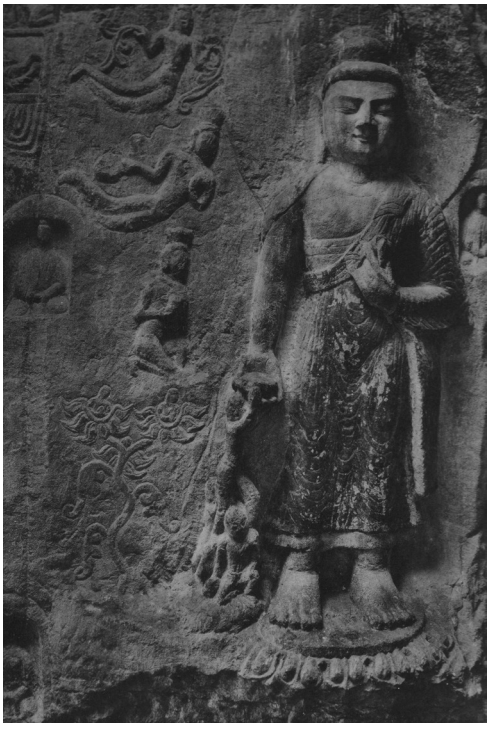


圖47 雲岡石窟第十八窟南壁 中層西側 《阿輸迦施土因緣》 北魏



圖48 《刺繡供養圖》 北魏太和十一年（487） 敦煌文物研究院藏



圖49 龍門石窟 路洞 正壁右側 供養比丘像 北魏晚期至北齊 河南洛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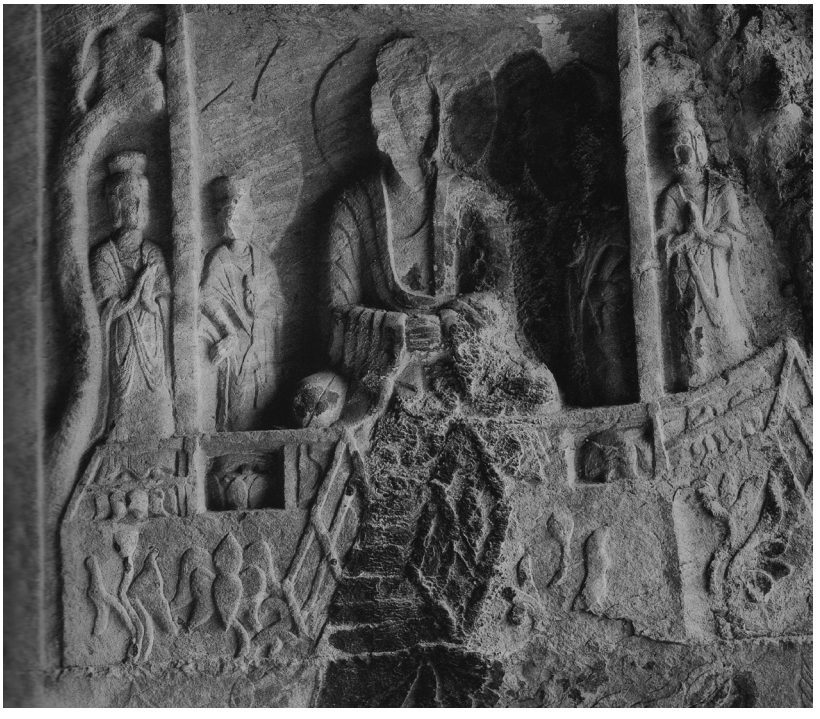


圖50　龍門石窟　路洞　北壁上層東側屋形龕下方　北魏晚期至北齊　河南洛陽



圖51　龍門石窟　古陽洞　北壁第三層第一龕龕楣　北魏　河南洛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2 雲岡石窟第六窟 南壁下層《出家踰城》 北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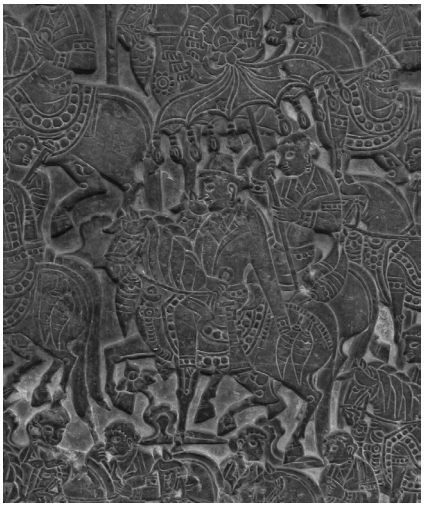


圖53 粟特圍屏 局部 北齊 河南安陽出土 波士頓美術館藏



圖54 虞弘墓石槨座 正面 局部 隋 山西太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5　虞弘墓石槨座　正面　鸚鵡龕　隋　山西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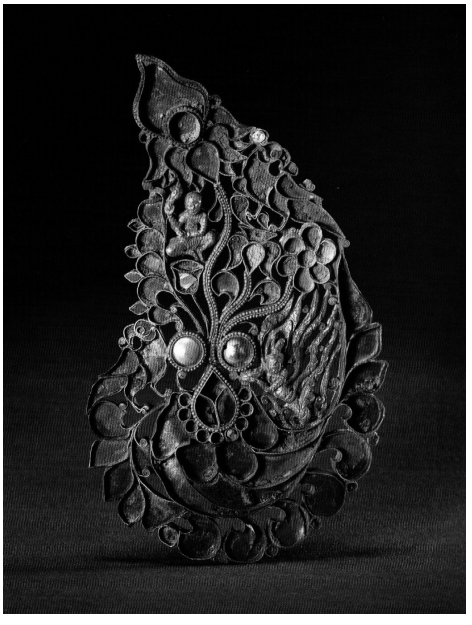


圖56　金飾　東魏武定八年（550）　河北磁縣　茹茹公主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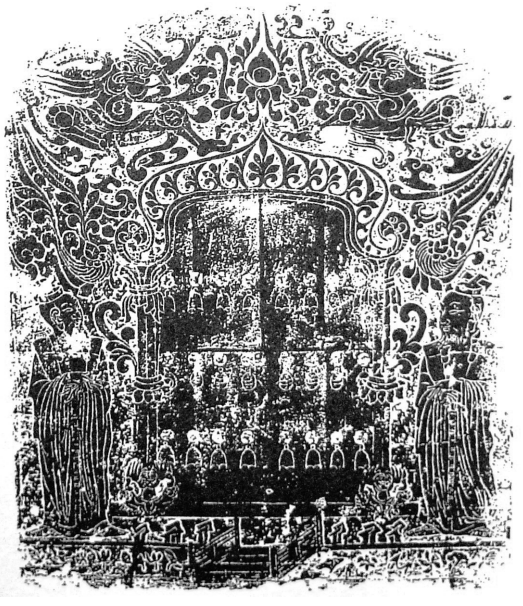


圖57　元謐孝子傳石棺　前檔　拓片　北魏正光五年（524）　明尼亞波里美術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58 元諡孝子傳石棺 左側板 拓片 鸚鵡與鋪首 北魏正光五年（524）



圖59 元諡孝子傳石棺 右側版 鸚鵡與鋪首 北魏正光五年（5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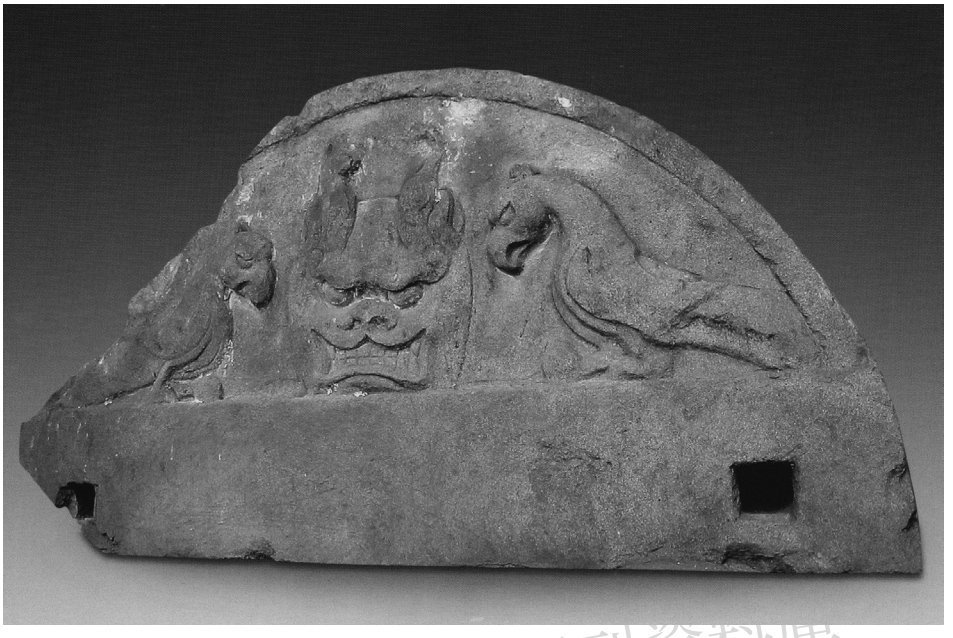


圖60 □憙墓門楣 鸚鵡與獸面 北齊武平三年（572） 山西太原龍堡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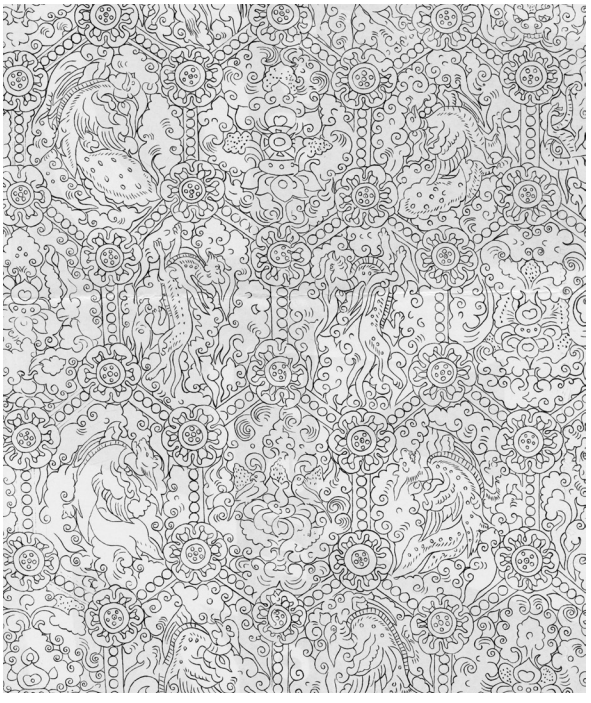


圖61　隋代壁畫墓　石棺棺蓋　線描圖　局部
陝西潼關稅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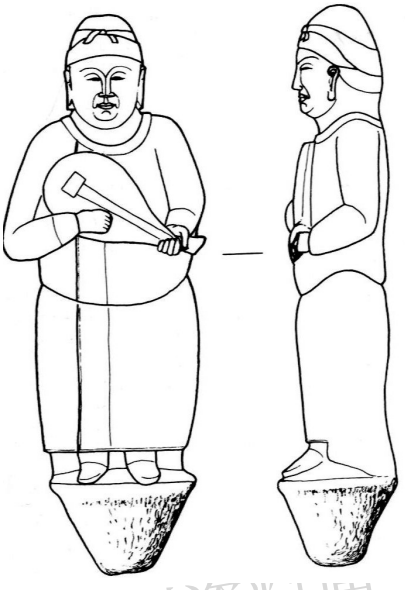


圖62a、b　抱琵琶男俑　隋　山西太原　虞弘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63 抱琵琶女俑 隋
山西太原 虞弘墓



圖64 粟特人白玉圍屏 左側石闕 北朝至隋
Miho博物館藏





圖65a、b 陶戴鮮卑帽武士俑 北齊武平元年（570） 山西太原 婁叡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66　小風帽儀仗立俑　隋開皇十七年（597）　山西太原斛律徹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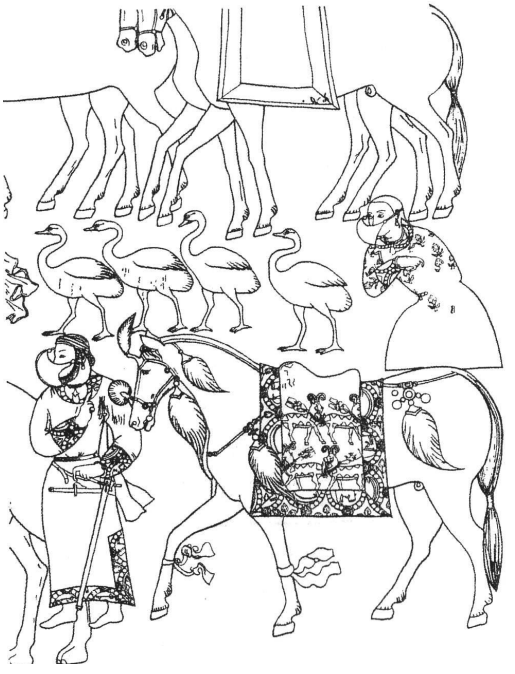


圖67　片治肯特壁畫　鞍馬　六世紀



圖68　薩珊狩獵銀盤　北魏正始元年（504）　山西大同　封和突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69 安伽墓石牀正面右側圍屏 第二幅 北周大象元年（579） 陝西西安 陝西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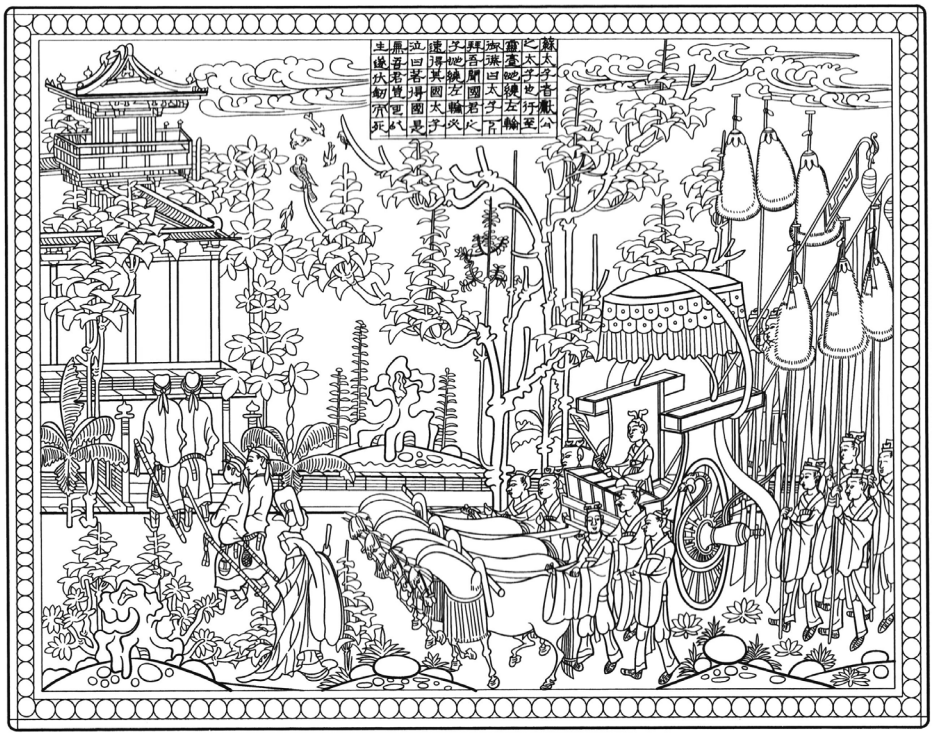


圖70　麴慶夫婦合葬墓　石屏正面　線描圖　隋開皇十年（590）　河南安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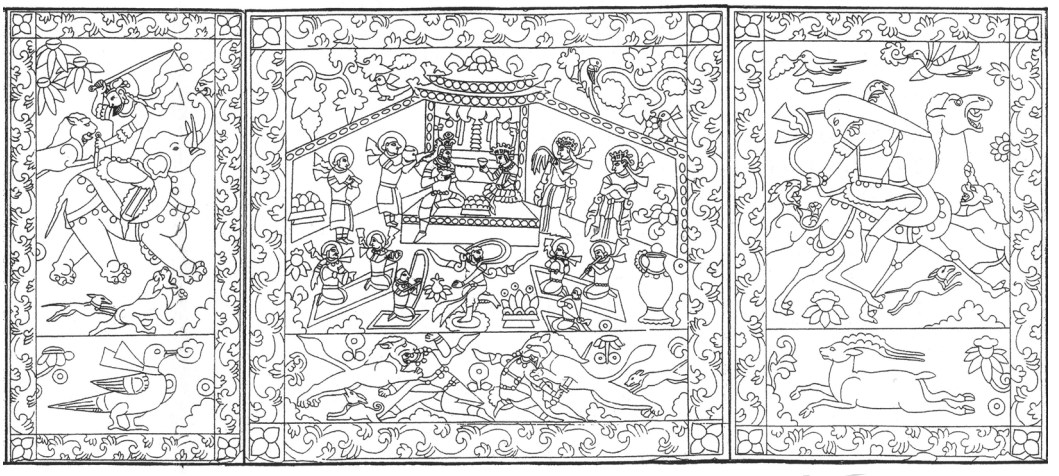


圖71　虞弘墓石槨內部　北壁　線描圖　隋　山西太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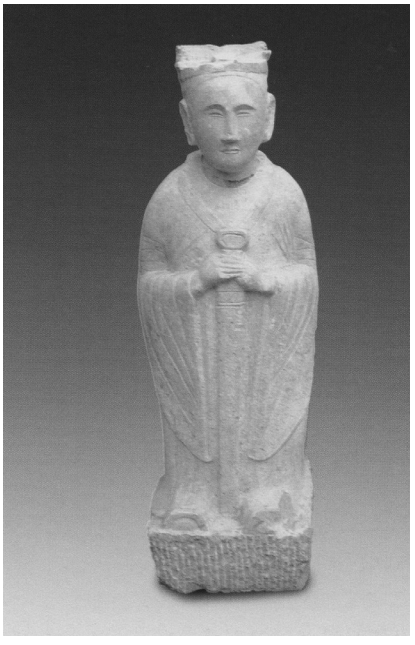


圖72a 白玉持劍武士俑 隋開皇十年（590） 河南安陽 麴慶夫婦合葬墓 甬道東壁



圖72b 白玉持刀武士俑 隋開皇十年（590） 河南安陽 麴慶夫婦合葬墓 甬道西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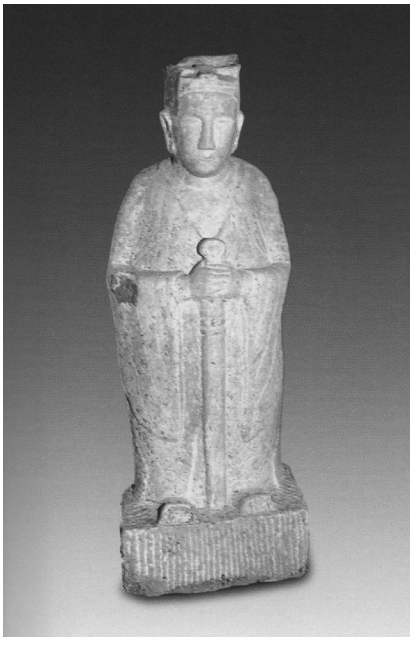


圖73a、b　白玉武士俑　隋開皇十二年（592）　山東濟南　呂道貴夫婦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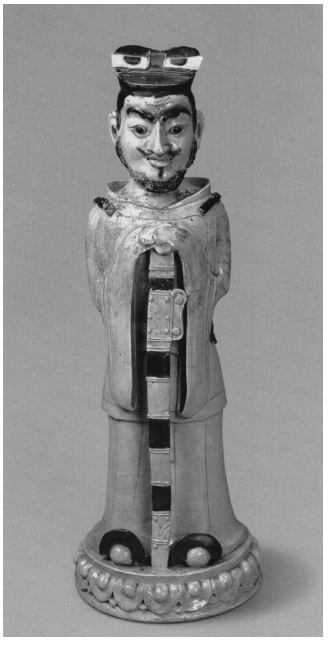


圖74　白玉菩薩像　北齊
鄴城北吳莊



圖75　漢白玉釋迦立像　北齊　山西太原
晉陽故城遺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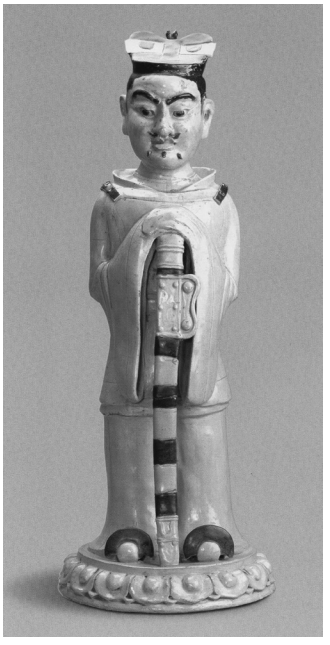


圖76a、b 白釉黑彩侍吏俑 隋 河南安陽 張盛墓 河南博物院藏



圖77 趙郡王高叡造白石釋迦像
北齊天保七年（556）
河北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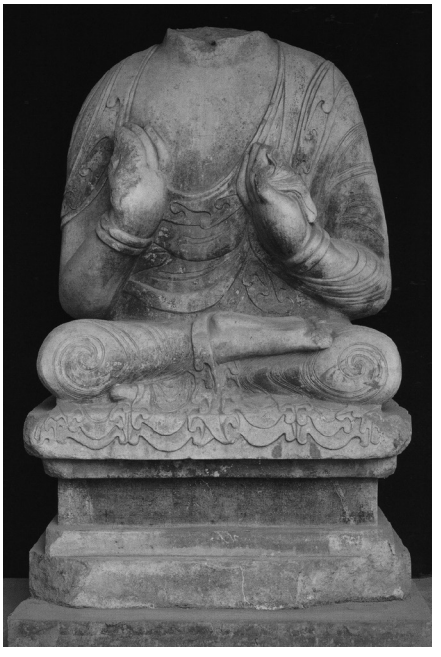


圖78 趙郡王高叡造白石無量壽像
北齊天保七年（556）
河北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79　趙郡王高叡造白石阿閦像
北齊天保七年（556）
河北博物院藏



圖80　趙郡王高叡定國寺碑
北齊天保八年（557）



圖81　定國寺塔　塔門拱卷　線描圖　北齊天保八年（5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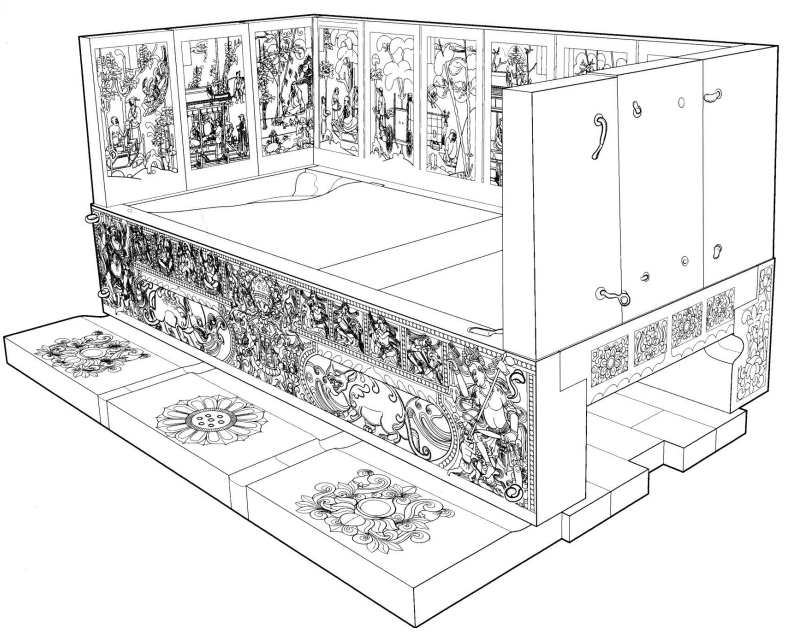


圖82 麴慶夫婦合葬墓 圍屏石牀 示意圖 隋開皇十年（590） 河南安陽



圖83 舍利白玉石函 隋大業二年（606） 河北定州 靜志寺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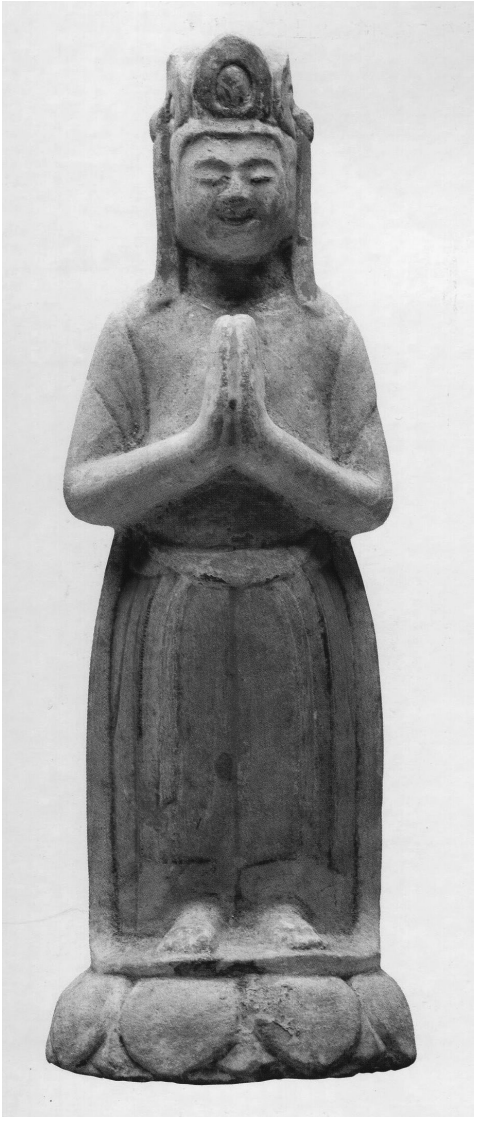


圖84　白玉菩薩像　隋代　河北定州
靜志寺塔



圖85　白玉石燈　隋　山西太原　虞弘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arrots and White Marble: The Regional Networks of the Tomb of Yu Hong from the Sui Dynasty

Lin, Sheng-chi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e present article examines the tomb of Yu Hong 虞弘 (533-592) in Taiyuan, Shanxi province, dating to the twelfth year of the reign of Emperor Wen of Sui (592) through a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networks, exploring its underlying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cultural factors to apprehend a more detailed shape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regions to the west from the late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Sui dynasty. The sarcophagus is a new amalgamation of a stone hall, a stone bed, and a stone base with lion heads. The form of the stone base with lion heads was adopted from the stone guardian lions of tomb doors, which had been adapted for use in the tombs of soldiers at the northern garrisons in Jinyang. The lotus and parrot motifs, the latter of which not only is an auspicious bird but also serves the function of a tomb guardian, are both inherited from the burial culture of the Pingcheng period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sarcophagus is carved from white marble, a certain symbol of status as well as brimming with the Buddhist connotations of resonance and the emission of light. The discovered white marble figurines of musicians are a continuation of the style of Jinyang ceramic figurines and represent the ideal physique of the northern garrison soldiers. The concentrated appearance of white marble burial objects and figurines from the late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Sui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material culture at the time. White marble, with its clean and lustrous qualities, was regarded as a material that could readily evoke a sense of resonance.

Keywords: tomb of Yu Hong, Sogdians, sarcophagus, parrots, white marble, regional network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